

叶汝贤 何梓焜 著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二八三七——一九四九)

中山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人口 展史

叶汝贤 何梓焜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叶汝贤 何梓焜 著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12 字数302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书号：2339·6 定价：2.45元

前 言

本书是作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而编写的，也可以供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读者自学使用。

近年来，我国高等院校哲学、政治专业普遍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先后出版了几本教材。这些教材具有许多优点，但有的篇幅太大，有的又过于简略。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力求吸取这些教材的优点，同时力求结合我国学生的实际情况，在坚持教材的科学性的同时，注意教材的适用性。由于水平所限，我们的主观愿望不一定能达到，缺点、错误也在所难免，但我们愿为此继续作出努力。希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本书编写分工如下：绪论、第一章至第四章：叶汝贤；第五章至第八章：何梓焜；第九章至第十章：叶汝贤。最后由叶汝贤作了润色。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1837—1848年).....	(14)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理论前提.....	(14)
第二节 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	(21)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新哲学在探索中前进.....	(56)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	(67)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验证和发展(1848—1875年)	(87)
第一节 历史唯物主义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的应用和发展.....	(88)
第二节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对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97)
第三节 唯物史观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和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中的发展.....	(118)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系统阐发(1875—1895年)	(130)
第一节 《反杜林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系统阐发.....	(130)
第二节 《自然辩证法》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	

	论证·····	(146)
第三节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捍卫和发展·····	(160)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的早期传播。第一批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贡献·····	(179)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早期传播的概况·····	(179)
第二节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狄慈根、梅林和考茨 基·····	(180)
第三节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	(190)
第四节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	(194)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列宁哲学思 想的形成(1883—1903年)·····	(199)
第一节	十九世纪末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	(199)
第二节	普列汉诺夫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贡献···	(202)
第三节	列宁在反对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 济派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211)
第六章	列宁在1905年革命前后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 论的发展(1903—1914年)·····	(224)
第一节	俄国1905年革命和认识论问题·····	(224)
第二节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230)
第三节	列宁对物理学革命的哲学总结·····	(238)
第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发展(1914—1917年)·····	(250)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研究	

	和运用.....	(250)
第二节	列宁论辩证法的核心.....	(254)
第三节	列宁论认识的辩证法.....	(262)
第四节	列宁对国家与革命的理论的研究和发展.....	(268)
第八章	十月革命后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1917—1953年).....	(275)
第一节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哲学的新的历史使命.....	(275)
第二节	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278)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成前斯大林的哲学思想.....	(285)
第四节	社会主义建成后斯大林的哲学思想.....	(291)
第九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1919—1937年).....	(30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301)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308)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321)
第四节	《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324)
第十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多方面展开(1937—1949年).....	(342)
第一节	开展全党的学习和整风运动,形成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基本内容的完备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343)
第二节	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独特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	(352)

第三节	总结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创立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360)
第四节	创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372)

绪 论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要明确它的对象、任务、分期、目的和方法。在绪论中，我们将着重讨论这些问题。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具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它的产生是哲学史上伟大的革命变革。然而，象一切社会意识形态一样，它也必须从已有的哲学思想资料出发，它并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相反，它继承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哲学成果和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因此，它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但不是哲学发展的中断，它同样遵循着哲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是人类哲学史的一个部分或阶段，是人类哲学思想史的继续。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又有自己的特殊对象和特殊规律，因而它又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一般哲学史是代替不了的。它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性，而不是一般哲学的发展史。自古以来，哲学发展经历不同的阶段，出现种种不同的历史形态。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些形态都具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虽然其中一些形态（如古希腊罗马哲学、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德国古

典哲学等等)，在一些局部问题上反映了自然和社会的某些规律性，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从整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的哲学都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具有本质的区别，它反映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深刻地反映这些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科学体系，但不是封闭的体系；它是科学，而不是“科学之科学”；它并没有终结真理，而是不断地为真理的发展开辟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是人们认识客观规律不断深化的历史，是从相对真理不断向绝对真理接近的历史，是真理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任务，不仅在于再现这一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在于揭示这一发展进程的规律性。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受“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思想史的共同规律所制约的，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时，欧洲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化起来，无产阶级已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就在客观上使人们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科学地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到了列宁的时代，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列宁主义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变化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继续和发展，则是受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所制约的。在社会科学中，哲学属于最抽象的一门学科。它高居于上层建筑的顶端，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中介而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但是，不管哲学距离经济基础多么遥远，归根到底它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恩格斯说：“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

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的发展，它的直接的动力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建设新社会的实践斗争。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但提出了创立科学的哲学世界观的要求，而且彻底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使这一科学世界观的创立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以后，每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都可以从无产阶级的实践斗争中找到直接的动因。例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无产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迫切需要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需要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点在于历史的唯物主义；巴黎公社以后，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深入，国家政权问题开始突出，这时候，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就成了重点；俄国十月革命的斗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阐明无产阶级的实践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是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性的关键。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有相对独立性。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哲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反映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学的中介间接地反映的。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自然和社会的某一特定领域,揭示该特定领域的特殊规律。哲学则把自然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通过概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现,形成对于这一整体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直接受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其次,哲学发展本身又有历史的继承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回答了人类哲学思想史提出的根本问题,而且总结和概括了几千年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经过批判改造,这些优秀成果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再次,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对哲学的发展往往发生重大的影响,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新民主主义论》等研究经济问题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以及毛泽东的一系列军事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在同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同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机会主义、同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许多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矛盾论》、《实践论》等,都是这种斗争的产物。意识形态领域、哲学领域的斗争是复杂的、不会间断的,我们应该充分估计这种斗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由于这种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还具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哲学史的特点。例如,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往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同他们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作活动分不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无产阶级

的革命领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因此，以他们的名字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不能仅仅归结为个别领袖人物的理论创作活动，从本质上说，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又一个鲜明的特点。马克思说：“哲学家的成长并不象雨后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①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是阶级的代表，不是超人，他的作用是集中整个阶级的智慧。领袖也不只是个别人，而是一个集体。概括和集中阶级的智慧，是由整个集体完成的。此外，除了这一领袖集体，还有众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们的理论活动也直接或间接地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不但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作活动、不但要研究经典著作，而且要研究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理论活动和著作、研究党的文献。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全貌。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主要任务是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因而弄清“发展”这一概念的含义是至关重要的。

哲学发展史，也就是认识史。“发展”，从本质上讲，指的是认识的深化或认识的前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和概括、总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新发现的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上,不断加深对客观世界普遍规律的认识的。这种认识的深化表现在对原来的范畴、原理的补充和丰富,表现在新范畴、新原理的形成。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总结1848至1849年的欧洲革命经验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典概念,到巴黎公社以后,就形成了完整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所以,所谓“发展”,首先指的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的新的概念、范畴和新的原理的形成,指与前一阶段相比提出的新东西。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不仅在于认识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它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化,而且表现在它运用于实践,在改造世界中取得的成功。每一次成功的运用,都是理论向实践的飞跃,是精神向物质的转化,是在新的条件下对理论的检验和证实,同时也为新概念、新原理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实践材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途径。所以,应该把创造性的成功的运用包括到“发展”的概念中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和时期,是在实践基础上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接近的过程;每个阶段、每个时期的发展,都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严密的科学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结构以及组成这一结构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并没有穷尽对世界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它必然会不断地得到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发展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必然会带有时代的历史的特点。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某些具体原则、具体结论,在一定条件、一定范围内是正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它又变成过时的了。这时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根据新的条件和新的经验，用新的原则、结论，代替、修改或补充那些已经过时的或不完善的旧原则、旧结论。修正主义借口时代条件的变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篡改，而不是发展；教条主义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有的原则、公式和结论，变成不可移易的模式或套语，并制造革命领袖的言论“句句是真理”的迷信。这种做法名曰“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同样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此，不论是修正主义还是教条主义，都是应该加以反对的。

从总的趋势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由相对真理不断地向绝对真理接近的过程，是一个前进、上升的运动过程。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沿着直线前进的。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斗争的复杂，以及认识主体的局限性，又有可能造成认识上的失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出现曲折、以至出现暂时的倒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虽然以研究前进和上升的运动为主要任务，但也要研究前进、上升过程的复杂性，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前进过程中的曲折，科学地揭示产生这种曲折的根源和总结经验教训。“失败是成功之母”，认识产生失误的根源和教训，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后来的成功和发展。

最后，要明确什么是“发展”，最根本的要以实践为标准。一般来说，每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中出现的新原理、新观点、新结论，是发展的一种表现。但是，并不是任何新的提法都是发展。历史上有这样的情况，有些新原理、新观点和新结论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发展，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所谓新东西并不是正确的，而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实事求是地指明

这些“新东西”的错误，而不应该主观地把任何新的提法都归结为发展。所以，只有那些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是真理的东西，才是发展。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人类历史走过了不同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它的发展也显示了不同的阶段。正确认识这些不同的阶段，科学地解决历史分期问题，有助于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历史分期，象任何思想史的分期一样，是有客观标准的，不能带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每个时代经济基础发展的基本特征决定该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基本面貌、从而决定哲学发展的时代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历史分期应和不同时代的历史分期相适应。其次，无产阶级的实践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每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都是由于正确地回答了无产阶级实践斗争提出的新课题而达到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阶段性和阶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和阶段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历史分期又必须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同共运史的历史分期相适应。再次，哲学史的分期，还必须考虑哲学本身发展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它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认识的深化和基本特征，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许多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著作，是在直接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发现，或者

是在批判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些著作往往成为历史分期的标志。因此，我们应该从经济、政治、实践斗争和哲学本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等方面，综合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历史分期的依据；抓住一个方面，忽视另一方面，就会陷入机械性或片面性。

从以上的分期依据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每个大阶段又可以划分为若干各具特色的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作为这一矛盾的表现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充分发展和充分暴露，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开始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解放而斗争。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条件还未成熟，因此，虽然无产阶级开始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开始为争取解放而斗争，但从总的历史特点来看，无产阶级革命还处在准备阶段。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大工业的发展，现代科学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打破旧的思维方式的重大发现。这样一种时代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和逐步形成科学体系，主要是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理论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逐步形成理论体系的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逝世以后，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反映在阶级关系上，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走向彻底的反动和腐朽，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则大大提高了。这样，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直接实践的阶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现实的目标。十月革命的胜利达到了这一目标，并且开辟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

也纳入了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范畴。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新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阶段的标志。

时代是发展的。在同一时代之内，虽然基本的矛盾还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但随着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这些基本矛盾又会发生局部的变化或者发生部分质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这种变化，使它的发展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具有自己的具体的历史特点。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与具体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可以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革命中的运用、验证和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中系统阐发时期；等等。在列宁和毛泽东的时代，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战争和俄国革命年代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运用和发展。其次，这个阶段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发展。就中国而言，包括了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应用和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应用和发展；等等，大体上经历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形成、成熟和在革命过程中多方面展开等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应该着重研究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不同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

四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性，目的在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此，需要明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学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它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想的历史发展的科学。”^①这里说的“关于思维的科学”，指的是哲学，而“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就是哲学史。恩格斯在这里阐明的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象任何哲学一样，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的科学，因而只有从其历史发展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哲学史是理论思维的学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深刻理解其内容和实质。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其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目的还在于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性，以利于在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正确地、富有成效地改造世界，同时明确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向。

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要达到上述目的，还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方法、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及科学性和党性相统一的方法。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每个时期的发展，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要具体研究每个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以及无产阶级的实践斗争，提出什么新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如何把每个时期无产阶级的实践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验上升为理论，从而获得发展，同时，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如何在指导实践斗争过程中实现由精神向物质的转化。只有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才能深刻理解每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具体特点。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坚持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是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行历史的考察和逻辑的分析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一系列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这些范畴和原理，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我们考察每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论是新范畴、新原理的提出，还是对原有范畴、原理的深化，都要把它们放在这个科学体系的逻辑结构中去理解，从理论上揭示各种范畴、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对任何范畴、原理孤立地进行考察，就决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同时，这个科学体系不是静止不动的，构成这个体系的范畴、原理以及这个体系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所以，我们研究任何一个范畴和原理，既要在横向上、在逻辑上揭示它同别的范畴、原理之间的联系及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揭示其发展的新特点；又要从纵向上、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揭示其本身的发展过程，揭示其当前的发展同以往的发展的内在联系。

最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还必须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列宁说过，党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伟大和最宝贵的传统。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在很长的时期中，差不多半世纪，他们始终发展着唯物主义，把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向前推进，不是停滞于重复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彻底地贯彻——并且指出必须怎样贯彻——这同一个唯物主义于社会科学的领域，把夸大的吹牛的谬论，把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发明“新”方向等等无数的伎俩当作污秽和垃圾毫不留情地扫除开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的哲学著作，都有一个

“一贯不变的根本基调”：坚持唯物主义，侮蔑地嘲弄一切暧昧、一切混乱、一切倒向唯心主义的偏向。他们的全部哲学言论，都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为中心，彻底地坚持和发展唯物主义的路线。^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每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始终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传统。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并不是狭隘的宗派性，不是靠吹牛和讲空话取胜，它之所以能在一百多年来常盛不衰、发扬光大，就在于这种党性是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和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这种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离开科学性，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个宗派主义派别，这种“党性”是软弱无力的。而离开党性去谈“科学性”，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折中主义的大杂烩，也不会有真正的科学性。所以，只有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实质。

坚持正确的研究和学习方法，是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真实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前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以及一些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制造“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列宁和马克思的对立，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从思想根源上说，就是他们采取了孤立的、静止的、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过程中，要批判这类错误的研究方法，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法。这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这门学科和学好这门学科，是十分必要的。

^①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6—347页。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

(1837——1848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诞生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这一章，我们将首先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历史过程。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时候，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无产阶级已发展壮大起来。这个过程的加速发展是从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战胜封建主义以后开始的。革命的胜利，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十八世纪末，在英国首先发生采用大机器生产的工业革命。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在棉织工业和轻工业的其他一些部门，大机器生产已占优势。到四十年代，重工业部门又出现了机械化的机器制造业。紧跟在英国之后，法国也发生了工业革命。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轻纺和重工业的一些部门，大机器生产已相当普遍。这时候的德国仍处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但是，由于英法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资本主义工业也在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缓慢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法国长期占领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莱茵省，在一些生产部

门，已出现大机器生产的萌芽，生产的规模、特别是纺织工业、金属加工工业和煤炭工业的生产规模逐渐扩大起来。莱茵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走在全德国的前列。德国其他省份，直到1834年建立了以普鲁士为盟主、包括十八个邦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大约二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结成一个有统一市场的经济地区以后，资本主义才比较迅速地发展起来。

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摧毁腐朽的封建主义制度，解放了生产力。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又使资本主义制度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英、法、德等国相继发生的工业革命，使生产工具发生革命性的变革，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结果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以至发展到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1825年，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英国第一次发生经济危机，以后每隔十年左右周期性地发生一次。三十年代，经济危机象瘟疫一样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到1857年变成世界性的灾难。在危机期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生产力遭受破坏。一方面，大批工人受着饥饿的折磨，另一方面，资本家却把“过剩的”粮食、牛奶倒进大海。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荒唐现象。实际上，这是资本家阶级企图通过破坏生产力来缓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种办法暂时是有效的，但矛盾依然存在，并且每次危机过后都会潜伏着新的更严重的矛盾和冲突，隐藏着更严重的危机。

资本主义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同时也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资本主义生产出现第一天开始就存在了。但最初由于是在封建主义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加上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它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被掩盖着。这时候虽然也在一些地区发生个别工人捣毁机器、反对工厂主的斗争，但这种斗争还未具备阶级斗争的性质。后来，资产

阶级推翻了封建主义的统治、扫除了封建主义的障碍以后，事情就起了变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突出出来了。这时，资产阶级转过来全力对付无产阶级，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日益壮大了队伍，它的觉悟也日益提高了。一方面，它在反封建斗争中得到锻炼，另一方面，由于交通的发展，各地区、各部门工厂工人之间联系的加强，使他们发现无产者生活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之下，受到同样的资产者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共同的利益和斗争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促使他们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去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接连举行武装起义。从1836年开始，英国工人掀起声势浩大的工人宪章运动，1838年、1842年、1848年三次掀起高潮，参加的工人达三百万人之多。在斗争中，英国工人组织一个独立的政党——宪章党，恩格斯称之为“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①。继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运动之后，德国西里西亚工人也于1844年举行武装起义。这些运动和过去工人反对工厂主的斗争不同，工人们不再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机器，而是开始了有组织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斗争，具有为本阶级的阶级利益而斗争的目的。特别是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提出了反对“私有制社会”的要求。这一切表明，欧洲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与资产阶级相抗衡。

但是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从整个说来，本质上还具有自发的性质，主要还是以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为目的。工人阶级还没有认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还没有认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还没有认识争取解放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在这种条件下，工人运动的斗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7页。

锋芒只要是指向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就会遭受失败。当时影响工人运动的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派别。这些派别希图用幻想的方案和劝说富人的办法来代替阶级斗争。实践证明这些理论不能引导工人运动走上胜利的道路。因此，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来指导。而当时客观上已有可能创立这样的理论。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发展动因及其规律性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动因同结果之间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但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和表面化，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同时，生产规模的扩大、交通的发达，过去要经过几个月、几年才传来的信息，现在几天、甚至第二天就知道了。恩格斯指出，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会看不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和它们的斗争是现代历史的动力。^①这说明，当时已出现了揭开历史之谜的现实的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作为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的诞生同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都会促使唯物主义改变自己的形式。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欧洲从十五世纪开始，就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同时也孕育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萌芽。当时，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生产的发展对自然科学还没有提出很多复杂的要求，同时也未能提供更深入地研究自然把握自然规律的手段。自然科学还不得不撇开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之间的联系和变化，分门别类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研究，还局限于对自然科学材料的搜集、初步整理和分类。当时取得真正成果的是力学。物理学、化学和地质学刚刚开始形成。生物学还处在主要从事于搜集和初步整理材料的阶段。但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完成，资本主义生产由工场手工业阶段进入大机器生产阶段以后，自然科学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由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变成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这时候不仅形成了自然科学的各种学科，而且出现了一系列划时代的伟大发现，特别是三大发现。一是细胞学说的发现。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1804——1881年)和动物学家施旺(1810——1882年)分别于1838、1839年发现了植物和动物机体都是由最小的单位——细胞的繁殖和分化而发育起来的。施旺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论证了动植物起源的共同性和动植物的统一性。二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1842年德国科学家迈尔、英国物理学家焦耳和丹麦物理学家柯尔丁几乎同时发现了这一定律。这一定律说明，一种物质运动形态所具有的能量是守恒的，它可以转移到别的运动形态上，但不会增多，也不会减少。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从虚无中产生的，自然界是有规律地发展变化的，各种运动形式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说明了自然界的统一性。三是生物进化学说。德国胚胎学家卡斯帕尔·沃尔弗(1733——1794年)通过对鸡胚胎发育过程的研究，批判了“预成论”，在生物学研究中首先注入了发展的观点。十八世纪末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年)论证了生物进化的思想。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年)在经过周游世界各国，经过长期的调查、观察和对比研究，于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有力地证明了现在无数的物种是自然界长期的演变发展而来的，不是自古就有的。这一切科学发现，特别是上述三大发现，

给形而上学世界观以致命的打击。这些发现有力地说明，世界上各种现象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个自然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是辩证地发展的。这就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还有深刻的理论来源。

恩格斯说过，虽然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根源深藏在经济事实中，但它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①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而当时的德国在欧洲各国中是哲学思维最为发达的国家。以康德(1724——1804年)、黑格尔(1770——1831年)和费尔巴哈(1804——1872年)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集过去哲学发展之大成。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生巨大的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的理论来源。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把“绝对精神”当成世界的本原。但在他的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又包含着深刻的辩证发展观。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把自然、社会 and 人类思维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并且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和根源。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历史不再是杂乱无章的一堆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社会本身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哲学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他的功绩在于提出这个任务，在于他在唯心主义的外壳之下，提出和阐发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因而为完成这一任务创造了条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

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后一个伟大代表。黑格尔唯心主义多年统治了德国思想理论界，费尔巴哈首先对它进行批判。他指出黑格尔哲学本质上是神学，“绝对精神”即“上帝”的化身。费尔巴哈猛烈地抨击宗教。他从人本主义出发，认为“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是自然界和人。他建立了唯物主义的自然人观和人本主义哲学。他对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批判，是有功绩的。但他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连同后者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也抛弃了。他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他据以为出发点的“人”是抽象的。因此，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他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是由于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因而他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由黑格尔唯心主义到达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批判地吸收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而创立了自己新的哲学的。

此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直接的理论来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亚当·斯密(1723——1796年)和大卫·李嘉图(1722——1823年)。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研究财富的本质和来源，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如关于劳动价值的理论、关于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对反映这种联系的阶级利益之间对立的分析，等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起了积极的作用。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1760——1825年)、欧文(1771——1858年)、傅立叶(1772——1837年)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虽然他们的历史观在总体上仍是唯心主义的，他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免不了陷入空想。但他们对社会历史问题的探讨，已引入相当多的辩证发展观点。他们不但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由低级向高级阶段不断进

步的过程，而且力图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及其规律性。他们已试图用物质生产来说明历史的发展，并且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问题。所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同样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

第二节 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 世界观的转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但他们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经历一个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

一、青年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

由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马克思最初信仰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大学生时代又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大学毕业后，通过参与社会斗争和理论研究，他逐渐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第一，学生时代的思想发展和青年黑格尔派

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马克思诞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一个犹太人律师家庭。

马克思是在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时整个德国仍处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重压之下。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资产阶级已提出了民族统一和政治自由的要求。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莱茵省，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比德国其他省份发展得更早、更迅速。这同法国的长期占领和影响有关。从1794年到1815年，法国人在占领期间按照法国资本主义的蓝图，在莱茵省实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

革，使莱茵省从几乎是中世纪的状态过渡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式。因此，当莱茵省重归德国时，它就超出后者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莱茵省重归德国后，普鲁士王国企图恢复封建主义的统治。这就发生了实质上是莱茵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普鲁士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比起德国其他省份，当时的莱茵省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的更为深厚的基础。在马克思的家庭、他就读的学校以至整个莱茵省，政治上和宗教上的自由主义、思想上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非常盛行。马克思的父亲就是一个开明的自由派的犹太律师。他经常教育儿子做人要有高尚的品德、坚定的意志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他认为一个人不管有多高的天分，如果没有一颗善良的心，就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读书时的特利尔文科中学，是当地反对普鲁士封建统治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重要基地。该校校长胡果·维登巴赫是康德的信徒，他力图使学校的教学贯彻理性主义的原则。在他的倡导之下，整个特利尔中学盛行着自由主义的启蒙精神，那些保守分子则显得十分孤立。维登巴赫教历史和哲学，马克思受到他很大的影响。

马克思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渡过的。他从小就具有的高尚的品德、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这一环境的产物。马克思中学生时代写的几篇作文，特别是中学毕业时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就生动地体现了刚进入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的精神面貌。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写于1835年8月。校长维登巴赫在这篇论文手稿中加了许多着重号。认为这篇作文写得“非常好”“思想丰富，叙述很有条理”。今天看来，这篇作文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表现了青年马克思崇高的道德观念。他认为，我们选择职业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而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才能

使自己达到完美。一个人如果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但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伟大人物。在青年马克思看来，是为自己还是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这是衡量一个人的道德观念是否高尚的标准。他激情满怀地写道：“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①第二，表现了青年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在他看来，自由是人所固有的，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点。他认为，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活动范围，动物没有选择的自由，而人却有这样的自由。但是，马克思反对把这种自由作绝对化的理解。他说：“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②此外，人的选择还受体质、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所以人的自由总是有限制的。在这里十分可贵的是青年马克思看到了人们的社会关系的作用。虽然他还不理解这种社会关系的实质，但看到了人们生活在这种关系之中，不能脱离这种关系，却是一种思想的闪光。第三，表现了青年马克思实事求是的精神。马克思认为，我们要有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的崇高目标，一切职业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但是选择职业必须从实际出发。只要考虑到社会上的各种关系和自己的体质、才能，我们就能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5页。

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即完美境地的职业。他特别指出：“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①这些思想表明，从青少年时代开始，马克思就有可贵的求实精神。

从马克思中学时代写的作文，可以看到当时理性主义、人道主义思潮对他的强烈影响。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表现。它从抽象的“人类”出发，要越过阶级对立去实现“人类的幸福”，实质上是实现资产阶级本身的幸福。马克思以年青人的热情接受了这种影响，他还不能分辨清楚问题的实质，因此，他在自己的作文中表现出来的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人道主义思想，还没有确定的具体的内容。可贵的是青年马克思不仅思想上相信这种人道主义，而且把这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要求在实践中加以实现。正是这种富于自我牺牲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促使青年马克思很快就站到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前列。

马克思中学毕业后，遵照父亲的意愿，于1835年10月上波恩大学攻读法学。在这里，马克思除了听法学课，还旁听了好几门浪漫派文艺的课程，哲学和政治对他还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二年转到柏林大学以后，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青年马克思在这里感觉到了完全不同的气氛。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他很快就被卷进了斗争的旋涡。

在当时的德国，黑格尔哲学在整个思想理论界占据统治地位，而柏林大学又是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中心，是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较量的主要场所。青年黑格尔派是从黑格尔哲学学派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派别。我们知道，黑格尔哲学本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从整个体系来看，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6页。

在这一体系中又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黑格尔一方面把自然、历史和精神的世界看做是一个过程，认为世界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这个发展过程不会终结；另一方面却认为，真理的发展，到黑格尔哲学就达到顶峰，历史的发展也到普鲁士王国为止。这样一种矛盾，就给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场所。而在当时的德国，具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宗教和政治。黑格尔的门徒们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首先在宗教和政治上发生分歧和对立。那些特别重视黑格尔体系的人，在这两个领域都是十分保守的，他们反对一切变革。这一派就叫老年黑格尔派。而那些认为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中最主要的东西，并试图从辩证法引出革命的结论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成了当时德国旧传统的反对派。这一派就叫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深刻的矛盾，主要是资产阶级同封建专制制度的矛盾。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它不象法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期那样真刀真枪地同封建主较量，而是围绕着宗教和政治问题采取思想斗争的形式。马克思转到柏林大学时，这两派的分歧和对立已经非常明显。马克思本人很快就参加到青年黑格尔派的行列中来，成为他们中最富天才的一员。马克思整个大学时代的思想发展，都同青年黑格尔运动密切相关。研究青年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对于弄清马克思以后思想发展的脉络是很有意义的。

马克思转到柏林大学，并非一开始就研究和接受黑格尔哲学。他在这里学的专业仍是法学，但他的兴趣却是历史和哲学。他最初阅读黑格尔的一些著作，对黑格尔“离奇古怪的调子”很不满意，并试图批判这一哲学。那时他相信的是康德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并试图在这种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法哲学体系”。这一尝试失败以后，他又再一次研究了黑格尔哲学。他利用一次生病休养的机会，精读了黑格尔及其门徒的大部分著作。他越是

深入研究这一哲学，就越为这一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哲学所吸引。

1837年夏天，由于思想上的共鸣，马克思开始同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中心“博士俱乐部”的成员来往，并且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之一。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主要由几所大学的青年讲师、中学教师、文学家和大学生组成。主要领袖人物是阿道夫·鲁滕堡（1808——1869年）、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1808——1863年）、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年）等等。这些人都是马克思的朋友，有的还是马克思的老师（如鲍威尔）。毫无疑问，马克思同这些人的结识和密切来往，俱乐部活跃的和自由的讨论，推动他去进一步研究黑格尔哲学和接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由于马克思的天才、学识和敏锐，他很快就成了俱乐部的灵魂，对俱乐部其他成员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科本把马克思看作是“一座思想的仓库、制造厂”“思想的牛首”^①。一位名叫荣克的青年律师在给卢格（两人都是青年黑格尔运动的重要成员，后者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信中，认为青年马克思是他所知道的“最聪慧的思想家之一”。这些话从侧面表明，马克思当时已站在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前列，并已开始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

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记录了他转学柏林大学、特别是参加青年黑格尔的活动以来，他的思想发展的概况。他象俱乐部所有成员一样，站在黑格尔哲学的立场上，把法律、国家、自然界看成是“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②。他比其他人深刻的地方，是抓住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特征。他要求从现实本身中寻求思想。他认为事物本身不是僵死的存在，而是一种多方面展开的生动的东西，是矛盾统一的东西，我们不应

① 科尔纽著：《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2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0页。

任意把它们分割开来，而是要从对象本身的发展、从其内在矛盾的展开中去认识对象。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否定了把应有的东西和现有的东西对立起来的观点，主张把应有的东西和现有的东西联系起来。而当时青年黑格尔派中的多数人，如鲍威尔等人，则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向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把应有的东西与现有的东西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所以，这时候马克思在政治信仰和世界观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和青年黑格尔派一致，但在另一些重要问题上则与后者有分歧。这种分歧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写于1839年夏天至1841年春天。围绕着博士论文的写作，马克思研究了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派、怀疑派等哲学流派。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这些哲学流派是他们所主张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历史发展形式，而费希特哲学、黑格尔哲学、他们的批判哲学则是这种自我意识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选这一研究课题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是有联系的。但是，马克思研究这些哲学流派所得出的结论、他在博士论文中表现出来的基本哲学倾向，又包含着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深刻分歧。

青年黑格尔派以鲍威尔为代表，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是从“自我意识哲学”出发的。他们用“自我意识”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认为世界是由“自我意识”创造的，“自我意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把意识和存在、人和周围环境分割开来、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在这两者之间不断的对立中实现的，是由“自我意识”决定的，因而认为单靠批判就可以改变世界。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则采取另一种解决方式。他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出发，认为精神与具体世界、人与周围环境之间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精神是

通过与世界的相互作用而发展的。因此，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不但看到了精神与世界的对立，而且看到它们的统一，并且认为历史的发展取决于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在考察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时，就贯穿着这样一种辩证发展观。马克思认为，这两种自然哲学有很大差别，但都具有片面性。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建立在机械决定论的基础之上。他在论证原子运动时，认为一切都是必然地发生的，无论是原子的结合或分离，都由必然的制约性所规定，没有任何偶然性，没有任何自由的可能。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则走向另一极端。他只认为原子是一个物质实体的德谟克利特不同，伊壁鸠鲁认为除此之外，原子还有自己的独立的精神属性。这种独立的精神属性使原子运动能够脱离直线而发生“偏斜”。马克思说：根据伊壁鸠鲁这种观点，“这种偏斜表明，原子否定一切运动和一切关系，而在运动和关系中原子作为一个特殊的定在为另一个定在所规定。这意思可以这样来表达：原子从与它相对立的定在中抽象出来，并且偏离了它。”^①就是说，原子的独立本性、它的自由，表现在它偏离直线、离开它在其中不自由的存在方式，即脱离同其他一切东西的一切联系。马克思不同意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这种形而上学地论证自由问题的观点。前者否定了任何自由，后者却把自由绝对化了。由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强调了原子的自由本性，马克思是比较重视这一哲学的。但是马克思对这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自由观是否定的。他指出，伊壁鸠鲁所主张的“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②，这种自由观否定了人作用于周围环境的可能性，否定了人能够对现实产生变革性的影响。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15页。

② 同上书，第228页。

在马克思看来，脱离世界、不与世界发生任何联系的“自由”，只是一种抽象的自由。真实的自由是在精神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由观的批判，他在这一批判中所阐明的观点，反映了他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哲学，从“自我意识”决定一切出发，论证人的意志的绝对自由，反对哲学参与改变现实的斗争，主张批判就是一切。这种观点和伊壁鸠鲁的自由观有相似之处，因此，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由观的批判，也包含着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马克思从自由是通过人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这一观点出发，不满足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纯理论批判，认为重要的不在于对现存制度进行理论上的批判，而在于在实际活动中改变这种制度。他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把普罗米修斯尊为争取自由的英雄和殉道者。他认为哲学不但不应该逃避现实，而且应该把参加实践斗争、改变现实当作自己的使命。虽然当时马克思仍从黑格尔哲学出发，把实践理解为精神活动。但从他上述观点可以看到，他已力图从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出发去解释黑格尔哲学，已明显地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主义。这说明，马克思这时候的思想已超越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了。

第二，主编《莱茵报》，世界观转变的开始。

在整个大学生时代，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大体上局限在青年黑格尔运动的范围之内。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马克思已突破青年黑格尔派的局限，政治上从自由主义逐渐走向革命民主主义，哲学世界观则从思辨哲学逐渐发展为从哲学与世界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考察哲学的地位和作用，论证了哲学参与实际斗争的必要性。这样一种观点促使马克思大学毕业后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马克思大学毕业后，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朋友们(如鲍威尔)

极力主张他去波恩大学当教授。起初马克思也有这样的打算。但是目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愈来愈反动，特别是看到一些进步的教授、讲师被赶下讲坛，他就感到大学的讲坛不是实现他的理想的合适场所，因而毅然放弃了当教授的念头。此时的马克思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已经非常明显，他已下定决心参与实际斗争，转向研究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用他中学毕业时的论文的话说，就是选择了使他“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①。1842年1月至2月，马克思写了第一篇政论性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同年4月，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0月成为该报的主编。这样便开始了他的作为革命家和理论家、哲学家的斗争生涯。

《莱茵报》是在当时莱茵省经济政治中心科伦出版的一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创刊于1842年1月1日。报纸创刊不久就为青年黑格尔派所控制。后来，在马克思的主持下，该报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控制，使报纸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愈来愈明显。由于马克思处在报纸的领导岗位上，因而不得不花很大精力去研究迫切的社会问题和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研究这些问题最初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出发的。但是，他的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用黑格尔哲学无法解释他所遇到的种种疑难问题，这使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正确性发生怀疑，从而开始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首先在出版自由问题上发难。马克思认为，出版自由是提高人民觉悟、发展文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当时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却千方百计限制出版自由。1841年12月，普鲁士政府颁布的新的书报检查令，表面上表示不同意对作家的写作加以限制，实际上不仅保存了长期沿袭下来的旧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且用新的规定进一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比如它要求人们对真理的探讨要谦逊、严肃，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

抱有善意和有礼貌。这样一些模棱两可的规定，其隐蔽的目的是为书报检查机关迫害作家提供借口。因为只要作家的作品不合乎他们的口味，它就可以随便加上缺乏善意、不严肃等罪名而加以否定和迫害。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极端反动而又虚伪的检查令，却获得一些天真的知识分子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于1842年初写了他的第一篇政论性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对这一新的检查令的虚伪和反动加以揭露和抨击。

马克思认为，新的书报检查令象旧的检查制度一样，都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马克思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眼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①封建专制制度只允许一种思想方式、思想倾向存在。检查令规定，凡是对政府措施发表意见，其倾向必须是善意的，带有有害倾向的即禁止发表。马克思指出，这种没有规定客观标准、反对倾向的法律，乃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因为它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所想的。这就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法律，而且阴险的陷阱，是特权。

新的检查令骨子里要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却假惺惺地指责书报检查机关对于写作活动的过分的限制。马克思指出，检查令把全部过错加在检查官身上，为的是要保全事情的本质——专制制度。马克思写道：“虚伪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通常总是这样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

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①实际上，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根子在检查制度本身。书报检查制度的骨子里隐藏着一种任何法律都无法医治的痼疾，因此，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不是撤换几名检查官，而是要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本身。这样，马克思的批判矛头就直指专制制度本身。

这时候，马克思对国家的看法，仍然受到黑格尔国家观的影响。黑格尔把国家看作是“理性的体现”，马克思也认为“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②。他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对现存国家进行批判和提出要求的。在这一批判过程中，他发现现存国家处处表现了同黑格尔国家观的矛盾，于是在他的探讨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决定国家采取种种同理性国家相矛盾的措施？在他的第二篇政论性论文、也是他发表在《莱茵报》上的第一篇论文中，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探讨用新的观点解决这一问题的苗头。

这篇论文是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辩论的评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在仔细地分析了议员们的发言之后指出：“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等级。”^③每位议员的发言，都是从一定等级的利益出发的。贵族地主的代表反对出版自由，竭力为书报检查制度辩护，他们声称人民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给予自由的程度。这表明他们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讲话，他们要维护的是统治者的特权和利益。城市等级即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出版自由，但他把这种自由归结为“行业自由”。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有“相对的正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③ 同上书，第42页。

性”^①。因为它把自由问题同人们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这比德国的自由主义派（实际上指的是青年黑格尔派）那种内容空洞、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议论来得高明。这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把自由从现实的坚实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他们反对把人们的理想同日常的现实相联系。马克思认为，对德国人来说，自由之所以直到现在仍然只是一种幻想和伤感的愿望，他们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因此，城市等级的代表把出版自由同行业自由、财产自由联系，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是，把出版自由归结为行业自由、财产自由，还不是真正的自由。降低到行业水平的出版物，决不能忠于自己的特征和原则。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反过来说，如果作家为了挣钱而写作，那他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把出版物贬为单纯物质手段的作家必须会受到外部不自由——检查——对他这种内部不自由的惩罚。所以，马克思认为：“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②马克思指出，从城市等级代表的发言可以看到，他同贵族地主代表的发言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倾向的不同。后者以自己特定的等级狭隘性反对出版自由，前者则以同样的狭隘性争取适合自己需要的自由。他们各自都从自己的地位、切身利益出发，所以城市代表所主张的把出版自由归结为行业自由或财产自由，实质上是资产者的自由。农民等级的代表对出版自由问题则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认为，人类精神应当根据它固有的规律自由地发展，应当有权将自己取得的成就告诉别人，否则，清新的河流也会变成一潭恶臭的死水。他们认为德国人民特别需要出版自由，因为只有这种自由才能产生冲破麻木状态的刺激。人们渴望独立和自由，书报检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3页。

② 同上书，第87页。

制度是“令人痛恨的羁绊”^①，它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状态的变化而改变。马克思非常赞赏农民代表的发言，认为这是“真正的历史观点”^②。从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辩论所作的分析，可以看到他已试图从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出发去分析不同等级代表的发言，他由此得出结论，省议会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是代表特权等级的利益。

马克思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一共写了三篇论文。第二篇是关于教会纠纷问题的。检查官没有准予发表，论文手稿也没有保存下来。1842年7月9日，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谈到，他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了国家的拥护者怎样站在教会的立场上，而教会的拥护者却站在国家的立场上”^③。第三篇论文是关于林木盗窃法草案的辩论。这篇论文和1843年1月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直接地旗帜鲜明地为备受剥削和压迫的贫苦农民的经济利益辩护，第一次接触到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国家和法以及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马克思在捍卫贫苦人民的物质利益的斗争中，表现了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倾向。

在评论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草案的辩论时，马克思愤怒地揭露和批判了林木占有者与国家机关狼狈为奸，侵占贫苦农民的利益，对贫苦农民采取的残忍的镇压手段。贵族地主占有大片森林，国家机关则制订法律予以保护，连农民捡枯枝也被定为犯罪行为。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国家是理性的体现。马克思这时仍然相信这种唯心主义的国家观。但是，马克思与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不同，他具有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和作风。1842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3—94页。

② 同上书，第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9页。

年8月，他在给奥本海姆的信中就这样写道：“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①马克思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出发，但当他发现这种理论无法解释实际生活现象时，他就力图从尊重事实出发，作出新的说明和新的理论概括。本来捡枯树枝，这是穷人的“习惯权利”，但普鲁士国家却制订法律当作犯罪予以重罚，光是1836年由于捡枯树枝被惩罚的就有十五万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7%。显然，这种法律所维护的完全是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实际上它已变成林木占有者对付穷人的工具。马克思写道：“林木占有者的意志要求给予它自由，使它能以最方便、最经济而又最合意的办法来对付森林条例违反者。这种意志希望国家将犯人交给它私自处理。它要求 *plein pouvoir* [全部职权]。”^②而国家机关不仅给予林木占有者这种权利，而且甘愿为林木占有者这种权利的实现而卖力，这样，便“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占有者的奴仆。整个国家制度和各种行政机构的作用都应该脱离常规，都应该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应该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③就是说现实国家已经完全丧失了国家的理性本质，变成少数特权者的工具。在这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马克思已经看到了统治者的物质利益对国家的支配作用。他在分析省议会的辩论记录时写道：“省议会对于下述问题进行了表决：应该为了保护林木的利益而牺牲法的原则呢，还是应该为了法的原则而牺牲林木的利益，——结果利益占了法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9页。

③ 同上书，第160页。

上风。”^①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法的原则，而是统治者的物质利益。虽然当时马克思还认为，这是违反“常规”的现象，但社会生活愈来愈使他怀疑黑格尔国家观的正确性，促使他开始转向唯物主义。

马克思于1843年1月15日发表在《莱茵报》上的长篇论文《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更加明显地表现了他的唯物主义倾向。《莱茵报》刊登的一些文章如实地报道了摩塞尔地区葡萄农的贫困情况。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攻击《莱茵报》，说后者歪曲事实，诽谤政府，并说该地区农民的贫困是由农民自己造成的。马克思的论文用摩塞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大量材料，有力地驳斥沙培尔的攻击，抨击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而试图揭示普鲁士国家的客观基础。他说：“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 and 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象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既然已经证明，一定的现象必然由当时存在的关系所引起，那就不难确定，在何种外在条件下这种现象会真正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需要它，它也不能产生。这几乎同化学家能够确定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具有亲和力的物质化合成化合物一样，是可以确实确实确定下来的。”^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人们的善意或恶意，而是“客观关系”。马克思当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指明，在各种客观关系中哪一种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但联系到他对经济利益作用的想法，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已把经济利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9页。

② 同上书，第216页。

的关系看作是最基本的关系。正是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决定政权机关的性质和政权代表的行动，决定国家和法律，并使社会生活现象的发展带有必然性和规律性。这样一些观点表明，马克思已迈开了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哲学世界观上开始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同时，政治观点也由革命民主主义开始转向共产主义。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为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辩护。最初他是从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遭遇出发的，他还没有把无产阶级从受苦的群众中区分出来，更没有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马克思当时竭尽全力为德国备受苦难的劳动群众的利益辩护，但他的目光并不是仅仅盯住德国，除此之外，他还密切注意英法两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当时这两个国家的工人运动正出现新的高潮。1842年是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高潮迭起的一年。4月22日，英国工人在伦敦召开第二次宪章会议，向英国众议院提出了第二个请愿书，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就有三百三十多万人。这样一些令人瞩目的事件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所发生的作用是很大的，他发现“一无所有的等级”同这些事件对他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1842年10月15日，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写道：“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即使没有斯特拉斯堡的演说，也不论奥格斯堡如何保持沉默，它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①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一无所有”的等级即无产阶级提出占有资产阶级财产的要求，并且看到了这个阶级组织起来的力量。这一切不但促使他进一步注意这一阶级的动向，而且促使他开始研究和阐明这个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1页。

马克思当时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对备受苦难的贫苦群众命运的关心，特别是发现“一无所有的等级”的不同的作用，促使马克思去关心和研究共产主义的问题。就在上述论文中，马克思第一次表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认为当时欧洲大陆上广为宣传的共产主义，还没有经过“理论论证”，还不具备“现实性”。但他认为有两个民族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因而认为共产主义具有“欧洲的意义”，应该进行严肃的研究和讨论。他特别反对那种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谈论共产主义问题的做法。他就曾经把当时柏林青年黑格尔派所谓“自由人”关于这个问题的大批来稿当作废纸处理。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知识。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①这些话表明，马克思在否定那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同时，正准备从实际出发，采取另一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这样，马克思在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就迈开了最重要的一步。

在马克思的主持下，《莱茵报》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愈来愈发展，它同普鲁士反动政府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愈来愈尖锐。1843年初，《莱茵报》终于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了。这一点马克思是早就预料到的。但他不能向专制制度妥协，而是要坚决斗争下去。因此，他并不把《莱茵报》的被查封看作是挫折，而看作是一种精神解放，按他的说法就是可以更加放手大刀阔斧去进行斗争，而不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为了报纸的生存而周旋应付、委曲求全。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政府把自由还给他了。^①

马克思参加《莱茵报》的斗争不到一年时间。但是这段时间的生活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却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后来，马克思在回忆这段生活对他的思想发展的意义时写道：“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②这段生活不仅使马克思经历第一次社会和政治斗争的锻炼，使他获得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斗争知识和经验，而且使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物质利益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从而动摇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促使他同青年黑格尔派的朋友们决裂。同时，这段生活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进一步探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因而成为他最终转向唯物主义以至发现唯物史观的起点。

第三，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编辑出版《德法年鉴》，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马克思退出《莱茵报》以后，立即动手探讨解决他在办报期间所遇到的疑难问题，用他的话说，就是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由于实际生活使他怀疑黑格尔法哲学的正确性，因此他首先做的工作就是对这一哲学进行批判。

马克思在主编《莱茵报》过程中所遇到难题主要是国家政治制度和物质利益领域的关系问题，用马克思当时的说法，就是国家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

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实际斗争经验使马克思意识到，不能象黑格尔那样，用国家来说明市民社会，但可否用市民社会说明国家，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论证。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就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利用了他在办报期间所积累的实际经验，而且对世界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1843年夏天开始，在两三个月之内，他广泛地阅读了有关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瑞典等国的历史著作，特别是仔细研读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著作，写满了五个笔记本，这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历史的经验帮助马克思正确地理解实际的经验，这些研究对于马克思解决那些苦恼着他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研究马克思这段时间的活动和著作，还应该看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他的影响。自1830年以来，费尔巴哈发表了一系列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和宗教的著作，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在费尔巴哈看来，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或“绝对精神”为转移的；不是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创造自然界，相反，是自然界产生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黑格尔颠倒了这一关系，并且走到了极端，“绝对精神”成了创造一切的“上帝”的化身。针对黑格尔这种颠倒，费尔巴哈提出一个著名的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原则：把黑格尔弄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他说：“一般思辨哲学的改革宗教的批判方法，与宗教哲学曾经应用过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明显的真理。”^①

费尔巴哈这种唯物主义的批判原则，启发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就是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02页。

从费尔巴哈这种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出发的。黑格尔的法哲学，把国家的理念当做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理念成为主体，而市民社会则是这一主体的客体。马克思指出这是赤裸裸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如果理念变为独立的主体，那末现实的主体（市民社会、家庭、“情势、任性等等”）在这里变成和它们自身不同的、非现实的、理念的客观要素。”^① 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是建立在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之上的。但在黑格尔那里，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他的产品的产品。这是倒因为果，倒果为因。马克思象费尔巴哈那样，把黑格尔这种神秘主义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明确地得出结论：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主体、才是原动力。这样一个结论标志马克思已转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

1843年10月，为了筹备出版《德法年鉴》杂志，马克思到了巴黎。在这里，马克思同“正义者同盟”和法国的秘密工人团体建立联系，参加工人的集会。法国工人运动对马克思彻底转向共产主义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1844年初出版的《德法年鉴》杂志上，马克思发表了两篇论文《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一些书信。这些文献最重要的成果，是从唯物主义出发阐明人类解放的实质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以及阐明哲学和无产阶级的关系；表明马克思已由革命民主主义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同时表明他在哲学观点上获得了新的进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0——251页。

首先，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局限性，论证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区别。这篇论文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错误观点而写的。鲍威尔把犹太人的解放归结为纯粹宗教问题，并且认为随着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完成便会实现人类的解放。马克思认为，把宗教上的解放看作是人类解放的实现，是完全错误的。他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宗教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国家同宗教分离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这种解放并没有触及大厦的基础，并不侵犯私有财产，因此，政治解放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马克思认为，只有废除私有财产的统治，才能克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局限性，人类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其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解决了由谁来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人类解放只有通过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这样的历史任务不是任何阶级都能承担的。马克思认为，这种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①。马克思认为，这一阶级已经形成。它是同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并且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所以，这个阶级不但有彻底废除私有制解放全人类的要求，而且有实现这一解放的力量。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再次，在哲学观点上，马克思也获得了重要的进展。他既批判地吸取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重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改造，使他对一些重要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6页。

会生活问题的分析，贯穿了唯物辩证的观点。

在当时德国的社会生活中，宗教问题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鲍威尔把宗教当作社会压迫的根源，把社会解放归结为废除宗教。马克思在批判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时指出，现实生活证明，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如美国），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备并不矛盾，把宗教当作产生国家生活一切弊病的根源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①

这段话非常鲜明地表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费尔巴哈说过，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马克思对宗教的看法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但马克思的观点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在费尔巴哈那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说明宗教，没有发现社会压迫和剥削是产生宗教的根源。马克思不但认为人创造宗教，而且发现创造宗教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处在“世俗桎梏”之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对这点作了更为明确的阐明。他说：“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既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

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①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现实苦难的表现。这些话表明，马克思已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和费尔巴哈用抽象的人来说明宗教相差甚远了。

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也提出了十分深刻的观点。他在谈到德国革命两种斗争形式的关系时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 *ab hominem*〔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 *ab hominem*〔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②物质力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但革命理论并非不重要。马克思认为，反映事物本质的理论可以掌握群众并转化为物质力量。在这里，马克思已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阐明历史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辩证关系。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开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批判改造，他特别重视黑格尔关于矛盾问题的论述。黑格尔认为，每一个对象、现象，都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这种内在矛盾的发展必然会导至对象自身的否定和扬弃，矛盾是对象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认为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之处。但是，马克思也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和调和矛盾对立的不彻底性。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在矛盾的对立面之间设置一个“中介”，认为这一“中介”的作用，就是把对立面导向调和、消失。所以，黑格尔虽然处处强调矛盾的对立，但当涉及到矛盾的解决，他就陷入调和论。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调和矛盾的错误，同他的唯心主义观点是分不开的。他把矛盾理解为本质的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页。

② 同上书，第460页。

念中的统一，把“中介”作用归结为抽象逻辑的思辨奥秘，这样就否定了矛盾的客观性，并把解决矛盾的方式归结为思想上的虚构和推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错误中，论证了矛盾的客观存在，即把矛盾看成是事物本身的矛盾。他认为，矛盾的本质不是理念中的统一，而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即本质的矛盾。换句话说，现实生活中的差别、对立和斗争，才构成矛盾的本质。马克思说：“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象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①这些话表明，马克思与黑格尔根本不同，他认为应该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研究现实矛盾的根源和发展变化，研究特殊对象的特殊的矛盾发展规律。由此出发，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矛盾对立的性质。他认为，现实的矛盾在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它不需要任何中介，也不能被中介所调和。这些观点说明，马克思在这个时期通过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改造，已初步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建立了一种矛盾发展观。

最后，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还谈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哲学和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曾经指出，党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伟大最宝贵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基础，早在1843年就已奠定了。列宁首先指出1843年10月20日马克思给费尔巴哈的信，他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指出，谢林是个无聊的牛皮专家，他妄想包罗和超越一切已往的对立的哲学派别，是完全徒劳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9页。

言》中，则明确地表述了哲学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他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①“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②显然，在马克思看来，新的哲学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武器。这样，马克思就明确地阐明了他的哲学的崭新的性质和与旧哲学完全不同的历史作用。

研究这一时期马克思的著作可以看到，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表述了一些崭新的观点，他已在形成自己崭新的哲学中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个时期马克思分析问题主要还是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作为理论出发点，他对不少问题的阐述还不可避免地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痕迹。因此，不能把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估计过高，不能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已经成熟。

二、青年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象马克思一样，他在青年时代也经历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生于莱茵省的巴门市，父亲是一个纺织工厂的厂主。与马克思的开明的家庭不同，恩格斯的家庭充满了保守主义和虔诚主义的气氛。他父亲虽然性情豪爽，富有事业心，但在政治上宗教上却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人。恩格斯不得不从一开始就要同这种保守主义和虔诚主义的精神枷锁作斗争。但是，恩格斯生活在工业区，他比马克思优越之处，是从小就接触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到工人，目睹工人的非人的苦难生活，同时也比马克思更早地看到工厂主如何依靠工人的牛马般的劳动而发财致富。1839年3月，恩格斯写了他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乌培河谷来信》。在这里，他十分详尽地描写了工人的苦难生活，揭露资产阶级的冷酷无情和伪善。所以，恩格斯虽然比马克思小两岁，但他比马克思更早地接触到最下层的人民、特别是工人的苦难生活。这使青年恩格斯很快便由自由主义转向革命民主主义。

1834年，恩格斯进了爱北斐特的市立中学读书。与巴门市的家里不同，在这里占统治地位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对于一直处在保守主义和虔诚主义的严格管教下的青年恩格斯，这种自由主义思想象一股清风吹开了他那热爱自由的思想闸门。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科学、文学、艺术、音乐和语言学的书籍，特别是喜欢阅读小说和骑士故事，把传说中的英雄当作自己的榜样，表现了对独立与自由的热烈的追求。但是，这种追求当时还是很朦胧的。这种追求获得比较具体的内容，是从1838年夏天离开故乡巴门市到不来梅以后开始的。恩格斯的父亲是工厂主，他的打算是把儿子也造就成为一个工厂主、商人。1837年恩格斯中学未毕业，父亲就强迫他在自己开办的商行中当助手，1838年又送去不来梅学习经商。但是，青年恩格斯的兴趣完全不在商业上。他的兴趣贯注在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和体育上。他在语言上具有非凡的才能，十九岁时就懂得了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文字。这使恩格斯获得了广泛阅读各国的书籍、报纸的条件。加上他一贯同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使他愈来愈关心社会生活和现实的政治问题。这时候，恩格斯写了不少政治诗和通讯。这些作品，特别是《乌培河谷来信》，已经鲜明地表现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倾向。他已经看到了工人群众的利益同工厂主的利益不可调和的对立，并且感到只有依靠那些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才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所以，这时候

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是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这一点正是革命民主主义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差别。

1839年4月，恩格斯开始研究哲学和批判神学，开始接触正在兴起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潮。这时，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一书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施特劳斯(1808—1874年)是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他在《耶稣传》中，把耶稣由救世主写成普通的凡人，认为圣经里的奇迹并非真有其事，而是神话。恩格斯从施特劳斯这部著作中得到启发，使他克服了对宗教信仰的踌躇，得出无神论的结论。这个时候他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和转向青年黑格尔派，也同施特劳斯的影响密切相关。1839年11月13日，他在致格雷培的信中就谈到了他这一思想发展。他说：“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①1840年1月21日，他又在另一封信中写道：“由于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光大道。我当然不会成为象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吸取这个精深博大的体系中最重要要素。”^②当时，他正在钻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每晚都读这部巨著，用他自己的说法，他完全被黑格尔的宏伟思想吸引住了。他赞同“黑格尔关于和上帝本质上是同一的”、“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发展”^③这样一些基本观点，认为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他的观念。但是，青年恩格斯并没有盲目崇拜黑格尔主义。他这个时期写的书信、论文，鲜明地表现了他的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40页。

② 同上书，第544页。

③ 同上书，第546、547页。

敏锐的分辨能力。当时他已密切地注视着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争论。他认为前者如甘斯、罗生克兰茨、卢格等人，继承和发扬了黑格尔主义，只有这些人才配称为黑格尔的学生，而那些右派、保守派则损害了黑格尔主义。这说明，恩格斯当时已从青年黑格尔的观点出发去理解和接受黑格尔主义，试图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得出革命的结论。

在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的争论中，恩格斯反对前者而同后者站在一起。但是他同青年黑格尔派也不是没有分歧。他特别不满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哲学的思辨性，反对把一切归结为纯理论批判。他认为德国的出路在于把理论斗争和实践斗争结合起来。他非常推崇白尔尼，认为他是一位政治实践家，而黑格尔仅仅是位思想家，因此，他认为时代的任务就在于完成黑格尔思想和白尔尼思想的相互渗透，在于思想和行动的结合。恩格斯为黑格尔的思想所吸引，又充满着斗争的激情。他认为青年人要以顽强的劳动去掌握新的哲学，同时又不丧失青年人的热情。谁畏惧斗争，谁就不能获得真理。他满怀渴望斗争的激情写道：“只要我们还年轻、还富有火热的力量，我们就要为自由而斗争。”^①这些思想说明，这个时期恩格斯虽然赞同青年黑格尔派，但由于他主张把哲学研究同实践斗争、理论同政治结合，因而又在一个基本出发点上同青年黑格尔派区别开来。这一点同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所持的观点是十分相似的。

1841年9月，为了服兵役，恩格斯到了柏林。在这里，他很快就同柏林青年黑格尔小组的成员来往，参加他们的活动，特别是直接参加了批判谢林的斗争。谢林是普鲁士反动政府特意请来柏林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但实际上，他批判的矛头是指向青年黑格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76页。

派。恩格斯刚到柏林不久，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就在柏林大学开场。他站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立场上大肆攻击黑格尔，鼓吹“启示哲学”，力图使理性从属于宗教。青年恩格斯和他的朋友们自始至终旁听了谢林的讲演，并坚决地回击了谢林的挑战。谢林是在1841年11月15日第一次登台批驳黑格尔的；过了一个月，恩格斯就发表《谢林论黑格尔》一文，开始了他批判谢林捍卫青年黑格尔派的斗争。1842年3月和5月，他又先后出版了两本批判谢林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对绞杀自由哲学的最新反动派的批判》和《谢林——基督的哲学家》。在这些著作中，恩格斯把批判谢林看作是捍卫自由事业的政治斗争。他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出发，批判谢林的“启示哲学”。谢林早年曾经相信过理性和自由的力量，现在则背弃了这一切，鼓吹非理性主义，力图使理性屈服于神秘的启示哲学。这样，他就同反动派站在一起，成了基督教国家的卫道士。

批判谢林的斗争，表明恩格斯当时站在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前列。但不能由此得出恩格斯是一位十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的结论。恩格斯从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出发去理解和维护黑格尔。但他同鲍威尔等人所鼓吹的自我意识哲学（即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不同，他坚持的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因此，他并不赞同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所主张的纯理论批判，不赞成他们把自由归结为主观随意性。在这一点上鲍威尔等人的观点同谢林的主张却不谋而合。恩格斯在批判谢林把“自由和任意这二者混在一起”^①的错误时，明确地指出：“只有本身包含着必然性的那种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是真理，是必然性的合乎理性。”^②这种观点，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恩格斯当时已注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63页。

② 同上书，第264页。

批判地吸取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使他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

恩格斯实现世界观的转变，是到了英国以后。他是1842年11月下旬到达英国的曼彻斯特的。与德国不同，当时的英国已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已开始暴露。经济危机、工人运动、政党斗争等等，已成为常见的社会生活现象。初到英国时，恩格斯还对这种现象作唯心主义的理解。象马克思主编《莱茵报》一样，恩格斯到英国也遇到如何理解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他从黑格尔主义出发，认为英国人如此重视物质利益是违反原则的。他在给《莱茵报》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对于一个执迷不悟的不列颠人，无论如何也讲不明白在德国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一点，那就是所谓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也不会是独立的主导的目的，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指出历史进步的原则服务。”^①在当时的恩格斯看来，物质利益在英国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只是一种例外。但是，事实是不能回避的。在同一篇文章中，恩格斯在批评英国人过分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又认为不能忽视这种事实。因此，他打算把原则放在一边而去研究物质利益的作用问题。这一研究的结果，就使他放弃唯心主义的“原则”，转到唯物主义上来。

英国的工业发展及其社会后果，特别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首先吸引了恩格斯的注意。他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在英国，工业的发展虽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同时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洗、勉强度日的无产者阶级”^②，按人数来说，这个阶级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由此，恩格斯考察了英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英国工业发展造成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而革命的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英国人所特有的宗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6—547页。

^② 同上书，第549页。

观念还在阻碍着工人阶级用暴力革命来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的统治。但是，“怕饿死的心情一定会超过怕违法的心情”^①，矛盾的发展一定会使工人们意识到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无产者的物质状况才能改善。恩格斯写道：“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象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②显然，恩格斯已试图从物质利益方面的冲突中寻找革命产生的根源。

当时英国上下围绕着“谷物法”的争论，进一步加深了恩格斯对物质利益作用问题的认识。恩格斯发现，在这一争论中，每个阶级都是从本身的利益出发的；而参与辩论的各党派，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为维护一定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恩格斯指出，英国有三个大党：土地贵族的党、金钱贵族的党和激进民主派的党。第一个党叫托利党，按其性质和历史发展来说，是一个纯粹中世纪式的反动透顶的党，它代表的是旧式贵族和大地主的利益。第二个党是辉格党，是以商人和工厂主为核心组成的。第三个党是宪章派，是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工人阶级的党，工人阶级愈来愈认为宪章派的激进民主主义原则，是他们的集体意识的表现。在谷物法问题上，这些党派彼此采取的态度，非常鲜明地表现了它们的性质。托利党顽固地反对废除谷物法，因为如果谷物自由输入，贵族就要按对自己不利的条件和租佃人签订新契约。辉格党主张谷物“自由贸易”，要求废除谷物法，但主张实行固定关税率，以保持谷物价格稳定在原来的水平上，因为这对商人和工厂主有利，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恩格斯由此得出结论：在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51页。

② 同上。

国，各个政党都有与它相当的社会阶层和阶级。这样，通过考察在谷物法问题上的斗争，恩格斯看到了政党的阶级基础以及阶级的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支配作用。

由于同英国工人运动的紧密联系和对工人处境的深切了解，恩格斯密切注意着欧洲大陆共产主义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他写了《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批判性地考察了当时流行于英、法、德的各种共产主义派别。从这一考察中他得出结论：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已经不可避免。他指出，这个结论是由上述每个国家各自单独得出来的，“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①每个国家有不同的背景，可以走不同的道路，但一切国家、一切不同的道路，都必然会汇合到共同的目的地——共产主义。

那么，什么是共产主义呢？这时候的恩格斯象马克思一样，首先分析了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民主制之间的根本区别。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骗人的、伪善的，它所鼓吹的政治自由是假自由。只有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才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恩格斯考察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共产主义派别，对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魏特林等人的观点进行了具体分析，肯定了他们的思想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同时指出了他们的不彻底性。例如，对傅立叶对于人天生就爱好劳动、劳动与享受应该同一、协作的优越性等观点，就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但也指出傅立叶主义不主张废除私有制的不彻底性。在恩格斯看来，废除私有制，实行集体所有制，则是共产主义最基本的特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5页。

恩格斯这些观点在他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论文中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这就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两篇论文表明恩格斯已实现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恩格斯在英国，一方面深入调查英国社会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又加强理论研究，试图在理论上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这样一种追求，促使恩格斯去研究经济学问题。被马克思称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天才大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直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为的是替私有制作辩护，它是“发财致富的科学”。恩格斯则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研究了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后果，认为竞争、危机、垄断、劳动与资本等等矛盾，都同私有制的存在有关。他认为，劳动与劳动的材料最初是统一的，由于私有制的出现才打破这种统一，形成积累起来的劳动同活生生的劳动的分离和对立。这种积累起来的同活生生的劳动相对立又支配着后者的劳动，就是资本。所以，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是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并且导致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恩格斯指出，由于私有制固有规律的作用，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的分裂和对立必然会日益加强，从而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很明显，恩格斯这时已放弃了他初到英国时的唯心主义观点，转而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去分析、理解社会生活现象了。

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另一篇文章《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借评论卡莱尔一本书的机会，继续对英国社会状况的实质进行唯物主义的分析。恩格斯指出，卡莱尔的书揭露了英国的一些真实情况，但他把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病归因于无神论，是没有根据的。恩格斯从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概括地揭示英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并且认为产生这些矛盾的

原因在于私有制。恩格斯认为，卡莱尔批判无神论，求助于创立泛神论的英雄崇拜，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他指出，我们不能使世界和人依附于某种神的恩典，因为神不过是由于人在自己不发达的意识的混乱材料中的反映而已，神就是人。因此，人无需在自身之外去寻找真理。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①。

恩格斯在这里论证问题的理论出发点仍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是，恩格斯又不停留于人本主义。他比费尔巴哈更重视现实和历史。他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②解开“现代的谜”，必须求助于“人的启示”或“历史的启示”。这个时候，恩格斯已经把“人”放到现实的社会生活和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去理解，已经由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由此出发，他认为“现代的谜”不是民主主义，因为民主主义只是个过渡阶段，是向真正的人类自由过渡的阶段。在他看来，这个“谜”就是社会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这时候的恩格斯象马克思一样，认为解决当代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共产主义，同时也明确了应该依靠谁来实现共产主义。他在批判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时指出，“天才”的社会使命就在于唤醒和带动别人。“天才”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自己思想的正确，因为正确的思想被群众掌握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在恩格斯看来，实现共产主义，达到人类解放的力量不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

② 同上书，第650页。

“贵族”、脱离群众的“英雄”，而在群众中。他写道：“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①。这些论述表明，恩格斯象马克思一样，认为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达到人类解放。

恩格斯初到英国时，对英国的社会状况很不理解，认为英国是当时欧洲最落后的国家。经过对英国社会的深入了解和研究，恩格斯不但发现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而且看到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意义。他说：“英国状况对历史和其他所有国家都有很大意义，因为在社会关系方面，英国无疑地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国家。”^②恩格斯对社会生活现象的分析，尽管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在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上已经超越费尔巴哈，而向历史唯物主义前进。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 新哲学在探索中前进

从1843年底至1844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同时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但是，世界观的转变，还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在这之前，他们对旧社会的批判研究还局限在宗教、哲学和政治的领域。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最初的尝试。这一尝试是有成效的，但还没有完全摆脱抽象人道主义的影响和伦理空想的性质。马克思受到恩格斯这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8页。

^② 同上书，第655页。

大纲的启示，强烈地感到，要揭示社会历史的奥秘，必须由针对“副本”（宗教、哲学、政治）的批判进到针对“原本”（经济基础）的批判，必须研究经济学。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便开始了新的探索时期。

一、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 对物质生产决定作用的初次论证

马克思受到恩格斯的影响，于1843年秋天到达巴黎以后不久便开始了对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到1844年8月，他先后研究了斯密、李嘉图、萨伊、詹姆斯·穆勒、西斯蒙第等经济学家的著作，试图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三个未完成的手稿。在马克思生前，这些手稿没有发表，直到1932年才在德国第一次以《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的书名公开出版。

这部手稿虽然不是一部完整的系统的具有严密结构的著作，但却代表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为创立新的哲学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为自己提出了两个需要加以解决的任务：阐明私有制的本质和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的根源。为解决这两个任务，马克思首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他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资本、地产和劳动的分离当作任何生产的前提，这使他们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们肯定劳动是一切财富的价值源泉，另一方面，他们又肯定资本家对劳动产品的占有，肯定私有制。他们把应当加以研究的东西当作前提。马克思认为，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弄清私有制的起源和本质，弄清资本、地产和劳动分离的根源。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强调要“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

发”^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贫穷、越变成廉价的商品。这样一种事实，许多资产阶级学者也是承认的，但他们不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而是自古就有的现象。马克思认为，要正确地理解这些事实，就要把对象化和异化区分开来。他说：“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②

在异化理论发展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把异化和对象化区别开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哲学史上许多学者早就运用过“异化”概念，到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概念才变成一个哲学范畴。黑格尔讲绝对观念的异化，把异化和对象化混为一谈，认为绝对观念对象化为自然、社会和思维，也就是绝对观念的异化。这就把异化当做超历史的永恒的范畴。马克思把异化和对象化区分开来，说明劳动对象化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现象，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异化只是“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即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特有的现象。由此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应用异化概念，是严格地限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的。异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现象。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表现在所有领域，但最基本的是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这一概念是马克思的创造。马克思试图通过这一概念揭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实质。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的本质特征。它首先表现在：“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页。

② 同上书，第91页。

异己的对象的关系”^①。工人生产了产品,但他不能占有这些产品。他生产的产品越多,他能够占有的产品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所以,工人生产了产品,也就生产了与他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但是,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异化,那么,生产行为本身就必然是能动的异化。所谓劳动本身的异化,指的是对工人说来,劳动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而是外在的与他相对立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种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是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②人的劳动本质完全异化了。

马克思在论述异化劳动第二个规定时,区分了“物的异化”和“自我异化”。工人的劳动产品同工人相异化,是“物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是“自我异化”。“物的异化”是“自我异化”的结果和表现,“自我异化”是“物的异化”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自我异化”是异化劳动概念最本质的规定。

由上面两个规定,马克思又得出异化劳动第三和第四个规定。人的“类特性”“类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由于这种活动(劳动)本身发生异化,因而人的类本质也发生了异化。体现人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② 同上书,第94页。

类本质的劳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人的“类本质”也就变成了人的异己的本质，人也就不能成为“人”。最后，由于这一切异化，结果就产生了人与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人的异化，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如果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那是因为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这一对象的主人。如果人自身的活动是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是因为这是受他人支配、为他人服务、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所以，人生产出不属于他、反过来统治他的产品，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生产出资本家同这个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同工人的对立。

在这里，马克思接触到了他研究经济学需要弄清的核心课题：私有制的起源和实质。从上面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他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断言私有制是从来就存在的，似乎从私有制可以得出外化劳动的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象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②这一点在私有财产发展到最后、最高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就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化为工人和资本家这两极，资本家占有的私有财产是由工人所创造的，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私有制的存在又成为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这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

② 同上。

候，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关系又成为互为因果的关系。这样，马克思就论证了私有制的历史性。

阐明异化劳动产生私有制，还必须进一步弄清劳动本身如何异化的问题；只有弄清这个问题，才能彻底弄清私有制的起源和实质。马克思说：“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样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当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①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的产生是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人类活动本身、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异化劳动的最初形式，就是人的本质力量不发达的后果。这里所谓“人的本质力量”实际上就是后来马克思加以阐明的“生产力”。显然，这些论述已经包含了生产力起最后的决定作用的思想。

这样，马克思就阐明，不论是私有制还是异化劳动，都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必然会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归于消灭。根据这一点，马克思把扬弃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同共产主义的前途联系起来，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这时候虽然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影响，但由于他试图从经济的内在矛盾出发去揭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在向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前进中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在哲学世界观、特别是在历史观上，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及其后果的分析，已经阐发了若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2页。

的思想。他把劳动的异化看做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精神生活异化的根源，把商品、货币、资本，以及各种对立的社会关系，以至国家、法律和道德等意识形态，都看成是异化劳动的产物。他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只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①“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②。这些表述虽然还不十分精确，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指出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因而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另外，在《手稿》中，马克思还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包含的辩证法的积极因素进行批判改造。他特别肯定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但是马克思也批判了黑格尔劳动观的唯心主义性质，并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阐明了劳动的作用和意义，从而在历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上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

但是，还必须看到，《手稿》还不是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时候马克思还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手稿》中许多闪光的思想往往还采用旧哲学的术语来加以表达，内容和形式还不一致。因此，又不能把这一手稿评价过高。

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 论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是同青年黑格尔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马克思主编《莱茵报》和恩格斯去了英国以后，他们就走上了一条以青年黑格尔派完全不同的道路。青年黑格尔派以鲍威尔兄弟为首，沿着资产阶级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② 同上书，第131页。

由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在哲学上则鼓吹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哲学。他们用“自我意识”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把“自我意识”看做是决定一切的动力，并由此出发，公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倾向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一切实际斗争，鼓吹批判就是一切，就是目的。他们认为群众是消极的、非批判的，唯有“批判家”才是创造历史的积极因素。而当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实现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这样，一场斗争就不可避免。1844年8月，恩格斯在从英国返国途中路经巴黎与马克思会见时，他们发现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都感到有必要彻底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这一有害的思潮。于是，他们便共同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一书。

《神圣家族》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在历史观上阐述了一系列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如关于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问题，鲍威尔等人认为是“自我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不能离开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不能离开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来考察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粗糙的物质生产中。《神圣家族》对这个问题的论证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进了一步，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的基本思想，即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思想。因为马克思看到了生产过程中人和实物异化关系后面的社会关系，他写道：“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存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①这表明马克思深化了对物质生产的认识。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光辉的思想，是对人民群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

创造历史伟大作用的论证。针对鲍威尔兄弟唯有作为“自我意识”的化身的“批判家”才创造一切的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创造一切”^①。群众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精神财富，在这一点上，也会使“批判家”们感到羞愧。至于把历史活动的失败归因于群众的参与，更是胡说。马克思认为，恰恰相反，只有得到群众支持和参加的历史活动，才能获得成功。马克思以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例。他说，这次革命是“成功”的，因为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利益，唤起了群众的热情，依靠群众的力量推翻封建统治并打破了封建王朝的复辟阴谋。但它也有“不成功”的地方，这种不成功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恰恰相反，是因为这次革命并不代表群众的实际利益，群众得到的只是“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空洞的诺言，他们参加革命的热情只是暂时的。这就具体阐明革命的成败，在于是否取得群众的支持。决定历史命运的不是作为“自我意识”化身的“批判家”，而是人民群众。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批判了鲍威尔一伙唯心主义的种种表现，而且揭露了它的理论来源和认识论根源。鲍威尔等人自吹自擂，声称他们“克服了黑格尔哲学”，实际上他们鼓吹的自我意识哲学，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恶性发展。他们象黑格尔一样，把世界归结为抽象的逻辑范畴，把现实的东西说成是假象，而把精神的东西说成是真正的实在，这就颠倒了精神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认识根源来看，这种颠倒是把个别和一般割裂开来，把具体的个别的東西仅仅看作一般概念的形式。比如，“果实”的概念，是现实的具体的水果的反映。但是，思辨哲学家相反，把这个概念变成现实的水果的真正本质或基础，现实的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2页。

体的水果就变成“果实”概念的存在形式。这样，现实的具体的水果的本质，就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自然的属性，而是硬给它们塞进去的用以代替这些属性的“果实”这一概念。但是，现实的水果是千差万别的。为了从“一般果实”过渡到具有多样性的现实的水果，思辨哲学家同样求助于思辨方法。他们认为“一般果实”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通常的千差万别的果实是“统一的果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它们是“一般果实”本身所形成的一些结晶。比如，在苹果中“一般果实”让自己象苹果一般存在，在梨中就让自己象梨一般存在。因此，我们不能说梨是“果实”，苹果是“果实”，扁桃是“果实”；相反地应该说“果实”确定自己为梨、苹果、扁桃；苹果、梨、扁桃相互之间的差别，正是“果实”的自我差别，这些差别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一般果实”生活过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这样，现实水果的多样性就成了“果实”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多样性的产物。思辨哲学家把人们从一般到个别的思想活动说成是绝对主体的独立性，看成为概念创造实物存在的过程，“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① 思辨结构的秘密就在于把从感性的现象中形成的抽象的概念独立化和对象化，变成为真正实在的创造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的主体。这样一种办法，正是典型的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方法，所不同的是黑格尔从他的辩证法出发，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质的、真实的叙述，而在他的模仿者那里却纯粹是一种虚构。通过揭示思辨结构的秘密，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明确地、唯物主义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奠定了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5页。

恩格斯在英国期间，曾经全面地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1844年9月，他从英国返回巴门市以后，立即着手用他掌握的实际材料和研究成果撰写专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于次年三月完成本书的写作。列宁对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的地位，评价是很高的。他指出，在恩格斯以前已经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指出了帮助无产阶级的必要。但是，他们都未能科学地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在历史上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由于它所处的经济地位，它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能够达到最终解放。但是，这部著作象马克思恩格斯同一时期其他著作一样，还不是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887年恩格斯本人在谈到这本书时，就认为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德国古典哲学的痕迹。例如强调共产主义不纯粹是工人阶级政党的学说，强调其最终目的就是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窄的范围中解放出来等等。恩格斯认为，这些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有害的。因为“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①。所以，对这本书同样需要放在恩格斯的思想形成过程中来进行评价。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1844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一年的时间并不长，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世界观的探索获得了重要的突破。他们虽然还没有摆脱黑格尔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但在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他们已突破了这种影响，大体上已发现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这表明他们已踏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门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7页。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理论创造活动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中发生了影响，并且引起德国反动政府的注意。1845年初，法国政府应德国反动政府的请求，下令驱逐马克思。于是马克思被迫移居布鲁塞尔。不久恩格斯也到达那里。当时，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正在兴起。但是，由于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些运动又无法健康地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地感到，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因此，从1845年初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创立这一科学的世界观，进行了创造性的创作活动，先后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光辉著作。这些著作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已经成熟，标志他们在哲学上实现了革命的变革；同时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过程的开始。

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旧哲学的批判 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特点的论证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称《提纲》)是马克思于1845年初写的，到1888年才由恩格斯作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第一次公开发表。恩格斯认为，这一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提纲》是第一篇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旧唯物主义、特别是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的著作。这说明马克思不仅同一切唯心主义划清了界线，而且同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线。

其次,《提纲》通过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根本缺陷的批判,概括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特点,为进一步阐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确定了纲领性的基本路线。

《提纲》开门见山就提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①

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分歧。旧唯物主义哲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是看不到社会实践在人的认识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使他们在认识论上陷入直观性,在社会历史观上则陷入唯心主义。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他只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他有时讲到实践,也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根本不理解革命实践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他无法超脱人本主义的局限性,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所谓实践,指的是改造世界的感性活动、革命的实践。与旧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看到了环境对人的作用,而且看到了人对环境的改造,人正是在改变环境中改变自己的,即看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旧唯物主义不理解人作用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意义,看不到认识过程的主观的能动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真理性的标准。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上，这是第一次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了认识论。

由于对社会实践及其作用的不同理解，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分歧。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离开实践，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比如对宗教产生的根源以及克服宗教的道路问题，费尔巴哈是试图用唯物主义的原则来解决的。他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用人的世界来解释宗教世界。但是，由于他看不到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只能停留在用抽象的人的世界去解释宗教世界，并且把克服宗教归结为认识活动。马克思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象费尔巴哈那样，停留在用世俗基础说明宗教世界上，而必须进一步分析世俗基础本身，这才是最主要的。马克思说：“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身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②在马克思看来，产生宗教的根源是世俗基础、即社会经济基础本身的分裂、矛盾和对立，因此克服宗教的根本途径是通过革命实践改造这一基础，以消灭这一基础本身的分裂和对立。

费尔巴哈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也就是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4页。

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当费尔巴哈进一步阐明什么是人的本质时，就立即暴露了他的唯心主义实质。马克思指出，由于费尔巴哈不理解社会实践的作用，他就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没有看到宗教意识是社会的产物。他把人理解为孤立的个体，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这个“人”是抽象的人。从这样一个孤立的抽象的人出发去阐明宗教，最后只能把产生宗教的根源归结为人认识上的谬误。这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中，科学地阐明了人的本质，从而科学地阐明宗教意识产生的根源。他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所以，“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表明他已完全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局限性，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论断为科学地理解社会生活现象和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提供了钥匙。

最后，《提纲》在总结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时，概括地指出“新唯物主义”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之点，指出“新唯物主义”的主要特征。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新的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但要在实践中科学地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② 同上书，第5、6页。

识世界、解释世界，而且要在实践中革命地改变世界。马克思在这里鲜明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完成的革命变革的实质。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制定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德意志意识形态》(下称《形态》)写于1845年至1846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位创始人第二次合作撰写的巨著。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全面地清算了他们过去的哲学信仰，特别是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是全书的精华部分。这一章有一个副标题：“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不是针对某些枝节问题，而是针对他们的整个唯心主义历史观。当评论到费尔巴哈的整个哲学思想时，他们就这样写道：“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①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者，但在历史观上却背叛了唯物主义原则陷入了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这种不彻底性，是一切旧唯物主义所共有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也就包含了对过去一切唯物主义的批判。

《形态》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批判，始终抓住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是意识决定生活，还是生活决定意识。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施蒂纳等人认为，“自我意识”是社会历史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的源泉和动力，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自我意识”的产物。因此，作为“自我意识”的化身的“思想家”、“批判家”、“智者”是历史的唯一的创造者。费尔巴哈与鲍威尔等人不同，他从“人”出发，形式上是现实的。但他把人仅仅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就是说他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一样，离开社会实践、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人，只限于在感性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因此，在费尔巴哈那里，“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①他认为，这种“爱与友情”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不论是青年黑格尔派还是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都用意识来说明生活、说明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历史观的根本出发点上加以研究。他们说：“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東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出发点是从事实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②意识是现实的生活过程的反映，即使是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错误的东西，也可以在物质生活过程中找到其根源。人们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总是受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所制约，并且随着后者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③ 同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创立科学的历史观，就必须抛弃唯心史观的观察方法，即抛弃关于意识的空话，转而研究现实的、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活动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他们指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象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象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①他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方法去研究现实生活过程和人的历史发展，创立科学的历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阐述他们发现的科学的历史观的前提。他们指出，这种前提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的。这一前提就是“物质生活条件”，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②科学的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第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生产引起的这种新的需要又成为推动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动因。第三，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前提条件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同时又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② 同上书，第31页。

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德国除外)从属的关系了。”^①最后，还有地理环境、地质和气候等自然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上述几个方面构成了物质生活条件，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这些条件便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科学的历史观必须以这些条件作为前提。

确定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就在出发点上同唯心史观、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立了起来，但还没有解决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这就需要进行进一步剖析物质生活条件本身。《形态》指出：“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②这种“双重关系”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此，在这双重关系中，人们的“共同活动方式”即“生产力”起决定作用。这就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表述了物质生产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但还没有发现生产过程的双重关系，还没有从纷纭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形态》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发现了生产过程的双重关系，确立了生产关系的概念，表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在《形态》中，采用“社会关系”、“市民社会”、“交往关系”、“交往形式”、“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等术语来表示“生产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33页。

^② 同上书，第33页。

系”这一概念。采用这众多的术语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还不能确定采用那一个术语才能科学地表达这种客观关系，但他们已在这些术语下面揭示了这种关系的主要内容和实质。他们认为，在生活生产过程中，人们在同自然发生关系的时候，人们之间也必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在不同的条件下，这种“合作”关系的方式和目的是不同的，但不论是哪一种方式的关系，都是由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所以，他们实际上已确立了生产关系这一概念。

《形态》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谈到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①人们只有在结成一定关系这个“前提”下才能进行生产，但这种交往的形式、即生产关系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形态》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当作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加以阐述。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关系则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因此，起初它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就会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于是，“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的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 *à son tour*〔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②这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而改变自己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

② 同上书，第81页。

形式，整个历史过程就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发展的序列。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次考察了这一序列。他们认为，与不发达的生产阶段相适应，最初的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此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依次出现了“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最后，资本主义所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那种把社会变迁归因于“占领”的观点。他们认为，占领的性质、占领后采用何种社会制度，都受占领对象及其生产力发展程度所制约。他们写道：“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末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发展而发生变化。”^①这就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历史的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生产关系并非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因素。《形态》说明，生产关系可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也可能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由前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向后一个更高的社会经济形态转变的动力。《形态》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②。这就深刻地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历史上一切矛盾冲突和社会革命的根源；而历史上各种矛盾冲突以及社会革命的发生，归根到底，是要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推动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页。

② 同上书，第83—84页。

基础上，还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形态》象《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样，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形态》前进了一步，它已揭示了这一基础的客观内容。它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①“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的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②。这里实际上已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总和，理解为“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③。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包括在“上层建筑”这一概念之内的。

《形态》在谈到市民社会同国家、法以及整个上层建筑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人们的交往方式是国家和法律的现实基础，它创造了国家政权，而不是国家政权创造了人们现实的交往关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批判了那种把国家和法律当成某种“统治者的意志”的产物的错误观点。他们指出，统治者的意志本身，是由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是一定的交往形式的产物。不是国家由于统治意志而存在，相反地，从个人的物质生活方式中所产生的国家同时具有统治意志的形式。国家和法及其变化的根源，不应从“统治者的意志”中寻找，而是要从作为经济基础的交往关系中去寻找。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国家在整个上层建筑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指出：“因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

② 同上书，第41页。

③ 同上。

的，都带有政治形式。”^①国家政权是整个经济基础集中表现的形式，整个上层建筑以国家为轴心，通过国家这一“中介”而起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得出了阶级斗争的一条重要规律：“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象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先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②

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同时又预见到了它的必然灭亡，他们写道：“过去的在分工条件中进行的一切革命，都不能不导致新的政治机构的产生；从那里也可以得出结论说，消灭分工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会消除政治机构；最后，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和‘社会天才的发明才干所创造的那些社会机构’相适应，而是和生产力相适应的。”^③国家是在对抗性的交往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一旦消灭了这种对抗性的分工，国家也就会消亡，这一点是同与生产力高度发展相适应的共产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出发，对这一理论作了初步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在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种阶级的对立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形态》写道：“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0—71页。

② 同上书，第38页。

③ 同上书，第442页。

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① 这里已经明确地论证了阶级的存在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观点，阐明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的经济根源，从而否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把阶级永恒化的错误观点。

《形态》已相当完整地提出和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概括他们这一历史观时写道：“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多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② 《形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不但论证了一系列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而且揭示了这些范畴和原理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形成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雏形。所以，可以把《形态》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的哲学的探索，是同科学地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的。从1842年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恩格斯到英国的时候开始，他们就试图科学地阐明共产主义的理想。但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

② 同上书，第42—43页。

影响，直到1844年，他们还局限于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道德要求。到了《形态》，由于唯物史观的发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就发生了实质性的转折。他们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①这种提法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已不是归结为一种人道主义的要求，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理想。这使他们的观点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在《形态》中，他们达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发展，怎样创造了资本主义灭亡的物质条件，同时又怎样创造了埋葬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这样，社会主义便由空想转变为科学。

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哲学 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光辉起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著作在马克思生前一直未能出版，未能发挥应有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这些著作的时候，欧洲工人阶级已经站到历史的前台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但是，当时影响着工人运动发展的，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只是这许多社会主义派别中的一个，而且他们的观点主要在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已经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们深切地感到，有必要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

信他们的观点的正确。因此，他们一方面着手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以清除它们对工人运动的有害影响，另一方面，则在工人运动中公开宣传他们的主张。这样，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产生了《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样光辉的著作。

《哲学的贫困》是针对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而写的。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在本书中公开宣扬无政府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主张把资本主义和平改造成为一个小生产者的社会，一个用自己的产品并根据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量来进行交换的社会。他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主张保存小生产者私有制，认为后者才符合“人类本性”。蒲鲁东这套主张投合了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影响很坏。因此，当马克思读了这本书以后，立刻感到有必要对它进行批判。这就产生了列宁称之为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哲学的贫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哲学的贫困》是第一部公开表述了新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马克思后来在评述这一著作在他的思想发展中的意义时写道：“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①

首先，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的空想性质中，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蒲鲁东不是唯物地辩证地分析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而是形而上学地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划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主张保存好的方面排除坏的方面，以“改善”资本主义。他并不反对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他异想天开地主张在小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产者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建立他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蒲鲁东这套主张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的矛盾，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种空想主义、改良主义的特征。马克思指出，企图在资本主义关系的范围内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是根本不可能的。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经过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必须经过“全面的革命”，马克思在本书的最后引乔治·桑的话说：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①

其次，马克思在揭露和批判蒲鲁东主义的哲学基础时，进一步论证和发展了《形态》所确立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是庸俗化了的黑格尔的方法。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把客观的现实的的关系看成“绝对观念”的体现。蒲鲁东跟在黑格尔之后，把经济范畴看成经济现象、经济关系的本源，认为后者是从前者派生出来的。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思维中发生的一切。蒲鲁东根据这一点，认为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因而认为“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②。蒲鲁东构造的经济范畴体系，就是以这种黑格尔观念为指导原则的。他人为地把经济范畴安置在一定的顺序之中，从一个范畴导出另一个范畴，认为这种顺序是“理性中的观念的顺序”，应与这种顺序相应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完全颠倒了经济范畴和现实的经济关系之间的真实关系，实际上，经济范畴、观念、原理等只不过是现实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是现实世界中发生的辩证过程的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8页。

映。因此，不是现实的经济关系要与观念的顺序相适应，而是观念的顺序要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的辩证发展过程。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特别对唯物史观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主要是对物质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了深刻的论证和进一步的发挥。马克思在表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时，首先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范畴作出科学的规定。在他看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表现和结果，它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包括劳动者，而“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际上已形成“生产关系”的概念，但往往采用“交往关系”、“交往形式”等术语来表示。现在，马克思已明确采用“生产关系”这一概念，表明这一科学概念已最后确定下来。概念的确定，使马克思能够更明确地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力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马克思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②在阶级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激化，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新的先进的生产方式这时就通过革命的途径来代替旧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这次对蒲鲁东的批判，是在筹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过程中发生的。马克思的批判，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② 同上书，第144页。

蒲鲁东主义的界限，对于消除蒲鲁东主义对工人运动的消极影响，促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一些共产主义者就认为，《哲学的贫困》的出版是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巨大理论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和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冲破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障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则标志了这种结合的历史过程的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说明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共产党宣言》的产生和发表，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根本特点。

《共产党宣言》是作为正式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出现的。这一著作发表的形式本身表明，马克思主义已越出学者的书斋，成为指导工人运动的理论武器。

《宣言》在内容上着重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宣言》论证这些问题始终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列宁在谈到这部著作的哲学意义时，这样写道：“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它的彻底性和革命性，在这部著作中得到最为生动的体现。

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认识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特别是认识近代史，对阶级斗争及其历史发展作了精辟的分析。他们证明，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分析了奴隶制社会以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

来每一历史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结构、各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并且揭示了这些阶级存在和斗争的经济根源。每一时代的不同的阶级、等级，由于经济利益上的对立，使它们始终处于相互对立之中，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的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及其历史发展，是《宣言》加以阐明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象一根红线贯穿整个《宣言》的始终。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封建主义社会衰亡中产生出来的，但它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资本主义时代与以往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特点在于，它使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极，形成了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使阶级结构和阶级对立简单化了。《宣言》分析了这两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的历史发展。它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条件，同时也造成了埋葬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于，资产阶级依靠剥削无产阶级而致富，与此同时它又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和觉悟，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从最初的分散的个别工人与资产者的斗争，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与资产阶级作斗争，以致转变为公开的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①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里虽然还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但已经论证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

《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总结，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新质阶段的开始。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指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本章阅读书目：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列宁：《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给父亲的信》、《〈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异化劳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第四章：（1）、（2）、（3）、“批判性的评注2”第五章“（2）思辨结构的秘密”，第六章“（1）（a）‘精神’和‘群众’）。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验证和发展

(1848—1875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立即经受了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检验。这次革命按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要消灭封建主义残余，完全确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比起1789年的法国革命，这次革命有许多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已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提出了自己的阶级要求。这就产生了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如何实现自己的阶级要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并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

1848—1849年革命以后，欧洲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除了英法两国，德国、意大利以及一些美洲的国家(如美国)相继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国。此时，在1848年革命遭到镇压的工人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人们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现象感到惶惑。实际生活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这是一个同无产阶级解放的前途息息相关的问题。因此，从这时候开始，马克思就把从经济上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他的科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早在四十年代初，马克思受恩格斯的影响，就开始研究政治

经济学问题，后来由于直接参加1848年的革命才暂时中断了这一研究。革命后马克思在伦敦开始的经济学研究，是四十年代研究的继续。但这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的继续。在这里，马克思能够对英国这一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实地考察，接触到大量的实际材料和历史文献，同时已经有一个整理材料的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就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和《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一卷）等伟大著作。这些著作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变革，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的表现。

在欧洲革命中遇到镇压的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但这是暂时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工人阶级的觉悟日益提高，并逐步团结起来。1864年9月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是这种觉悟和团结的重要表现。在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成为主要的斗争。1871年法国爆发了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这是一次新时代的革命，它标志了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了这次革命，并为捍卫这一伟大革命的原则进行了卓越的斗争。这次革命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展的强大的推动力。

第一节 历史唯物主义在1848—1849年 欧洲革命中的应用和发展

列宁曾经指出，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①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他们是群众革命斗争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并且及时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撰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729页。

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著作。这些著作，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事变的典范，同时也是总结新鲜经验发展理论的典范。

欧洲革命波及整个欧洲大陆(俄国除外)。对于这次革命的根源，当时许多历史学家都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解释。有的人把它归之于几个领袖人物的缺点，有的人则把它归结为少数煽动家的恶意，总而言之是从主观上去寻找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从唯物史观出发，具体而深刻地阐明革命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①在欧洲革命过程中，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各个阶级、阶层，都被吸引到历史的前台，都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斗争。在斗争中，尽管各阶级提出的口号五花八门，但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利益这一轴心进行的。欧洲革命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完全证实了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证实了唯物史观是科学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欧洲革命经验提出一个论断：“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②。革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是革命阶级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而发动的斗争。在革命中各对立阶级极度紧张起来，广大群众被卷进斗争的漩涡而发挥历史的主动性。马克思说：“在这运动的漩涡中，在这历史的动荡痛苦的进程中，在这革命的热情、希望和失望的惊心动魄的起落中，法国社会的各阶级对于从前以半世纪为单位来计算的自己的发展时期，却必须以星期为单位来计算了。”^③恩格斯也说：“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70页。

③ 同上书，第99页。

构中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抗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产生和迅速的成长，它们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①例如，从二月胜利到六月工人起义的失败，短短几个月，法国历史走完了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走完的路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也促进了无产阶级的觉悟，使它开始上升到成为现代社会中革命力量汇集的中心，从而使法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暴露得最明显，也表现得最为典型，除了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法国的研究也最多。通过这种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了完整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了一个经典的概括，他说：“……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这一段话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了完整的概括，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实质和这个学说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这段话中最根本的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列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在评论这段话时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同庸俗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①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和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但是，明确提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历史规律，则是总结欧洲革命经验取得的成果。在二月革命中，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牺牲，当无产阶级提出自己的要求的时候，这个共和国的阶级实质就暴露无遗：原来它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为其公认的任务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的要求和利益不可能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得到满足。马克思在六月起义失败后不久写的一篇评论德国阶级斗争问题的文章中指出：“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②这是最初明确提出革命后需要建立专政的问题，显然这个论断包含了六月起义失败的教训。在直接总结六月起义经验教训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就鲜明地指出，六月起义遭受镇压的事实证明，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7页。

概念。

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保护革命果实的需要，但不仅仅是这种需要。马克思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①这里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专政”，它的根本任务是最后消灭阶级和消灭产生阶级的经济根源。象阶级不是永恒存在的一样，阶级专政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也必然归于消灭。所以，革命后建立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要创造条件将来消灭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只是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

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参加了这一革命，巴黎工人还发动六月起义，独立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这段革命的历史，形成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共产党宣言》曾经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②。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是两种范畴的革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这样一种可能性，由于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发动而变得更加明显。但这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当作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 and 理论问题提出来并加以论证。他们指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5页。

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部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①

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必要的。但是，无产阶级不能象那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样，在革命仅仅得到不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便希望赶快结束革命，而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任务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在推翻现存社会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能停止于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是要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做准备。在1848至1849年的革命中，工人阶级显示了它的觉悟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作出结论，无产阶级不仅有必要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做准备，而且有可能有力量实现这种转变。

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理论，包括了要完成两个阶段革命的任务：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的过渡阶段。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未完成时，无产阶级有必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斗争。但是，无产阶级即使在为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斗争时，也不应忘记自己的最终的阶级目的。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一个坚持不断革命的策略原则：无产阶级“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2页。

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①。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必须坚持自己的远大理想、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六月起义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同农民结成同盟的极端重要性。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取得农民的支持。马克思说：“在革命进程还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有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②在那些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同农民结成同盟，实现对农民的领导，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之一。而广大农民，按它的社会地位，它能够成为无产阶级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同盟者。这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同样受资本的统治和剥削，另一方面历史也已证明，农民不同工人阶级结成同盟，不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同样没有出路。因此，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同盟不但有此必要，而且有此可能。建立工农联盟，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欧洲革命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

1848——1849年的革命，还提出了应该如何对待旧的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时期写的一系列论著，探讨和正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首先，他们考察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9页。

② 同上书，第22页。

生、发展及其作用。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考察了法国革命的历史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形成和演变。他指出，资产阶级的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它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成为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这个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经过从封建社会崩溃以来所发生的多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国家机器在资产阶级手中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并成了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机器。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欧洲各国人民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没有触动旧的国家机器。例如，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德国三月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查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①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得出明确的结论：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写道：“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②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作为耸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服务的，无产阶级根本不能依靠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马克思提出要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把它摧毁，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取代它。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时期的著作中，还在其他一系列重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6页。

问题上发展了唯物史观。如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马克思作出了新的概括：“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经济基础”解释为“交往关系”、“市民社会”，现在则明确地把这一基础规定为“所有制形式”，这就抓住了“基础”这一概念中最本质的东西。又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在创造历史过程中人民群众和个人的不同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许多深刻的论述。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的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的作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论断又说明，人们是历史的主体，虽然社会规律的作用 is 客观的，但这些规律是人的活动的规律，它不是在人之外的一种神秘力量。人们不能选择自己活动的条件，但却可以认识和把握这些条件。历史是人们活动的结果。而人们的活动最基本的是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活动，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针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夸大个人的作用，把1848——1849年革命的爆发和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几个领袖人物的偶然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明确地认为这些原因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认个人的作用，并不否认历史人物个人品质的意义。例如，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

② 同上书，第121页。

易·波拿巴的个人品质，他的夸大狂就因为符合资产阶级的口味和落后农民的偏见，使他这样一个平庸之徒得以登上皇帝的宝座，从而影响法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所以，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既可以因为他的思想和行动反映先进阶级的要求、反映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促进历史的发展；也可以因为他迎合落后阶级的违反历史规律的愿望而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年至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们从总结革命经验中得出的一系列重要结论，在跟着进行的经济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科学的论证。

第二节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对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1848——1849年的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迁居伦敦。在这里，马克思重新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在理论上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果，在经济学领域实现了革命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同时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新的巨大的贡献。

一、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他和恩格斯所发现的历史观作了一个经典性的概括，恩格斯在同年的8月评论这一概括时，明确地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①的概念。马克思指出，他研究经济学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6页。

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所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资本主义社会促使生产力迅速发展起来，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随着这一社会形态的灭亡，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也就宣告终结。

这一段话精辟地概括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以及这些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变化的规律，确定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则是最基本的规律。不论任何社会形态，这两条规律都是起作用的，它们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其次，马克思说明，这些基本规律的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但是，一当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原来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种社会规律的作用象自然规律的作用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说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再次，马克思在这里首次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他指出，这个概念指的就是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总和、社会经济结构，并且确定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则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对抗形态。随着这一社会形态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走向灭亡，人类社会就结束了它的史前时期而进入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整体、一个体系来阐述。列宁在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一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实质时指出：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以生产关系说明一定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①我们可以说，这个体系是“有血有肉”的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各种因素、前提和条件是不可分割的。这个体系不是马克思想象的产物，而是多年研究社会生活、社会历史，多年研究经济学的结果。它完全反映了历史实际。所以，这是一个科学的体系。

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就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所概括的唯物史观体系为理论基础的，同时又是对这一

^①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

体系的科学论证和进一步发展。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是研究一般的“社会”、一般的“生产关系”，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研究资本主义由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规律。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②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能够进一步证实和加深认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资本论》的发表对唯物史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彻底分离，这种分离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这个过程是在所谓原始积累时期、从剥夺小生产者开始的。在封建社会后期，小生产广泛地存在着。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集中，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但是，随着生产力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愈来愈成为不可遏止的历史趋势，结果，一方面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转变成为资本，另一方面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完全分离变成自由的雇佣工人。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资本剥夺了小生产者，使劳动具有社会劳动的性质，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页。

第一次使生产在社会的规模上进行，同时使在生产中大规模地运用科学技术的成果成为可能，因而使劳动生产率能够成倍成百倍地提高。马克思指出：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它建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以内，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这就有力地证明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必然会促进生产力迅速地发展。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作用是有界限的。马克思指出，资本力图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但是这样一种追求，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资本本身的性质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这样一种性质从一开始就划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它造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无法克服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追求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这样一种追求和竞争的加剧，驱使资本家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把科学运用于生产，从而不断地增加生产社会化的程度。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由社会来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和监督生产，由社会来分配产品。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3页。

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完全与这种要求相对立。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是不可遏止的历史趋势，因而同私有制的矛盾也必然会愈来愈尖锐。经济危机的产生就是这种矛盾尖锐化的表现。马克思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①

《资本论》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历史过程中，马克思运用和制定了历史观的一系列范畴，对这些范畴的含义作出了科学的规定，从而全面地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物质生产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马克思指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但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② 马克思认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所以，生产这个概念，包括了人和物的因素以及把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的方式。因此，生产总是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人性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他们把这样一个孤立的个人当作出发点去说明历史。马克思指出，这种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作出发点的个体，只是假象，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马克思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页。

学地阐明了物质生产的作用，他指出个人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他说：“如果从整体上来考察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例如产品等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要素，即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要素出现。生产过程的条件和物化本身也同样是它的要素，而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时也更新他们自身。”^①这样就科学地阐明物质生产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生产方式明确地规定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历史上每一特定的生产方式都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作为物质基础，而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则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的。马克思集中地研究和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统一。而物的要素，主要是生产资料、劳动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标志。马克思说：“各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②但劳动资料本身又是人创造的。“……说到劳动资料，那末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③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因素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③ 同上书，第206页。

因为不仅劳动资料是人所创造的，而且没有人的劳动，劳动资料就没有任何用处；不仅没有用处，而且还会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因此，物的因素的作用是由人的因素的作用所创造和引起的。在生产力的内部结构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资本论》考察了科学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明确地把科学技术包括到生产力概念中去。马克思认为，科学变为直接生产力，是从工场手工业阶段结束出现机器生产的时候开始的。他说：“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需要以自然力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①资本主义生产为自然科学创造了研究、观察和实验的物质资料，而自然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改变了生产过程的性质，生产过程日益成为应用科学的工艺学的过程。科学知识作为精神因素，与作为物质因素的生产有区别。但是它可以转化为机器、生产方法、化学过程等等，即可以转化为物质因素，并通过人的劳动表现为生产力。

“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在下定义时指出：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②。在这些关系中，最基本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此外还包括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等关系。马克思认为，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本质上是同一的，或者说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同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因而具有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在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著作中，还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作出科学的规定。他指出，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经济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3页。

构，即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上层建筑是指竖立在这一现实基础之上的法律、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不但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且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作了分析。例如，他在分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时，就提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①的著名论断。

《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但是它的理论论证涉及了唯物史观所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范畴。列宁说：“《资本论》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比较是完全正确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相联系的思想’。”^②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意志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③列宁这些评价，精辟地阐明了《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

③ 见同上书，第10页。

展，阐明了这个时期唯物史观发展的实质和主要特征。

二、《资本论》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马克思一向重视研究辩证法。《资本论》虽然不是专门以辩证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但却贯穿着马克思研究辩证法的成果；这部巨著所研究和表述的资本发展的辩证法就是一般辩证法的特殊形态。正如列宁所说，虽然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却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①所以，可以把《资本论》当作唯物辩证法的巨著来读。

（一）辩证法的实质和规律

《资本论》出版以后，有些资产阶级学者专门就这部巨著所采用的方法进行评论，但他们大多数都不理解这一方法，有的甚至作了歪曲的评论。有的人认为这种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有的则认为是“黑格尔的方法”。为此，马克思有必要对他所采用的方法作出科学的说明。1873年1月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言中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神秘的。与他相反，马克思的辩证法首先是客观事物本身的辩证法，而主观辩证法只不过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马克思在这里首先强调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其次，马克思在分析唯物辩证法同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不同的社会作用和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本质。他说：“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成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个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黑格尔的辩证法受其唯心主义神秘体系的窒息，是不彻底的、保守的，它不是要否定现存的普鲁士社会制度，而是要为它辩护。马克思的辩证法则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一切现存的东西，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免要走向灭亡。用这种观点观察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得出结论：象任何事物一样，它也不可避免要走向灭亡。因此，唯物辩证法这种批判的革命的实质，必然会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惧。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资本论》对辩证法的运用，显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内容及其规律，体现了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矛盾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分析，表明事物从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运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是从商品生产发展来的，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这一“细胞”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切矛盾的萌芽。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首先从分析商品生产开始。他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也就无所谓价值。但是，一个物品如果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价值，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就只是一件普通的有用之物，而不是商品。所以，任何商品都必然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不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取得价值。因此，商品内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运动，产生商品变换的必要性，因为只有通过交换，价值才能得以实现，才能解决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

商品交换的产生，使商品的内在矛盾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外在的矛盾。而随着这种矛盾的发展，商品的交换价值（价值形式）又依次经历了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最后出现了货币形式。货币的出现，使商品世界分裂成为两极：商品和货币的对立。由于这种新的对立的出现，就发生了新的现象：原先买和卖的单一的动作，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动作，即由原先统一的按“商品——商品”这个公式进行的交换，变成“商品——货币”、“货币——商品”这样两个分离的过程。这就包含着出现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以上分析的是简单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货币的出现，形成新的流通公式：“商品——货币——商品”，为买而卖。在这里，货币还只是一种流通手段。当货币由流通手段发展成剥削别人劳动的手段时，货币就转化成为资本。这时就出现了资本的公式：“货币——商品——货币”，为卖而买。资本家在这一过程的终结时所得到的货币，多于他开始时所投入的货币，这部分多出来的货币就是剩余价值。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根源。他指出：“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①流通本身是不能增殖的。马克思在“货币——商品——货币”的资本公式中，发现了增殖（即剩余价值）的秘密：这里的商品是具有特殊性质的商品——劳动力，正是这一特殊商品的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所以资本不能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8页。

流通中产生；但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因为货币所有者不在市场上购得劳动力，资本的增殖就无从产生，所以流通又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而货币转化为资本，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意味着商品生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前简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就发展成为资本的矛盾，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阐明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以后，《资本论》继续以资本的矛盾为中心，展开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资本的矛盾是在货币占有者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中产生的。马克思分析了这种剥削的形成和历史发展。他从研究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发现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资本家主要靠延长工作时间的办法，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即剥削绝对剩余价值。但这种办法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竞争的加剧和新技术工艺的不断出现，资本家就力图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增加对工人的剥削，即增加剥削相对剩余价值。这一种剥削形式比起前一种形式更加精巧，也剥削得更多，因而也包含着更深刻、更尖锐的矛盾。

从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中，《资本论》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阐明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是没有止境的，加上竞争的加剧，必然会不断增加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结果使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愈来愈高。马克思证明，这种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增高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就愈来愈尖锐，生产过剩危机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原先在简单商品生产和流通中所包含的危机的可能性，现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变成了现实性。这时，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所包含的矛盾，就充分展开，并且预告了资本主义末日的到来。资本主义本身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马克思的分析表明，

一个事物自生长至灭亡始终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事物内部矛盾的逐步展开和激化，促使事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而事物内部矛盾的充分发展和充分暴露又为矛盾的最终解决准备好了条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分析还表明，这个过程同时是量变到质变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马克思把商品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他认为只有从量和质的统一中，才能理解商品。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货币的产生、货币转化为资本，都表现了质量互变规律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他说：“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①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这是第一次明确地肯定这一为黑格尔所发现的规律。但是，黑格尔仅仅把它当作思维的规律，马克思则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理解这一规律。他考察的是现实中的量变和质变相互作用的过程，同时揭示了质变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当作客观的、普遍的规律对待。他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资本论》第二十四章第七节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概括了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过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2页。

定。这是否定的否定。”^①但是，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所以，否定之否定，仿佛是返回到原来的起点，实际上是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与过去具有本质区别的阶段。

《资本论》除了研究、运用和表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还研究、运用和表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范畴，如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可能性和现实性、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原因和结果等等。这一切表明，《资本论》已相当完整地研究和表述了客观的辩证法。

（二）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

《资本论》的哲学意义不仅在于它描述了客观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而且在于它揭示了作为客观辩证法的反映的主观辩证法，揭示了认识论的和逻辑的规律和方法。列宁指出，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并且是在三者统一的意义上使用的。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础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奠定的。在这里，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局限性，阐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阐明认识的能动性。《资本论》的重点则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把基于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过程看成是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科学认识的任务，是揭示认识对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这种认识的困难，就在于事物的本质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它是现象的内部联系。事物的本质表现为现象，不是直接的等同。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了”^①。本质是事物的内部的必然的联系，本质表现为现象，往往经过一些中间环节、通过各种偶然因素表现出来。本质和现象既是相互联系，又是相互区别的。因为是相互联系的，所以通过现象可以认识本质；因为它们有区别，所以不能一下子认识本质，现象和本质的差别性，决定了人们认识的阶段性。

然而，怎样实现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呢？《资本论》提出了科学抽象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问题。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②由外在的、可以感觉得到的现象世界，进入事物的内在本质，只有依靠科学抽象的方法。但是，科学抽象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产生的，而是受事物发展的一定阶段所制约的。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就不可能作出价值的抽象，因为当时的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社会中，才能揭示出来。所以，亚里士多德虽然感到在各种可交换的商品中含有某种共同的、即商品能赖以交换的东西，但却无法由此作出价值的抽象。所以，科学抽象的产生，必须有一定的客观前提。其次，马克思反对古典经济学家那种形式的、虚假的和极不完全的抽象。他认为，要作出科学的抽象必须从顽强的事实出发，同时要辩证进行思维。现象表现本质，需经许多中间环节，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表现还常常以虚假的形式出现。马克思指出，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但是，古典经济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家分不清真象和假象，因而常常陷入无法解决的混乱和矛盾。例如他们称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实际上是劳动力的价值。由于他们把假象当成真象，所以没法发现资本剥削的秘密。

在对现象认识的基础上，得出科学的抽象。在这个过程中，撇开了对象本身的各种属性、关系。因此，获得科学的抽象，还只是对事物的部分的认识。马克思认为思维进程应该继续前进，即要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他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①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思维进程的两条相互衔接的道路：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他在这里是从两种意义上来使用“具体”这一术语的。作为直接的认识对象的具体，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感性的具体；而作为思维中的具体，则指的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它是思维的结果，而不是起点。这里所谓“抽象”，相对于具体，在内容上是比较单纯、比较片面的，是把具体事物某一方面的特性从它与其他方面的关系中孤立出来，因此，它是从整体中抽取出来的“部分”。

从对一个具体事物的总的认识过程来看，认识首先从对这个具体事物的感性直观开始。在这个认识阶段中，认识对象呈现在人们面前还是一个浑沌的表象，人的认识还无法从整体上、从多样性的统一上来把握具体。这个过程是从现象向本质的深入，是由“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但是，认识的目的，是要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多样性的统一”、从整体上去认识具体，因此，认识运动不能从个别抽象中停止下来，而必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局限性。这些经济学家从人口、民族、国家等等生动、具体的东西出发，得出分工、货币、价值等等抽象。但他们到此为止，把个别的抽象看成是认识的终点，看成是认识的目的。这样，他们就无法达到对事物整体的认识，无法揭示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规律和发展过程。所以马克思说：“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①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在思维行程中从抽象的规定出发导致具体的再现。黑格尔看到这一过程，认为这个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最重要的部分，但他对这一过程作客观唯心主义的解释。他把实在、具体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把具体的再现看成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这种错误时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②这个具体作为思维总体、思维具体，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凌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或者说是思维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的产物。所以，这个思维具体是在理论思维中再现的被认识的对象，是客观的作为整体的具体事物的反映。

实现由抽象上升为具体，首先需要确定作为这一上升过程的起点的抽象。不是任何抽象都能实现这一上升。马克思认为，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② 同上书，第103页。

以作为起点的抽象必须是反映对象本质的科学的抽象。它应该具有所谓“细胞”的性质，是对象的最简单、最单纯的因素，它包含了对对象一切矛盾的萌芽。同时，它又必须是对对象的“极限”的抽象（或者说“合理的抽象”），一超出这一“极限”、超出一定的合理的界限，这一抽象就会失去“细胞”的性质。《资本论》确定商品交换为上升起点，就反映了辩证逻辑的上述要求。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写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 ”^① 资本主义是从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发展起来的，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已经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因此，《资本论》从分析商品交换出发，就能逐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矛盾、关系和属性，揭示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规律。

确定了作为上升起点的科学抽象，也就有可能实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是整个认识运动过程的第二阶段，也是最基本的阶段。在前一个阶段，在确定上升起点的过程中，撇开了对象的许多因素、属性和关系；现在，思维运动从这一科学抽象出发，要逐步地使这些因素、属性和关系，按照它们在客观事物中实际存在着的复杂关系统一起来、结合起来；通俗地讲，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反映事物。这个过程是从简单向复杂的深化，是从已经把握的对象的本质出发，逐步向对象的整体展开和深化的过程。客观事物本身是复杂的，构成事物的因素、属性和关系，也不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是一下子出现的。这就决定了由抽象向具体上升，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要逐步上升。例如《资本论》第一卷从分析商品交换开始，中间经过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最后揭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整个过程是逐步上升的，每一个后面的范畴都比前面的范畴更复杂、更具体。我们不能跳过中间任何一个范畴到达后面的范畴，例如，不能跳过资本由货币直接到达剩余价值。整部《资本论》的结构，都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方法建立起来的。

由具体到抽象和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是总的认识运动过程的两个阶段。在这里，认识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但对于人的认识来说，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作为起点的具体，是对象的原型，是感性具体，它在作为认识主体的人面前，还是一个浑沌的表象。而作为终点的具体，则是在思维中再现出来的作为“多样性的统一”、“许多规定的综合”的具体。所以，到达终点，人们就从整体意义上把握了对象，达到了认识对象的目的。

马克思认为，认识运动过程的这两个阶段是互相衔接、不可分割的。马克思在说明他的方法时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①由具体到抽象，是在研究过程中占有材料和分析材料的结果；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虽然是思维过程的产物，但同样以研究的成果为基础。《资本论》系统地逻辑地叙述了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它的严谨的结构，“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实际上是马克思长期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反映。这一研究过程主要在《资本论》的准备著作中作了表述。因此，“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过程。”^①并不是主观虚构的产物。

对对象的认识在内容上，逻辑要和历史相一致。这是《资本论》科学方法的另一个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原理为依据的。它说的是，我们关于对象的理论，要反映对象的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要反映对象的“历史”。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时，精辟地概括了这一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

首先是关于逻辑起点问题。恩格斯指出，马克思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人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从人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这就是逻辑的起点要和历史的起点相一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已经解决了这个逻辑起点问题，这个逻辑起点就是商品。资本主义是从商品生产中发展起来的。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点。因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分析必须从分析商品生产开始。

其次，逻辑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反映历史进程的主要阶段。《资本论》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分析，如分析由简单的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过渡；由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由协作向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的发展，等等，就反映了资本主义的主要阶段。

但是，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逻辑进程处处跟随着历史的进程，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5页。

② 同上书，第122页。

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与历史一致不应该理解为直接的等同。恩格斯指出，逻辑对历史的反映，是经过修正的，没有必要使每一个逻辑范畴都追随历史的进程。但是这种修正不是任意的，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作出的。逻辑不是反映对象的一切发展、变化和曲折的全部总和，而只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性。但是，因为把握了历史进程的规律，也就更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进程，从而达到逻辑和历史的更深刻的统一。

《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经典著作。这部著作在阐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中，揭示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使唯物史观由假设变为科学。《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卓越的贡献，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强大的理论力量 and 实际意义。

第三节 唯物史观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和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中的发展

1871年3月18日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划时代的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撰写了《法兰西内战》等理论著作。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拉萨尔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哥达纲领批判》就是在这些斗争中产生的重要著作之一。这些著作对唯物史观、特别是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总结巴黎公社经验，解决用什么 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问题

巴黎公社革命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如何对待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的问题。巴黎公社革命爆发不到一个月，马克思就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①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了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中提出的这一基本原则。跟着，马克思在专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发挥了这些原则。他进一步分析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历史作用，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国家机器的反动实质，并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具体措施，具体阐明所谓“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含义。这就是一方面摧毁旧政权机关的物质工具——常备军、警察、法庭、官僚等，另一方面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马克思认为，摧毁旧国家机器，并不是摧毁一切。他说：“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②对于新社会有用的某些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9—360页。

构和某些合理的职能，无产阶级应该夺取过来加以改造和利用。这样，马克思关于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理论就进一步具体化了。

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在理论上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解决了用什么东西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认为，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代替哪个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新型国家。

马克思总结了巴黎无产阶级掌权两个月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阐明巴黎公社式的新型国家的性质和特点。他指出，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①公社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政治形式。它具有一系列不同于旧国家机器的鲜明特点。

首先，用人民的军队代替作为旧国家机器支柱的常备军，是巴黎公社式的新型国家机器的首要标志。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阐明建立一支人民军队的重要性。1871年9月25日，他在伦敦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公社的任务，是要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以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②

其次，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措施时，阐明这一新型国家机构的民主性质。公社是由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1页。

② 同上书，第468页。

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法官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列宁在评论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时指出：“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一次大更替，即用一些根本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另一些机构。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实际例子：实行得象一般所能想象的那样极其完全极其彻底的民主由资产阶级民主变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①

再次，马克思认为公社所体现的新型国家机构的基本特点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②。公社并不否定代议机构和选举制，但它否定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否定这种议会制民主的虚伪性和腐败性。它实行真正民主的普选制，并把代议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必须亲自对选民负责，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纪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代议机构仍然存在，然而这已经不是把立法与行政分割开、议员们享有特权的资产阶级议会式的“清谈馆”，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了。

马克思根据公社的经验，探讨新型国家的职能，不仅说明公社在无产阶级达到政治解放中的作用，而且说明公社在无产阶级达到经济解放中的作用。他指出，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③，不仅是使工人在经济上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8页。

③ 同上书，第361页。

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而且是使农民，一切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是“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①。马克思指出，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无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后，就必须着手进行经济上的革命，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为公有制。公社在它存在的几十天中，曾经计划这样做。虽然它来不及执行这些计划，但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马克思总结公社经验，还研究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工人阶级要实现彻底解放的目的，必须经过一系列将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长期的斗争过程。他说：“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②马克思不仅说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存在，而且说明这种斗争的形式和特点，说明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斗争。

巴黎公社革命震荡了整个资本主义旧世界，它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仇视和恐惧。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中写道：“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③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马克思对公社经验进行的理论概括，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宝库补充了新的结论和新的原理，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2页。

② 同上书，第5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9页。

二、批判巴枯宁主义，捍卫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如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布朗基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些斗争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在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中，巴枯宁鼓吹的无政府主义特别危险。巴枯宁(1814——1876年)是俄国的流亡者，他钻进第一国际，在国际内部大搞阴谋诡计，力图用他的无政府主义的纲领来代替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为了保证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不仅要从政治上、组织上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而且要从思想上、理论上粉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进攻。

马克思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第一次公开争论，是围绕着所谓“继承权”问题展开的。1869年9月，在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提出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大会议程，鼓吹废除继承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社会改造的起点。马克思认为，巴枯宁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马克思在他受国际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逐点批驳了巴枯宁的主张。他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去阐明继承权的实质。他指出，继承权象所有的民法一样，是社会的法律上层建筑，就是说它并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结果，是由现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而这种经济基础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在继承行动产生之前，私有制早已存在；并且只是由于私有制，才产生继承权问题。继承权只不过是给继承人以死者生前所有的权利，即以自己的私有财产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造成资本主义剥削的原因和权利的，不是继承权，而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

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废除继承权，无产阶级才能达到彻底的解放。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一伙的错误观点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但他们并未放弃这些观点。巴黎公社以后，围绕着公社的经验教训问题，巴枯宁及其信徒更加肆意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更加系统地发挥其反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因而在巴黎公社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第一国际中，不得不花很大精力去同巴枯宁主义作斗争。

恩格斯指出，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是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巴枯宁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而是“国家”。在他看来，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而是国家创造了资本，而不是资本创造了国家。他由此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废除国家。不仅要废除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且要废除一切权威，因为任何权威 = 国家 = 绝对的祸害。因此在他的未来的理想社会中，首先就是不存在任何权威。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完全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这种错误的国家观时指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是资本创造了国家，而不是国家创造了资本。恩格斯说：“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①国家属于政治上层建筑，一定的国家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本的产物，是维护资本的工具。因此，资本是产生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祸害的根源，无产阶级革命只有铲除这一根源，只有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才能消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

资本主义国家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才能导致国家的垮台。无政府主义者要求一个早上就宣布废除国家，是根本办不到的。巴枯宁一伙宣称，一切国家，哪怕是革命专政，都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都在应该摧毁之列。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需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①所以，无政府主义者的纲领，实质上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是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失败的纲领。

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的矛头也是指向无产阶级革命的。他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是一种背叛革命，为反动派效劳的主张。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如果不愿意失去革命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巴枯宁把自治绝对化，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恩格斯认为，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权威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近代社会化大生产中，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威，任何社会生产都无法进行。权威包括经济管理和政治管理两重含义。将来，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消亡了，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威也就消失了，但是权威依然存在，那时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8—439页。

此，无论什么时候，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不能没有一定的自治，也不能没有一定的权威。巴枯宁要求建立没有权威的、所谓“自由和无政府状态”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同施蒂纳、蒲鲁东等人鼓吹的无政府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六十至七十年代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则是最重要的一场斗争。斗争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也在斗争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特别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三、《哥达纲领批判》对共产主义发展过程的探讨

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写于1875年，是批判拉萨尔主义的产物。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年)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机会主义者。1864年他死后，他的追随者继续宣传和推行他的机会主义理论。1875年，他们利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的机会，强使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李卜克内西作原则性的让步，在合并纲领草案中把拉萨尔的一套机会主义理论塞进去。为了维护德国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以及德国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马克思对纲领草案中的拉萨尔主义原则逐点进行批判，写了《哥达纲领批判》一书。

对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的探讨，是这一著作注意的中心。关于这个问题，贯注了拉萨尔派乌托邦幻想的纲领草案，提出一系列糊涂观点。如什么“自由国家”、“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等等。马克思在批判这些错误观点时，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并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主要阶段和主要特点。

首先，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经验，发展了早在1852年3月5日他在致魏德迈的信中就提出的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明确提出

“过渡时期”的概念。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这个过渡时期，在经济上要实现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这个经济上的革命转变时期相适应，必然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是什么“自由国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② 这就阐明过渡时期的必然性以及过渡时期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其次，马克思阐明了共产主义发展的主要阶段：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在谈到这一阶段的特征时写道：“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③。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会带有旧社会的痕迹。经济上，生产力还不是高度发展，旧的社会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还不可能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认为，这是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③ 同上书，第21页。

种“弊病”。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在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的原则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的觉悟程度，是这一阶段上唯一可行的原则，是最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原则。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则消除了旧社会的痕迹，它是在自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②马克思这些描写说明，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是经济上、道德上和精神上都高度发展的阶段，是比之社会主义社会更为成熟的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基本特征及其发展的论述，已为当代国际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所证实。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在这里表述的基本思想，并根据新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本章阅读书目：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生产；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

《哥达纲领批判》，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革命前夕的德国；十八、小资产阶级)。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理的系统阐发

(1875——1895年)

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欧洲处于所谓“和平”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经过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检验的马克思主义，广泛地传播开来。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政党开始在各各国建立起来，工人运动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而进一步发展壮大；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加入工人运动，造成了滋生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如前章讲到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于1876年5月开始写的《反杜林论》以及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和书信，都是同机会主义斗争的产物。这一时期，恩格斯还广泛地研究了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写了《自然辩证法》。这些著作，加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全面地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以及这些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一节 《反杜林论》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理的系统阐发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5月底至1878年7月初。写

这部著作的目的是批判杜林主义，清除它在德国党内所造成的影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1833——1921年)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的面貌出现，调动“三路大军”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发起进攻。本来，杜林主义是折中主义的混合物。但是，在当时一些机会主义者大吹大擂吹捧杜林、造成迷信杜林的气氛中，德国党内的一些领导人也受到迷惑而附和这种吹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地感到杜林这种平庸的思想在党内传播所造成的危险，因而决定对它进行批判。

《反杜林论》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这部著作所批判的杜林的“体系”，包括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恩格斯的批判不得不涉及到所有这些领域，并以自己的见解反驳杜林的见解。恩格斯说：“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①。恩格斯指出，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的“体系”相对立，但他希望读者不要忽略他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②。恩格斯反对的是杜林的“体系”，并不是反对体系本身。恩格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本身。

一、提出和论证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的原理

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是从批判他唯心主义地解决世界观的基本问题开始的。杜林把哲学的对象分为三类：一般原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他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来解释这三者的关系，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存在之前，一般原则就已存在。这些原则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页。

② 同上书，第46页。

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因而自然界和人类应当适应这些原则。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①但是杜林把事情完全弄颠倒了，他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正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原则。

杜林这种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颠倒，还表现在他企图从思维的统一性中引出世界的统一性。恩格斯在批判杜林这一唯心主义原则时，第一次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他说：“虽然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够是统一的，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②世界上的事物和现象千差万别，都根源于世界的物质性，都是物质的表现形态。杜林提出“世界统一于存在”，这不仅是一句空话，而且会导致唯心主义，因为思维也是存在的。杜林本人就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我们在思维中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恩格斯在批判杜林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时指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和持续的发展证明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思维、意识本身也是物质的产物，只不过是高度发展起来的物质即人脑这种特殊物质的产物。

物质范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石。通过批判杜林，恩格斯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② 同上书，第83页。

一步阐明物质和运动、以及物质运动和时间、空间的关系。杜林把运动归结为机械运动一种形式。他认为世界最初处在“宇宙介质的状态”，此时物质和机械力处于统一的状态，物质是不运动的，当这种统一状态被打破以后，运动才开始。恩格斯指出，杜林这种把运动同物质割裂开来的观点，必然会导致荒谬的结论。当要进一步说明从不动如何过渡到运动时，就必然要求助于“第一推动者”、求助于“上帝”。通过批判杜林这种胡说，恩格斯深刻地阐明物质和运动的关系。他说：“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①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任何事物都处在运动中，通过运动表现自己的存在。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根本不存在的。运动和物质一样，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只能从一种运动形式转移到另一种运动形式。因此，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静止状态。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确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静止本身就是绝对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而物质运动又总是在时间、空间中运动。在这个问题上，杜林的形而上学观点同样使他把时间、空间同物质运动割裂开来，认为时间是有开端的，空间是有限的。恩格斯在批判杜林这种观点时，论证了时空的无限性以及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②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但是，物质的运动总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内进行的。阐明时间空间是物质运动存在的形式，也就阐明了时间空间的客观性，同时也就阐明了时间空间同物质运动不可分离的联系。恩格斯指出，无限性本身就是矛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8—99页。

② 同上书，第91页。

杜林否定这种矛盾，是因为他不理解“始点”和“终点”、“有限”和“无限”之间的辩证关系。无限性中的任何一点，对将来是起点，对过去则是终点，始点和终点总是相互联系着的。如果把无限性中的某一点孤立出来并加以绝对化，结果就会变成有开端或有终点的无限性，实际上是否定了无限性。“有限”和“无限”的关系也是辩证的。在时间空间上，整个物质世界是无限的，但这个物质世界的每一个具体事物则是有限的，无限只能通过有限而存在，由无数的有限的总和构成；而任何有限又包含着无限的因素，任何有限的具体事物都可以进行无限的分割。可见，无限性本身就是矛盾。杜林否认这种矛盾，结果就会引起更大的矛盾。他为了消除无限性的矛盾，曾经设想时间有一个开端，在这之前是一个脱离时间的绝对静止的世界。为了使这个绝对静止的世界进入运动，即进入他所设想的时间的开端，他就不得不求助于“第一推动者”。所以在时空无限性问题上，如果不进行辩证的思维，就无法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

二、对唯物辩证法及其基本规律的系统阐发

杜林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学者。这一批判对象的性质和特点促使恩格斯进一步地阐明他和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可以说这是《反杜林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恩格斯总结了人类认识史、特别是哲学史。他概括地阐明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对立的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说明辩证法是在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指出，在哲学史上，辩证法已经经历了三种形态。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和阐明了事物发展的辩证性质。特别是黑格尔，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但不论是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还

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都有很大的局限性，都未能科学地阐明客观世界发展的辩证性质及其规律。解决这个任务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创立了唯物辩证法。这样，辩证法的发展就进入第三个形态，即科学的形态。

恩格斯指出，唯物辩证法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把自然、社会 and 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他说：“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中，都曾运用和表述过这些规律，《反杜林论》则是进一步论证了这些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首先是关于对立的统一和斗争规律。杜林否认这一规律，认为承认矛盾的存在，就是“背理”、“荒谬”。恩格斯指出，从常识来看，杜林这种矛盾 = 背理的命题似乎是合理的，就象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这一命题一样。但常识不等于科学。例如微分学就不顾常识的一切抗议，竟使直线和曲线在一定条件下相等。因此，“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②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就形成了运动。恩格斯指出，既然简单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末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是包含着矛盾。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

^② 同上书，第160页。

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在思维领域中，也同样存在着矛盾。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个别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这就是矛盾，这种矛盾只有依靠人类在无穷无尽、连绵不断的世代中来解决。可见，从简单的位移到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无不包含矛盾。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普遍的，矛盾构成了事物运动的实在内容和动力。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运用大量的实际材料，论证了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量变和质变是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两种形式。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事物的发展，“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①。这个规律，在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可以举出几百个例子来证明它。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②。恩格斯列举动物界、植物界、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等方面的例子，证明这一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恩格斯阐明辩证法的否定观同形而上学的否定观之间的根本对立。辩证法的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辩证法的否定是“扬弃”，是既克服又保留，是发展的环节又是联系的环节。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否定的方式既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也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不同角度阐明这三个规律的作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4页。

② 同上书，第181页。

用：对立统一规律说明事物发展的动力，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则说明事物发展的形式和方向。所以，在这里虽然还没有明确阐明三个规律的关系，但已包含这样的思想：对立统一规律处于核心地位。

三、揭示认识过程和真理发展的辩证法

在认识论问题上，由于被批判对象的性质，《反杜林论》着重揭示认识过程和真理发展的辩证法。

恩格斯考察认识问题首先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认识是一个矛盾的发展过程。他指出，人类的认识总是处在矛盾之中的，“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都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每天地、不断地得到解决”^①。人的认识能力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从认识的使命来看，人类的实践活动需要人类无限地去认识客观世界；而人的认识按其本性来看，又能认识这个无限的客观世界，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人类不能认识的。但是，人的认识又总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个人的认识能力不仅受到他的生命、生理条件、阶级立场、知识水平等主观条件的局限，而且受到客观事物发展程度的限制，所以他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又是有限的。人类的认识就是在解决这一有限和无限的矛盾中，不断地近似地反映客观现实，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地接近。

杜林不懂这一认识过程的辩证法，鼓吹什么“永远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恩格斯批判杜林这种形而上学的真理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页。

深刻地论证了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在阐述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时，说明人对真理的认识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认识的结果只是近似地反映客观世界，因而是相对的。但是，每一个正确的认识，都是向接近绝对真理的方向前进，相对真理总是包含着绝对真理。因而真理是过程。杜林离开这个过程去寻找“永恒的、终极的真理”，这除了一些陈词滥调，什么也得不到。恩格斯指出，在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如果有人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也可以说这些科学的某些成果是“永恒真理”，然而决不是一切成果都是如此。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所谓“永恒真理”的情况就更糟。“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一定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后果，这些形式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因此，谁要是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末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例如，人一般地不劳动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现在大都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①

真理是具体的，总是同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相联系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恩格斯在阐述真理和谬误的关系时进一步论证了真理的条件性、具体性。他说：“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9页。

误变成真理。”^①真理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谬误则是歪曲的反映，就这一点说，两者的界限是绝对的。但这种反映总是有一定的范围和条件的，超出一定范围和条件，两者就会互相转化。所以，两者的界限是相对的。

总而言之，人能够认识整个客观世界，但这一认识过程，是矛盾的发展过程，“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②《反杜林论》对认识论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揭示了认识过程的矛盾以及人类如何在解决这种矛盾中，把对真理的认识不断地推向前进。

四、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述

杜林的历史观也是唯心主义的。他研究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不是从现实本身出发，而是从观念推论出现实。恩格斯通过批判杜林，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详尽的阐述。

在历史观上，杜林一个基本的错误，是他的“暴力论”观点。他把暴力看做是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本原和基础。恩格斯指出，杜林这种观点并不象杜林所吹嘘的那样，是什么“独特”的思想。这种观念，即国家的政治行为是历史上决定性因素的这种观念，支配着已往的整个历史观，“独特”的是杜林把这些陈词滥调冒充为科学的发现。

恩格斯批判杜林这种谬论首先阐明，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不是暴力，而是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他指出，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暴力构成了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不同的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页。

② 同上书，第125—126页。

手中，暴力可以起不同的作用。它可以成为剥削阶级维护剥削和统治的工具，也可以成为革命阶级打击腐朽势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特别是在历史转变时期，暴力起着巨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①但是，不论暴力在历史上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归根到底它是受经济条件所制约的。以杜林津津乐道的鲁滨逊奴役星期五为例，杜林认为决定性的原因是“政治暴力”。然而鲁滨逊奴役星期五，不是为了取乐，而是要他为自己做工，为了能够从星期五的劳动中获得好处。但是，要获得这种好处，前提是星期五以他的劳动所生产的生活资料，多于鲁滨逊为使他维持劳动能力而不得不给予他的东西。这样，杜林所编造的例子正好说明：“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②此外，暴力工具本身是生产出来的，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就是说，经济情况决定暴力，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没有经济条件，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

其次，恩格斯通过批判杜林的“暴力论”，进一步阐明物质生产的发展怎样导致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杜林把私有制称为“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断言“人对自然界的统治，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为前提的”。恩格斯指出，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因为很明显，在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的财物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页。

② 同上书，第199页。

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是已经存在了。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掠夺。暴力只能改变占有状况，决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恩格斯考察了原始公社内部由于生产力的一定程度发展，出现商品交换导致私有制的出现以后说：“在私有财产形成的任何地方，这都是由于改变了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流——因而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产生的。”^①暴力对于私有制的形成并没有起决定作用。

用暴力来解释阶级和阶级统治的产生，同样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因为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在任何时代都比统治者和剥削者多得多，真正的暴力总是在前者手里。恩格斯指出，阶级的产生，必须以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因为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的产品除了用来维持劳动者的生存以外还有剩余，才有可能出现剥削。但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由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直接原因，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由原来在公社内部担任公职的人逐步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形成剥削者集团和统治阶级；另一方面，公社内部破产的人和战争中的俘虏沦为奴隶，形成被剥削被压迫者阶级，即奴隶阶级。所以，在原始人群中产生阶级分化，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分工和交换的发展造成的，暴力只是加速这一分化过程，而不是产生这一过程的根源。

在历史观上，杜林另一个重要的错误观点是鼓吹超历史、超阶级的道德观和平等观。恩格斯在批驳杜林的谬论中指出，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永恒的道德观念。例如，善恶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中间是极不相同的，甚至是互相直接矛盾的。一定的道德观，是一定的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2页。

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人们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即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未来的利益。”^①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全人类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②只有到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形成真正人的即全人类的道德。平等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对平等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要求废除封建等级制度，要求人权，要求自由贸易平等交换的权利，这些平等要求对反封建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也有其虚伪性的一面，它同无产阶级就不讲平等；而“从消灭解决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③。同资产阶级的平等观相反，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不是表面的，而是实际的；不仅在国家领域中实行，还应当在社会、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它的实际内容是彻底消灭阶级。所以，“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什么都是，就不是永恒的真理。”^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46页。

④ 同上书，第147页。

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也是恩格斯在批判杜林中加以阐明的一个重要问题。黑格尔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但黑格尔把自由看作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产物。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合理思想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他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①对必然的认识是取得自由的前提，但光有关于客观规律的知识还不是现实的自由，在这里关键是在认识和掌握规律的基础上，有计划地使客观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在实践过程中实现。自由是历史的产物。自由的性质和实现自由的程度，归根到底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受社会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制约。恩格斯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出现不受阶级界限局限的真正的自由，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五、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杜林的批判，使恩格斯在哲学的所有重要问题上有可能正面地阐述他和马克思的观点。有的命题和原理是马哲史上第一次提出来的。然而，《反杜林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全面地提出和论证了这些原理。恩格斯说：“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②恩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154页。

② 同上书，第46页。

斯反对杜林杜撰的所谓“科学之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体系”，但并不是反对任何的体系。《反杜林论》最突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全面地提出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在于揭示了这些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提供了一个“体系”，即完整的世界观。

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最初把这三个部分联系起来考察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在这一手稿中，这些组成部分都还处于萌芽状态，还谈不上对这一体系进行科学的论证。此后，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不同时期的著作中，着重论述了这一体系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并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和机会把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组成部分联系起来阐述。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作系统的阐述的是《反杜林论》。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把科学社会主义当作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加以论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他指出，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社会主义就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列宁曾经指出：“在《反杜林论》每一节中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谎言和糊涂观点……”^①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要如实地反映世界。这个世界是物质的，而物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因此，要精确地反映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7页。

作用才能做到。离开辩证法就没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则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①离开唯物主义，辩证法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形而上学。杜林坚持形而上学，蔑视辩证法，使他处处滑向唯心主义，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因为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使他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形而上学。恩格斯通过分析哲学史和对杜林的批判，深刻地阐明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鲜明特点。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之一。很明显，恩格斯是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但是，恩格斯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②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就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也不会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之一，就是在历史领域背叛了自己。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正确地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杜林论》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的成果，不仅在理论上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而且在解决社会生活的所有基本问题中，彻底地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其具体表现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辩证法的统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② 同上书，第377—378页。

第二节 《自然辩证法》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论证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向来重视自然科学、重视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来论证和充实自己的哲学世界观。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①从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时期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密切注意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每一重大发现，都使他们欢欣鼓舞。马克思在紧张地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就系统地研究了数学，写了著名的《数学手稿》。1859年底，达尔文的《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出版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马上研读了这一著作，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称达尔文的发现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②。

然而，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重视自然科学，但是直到七十年代以前，他们哲学研究的重点却是历史观，对自然科学只作过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已经得到深刻的和比较系统的阐述。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就比较薄弱。但是，正象恩格斯指出的，要确立辩证而又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因此，从1873年初开始，在长达八年之久的时间里，恩格斯征得马克思的同意和支持，把主要精力用来研究自然科学，马克思的主要精力则用在继续《资本论》的写作上。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31页。

以，研究自然科学，首先是为了系统地论证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

其次，这也是当时自然科学发展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从十九世纪初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也蓬勃地发展起来，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领域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特别是细胞、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学说等的发现，集中地证明了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但是，当时统治着科学界的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历史早已证明，形而上学不仅不可能帮助科学家摆脱宗教和神学，往往还把他们导向神学和神秘主义。在新的条件下，又重演着这样的历史，不少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甚至成了最坏的神秘主义（如当时流行的“降神术”）的俘虏。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一股歪曲自然科学的新发现，用这种歪曲来论证庸俗进化论、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逆流。如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生理学唯心主义”、“热力学唯心主义”、“数学唯心主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烈地感到有必要用辩证唯物主义来阐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以澄清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所造成的混乱，同时帮助自然科学家们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所以，这不论是对工人运动还是对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七十年代初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以后，便开始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在八年当中，他集中主要精力研究了物理、生物、数学、天文学、化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学科的历史发展和最新成就。并于1873年5月开始写作《自然辩证法》，一直持续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中间因写作《反杜林论》而暂时中断一段时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主要精力用来整理马克思的遗著，使他没法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写作。所以，这是一部没有完成的著作。在恩格斯生前这部著作也没有发表。恩格斯逝世以后，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伯恩施坦之流的阻挠，这部著

作被“冷藏”了几十年，直到1925年才在苏联用俄文首次发表。

《自然辩证法》概括和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系统地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今天看来，这部著作所用的材料虽已陈旧，但它所阐明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仍不失其光辉的意义。

一、总结自然科学成果，论证辩证法的一般性质和主要规律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始终强调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辩证法是同形而上学对立的科学的方法，是认识史发展的总结。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方法，是同十五世纪下半叶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的科学只描述了现象世界总画面的一般性质，还无法说明构成这一画面的各个细节；而不知道这些细节，就无法弄清总画面。因此，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分别进行研究，就成为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恩格斯指出，近四百年来自自然科学的巨大进展，是同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分不开的。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①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恩格斯指出，这种思维方法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出这一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4页。

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①自然科学的发展，愈来愈暴露了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局限性，愈来愈证明辩证方法的正确，“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②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这些材料有力地证明，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所以恩格斯认为，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只有运用辩证的方法才能做到。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第一次描写了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发展的辩证性质，揭示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但是，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认为，人们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强调辩证法要同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把辩证法区分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并正确地阐明两者的关系。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③。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不能象黑格尔那样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4页。

② 同上书，第25页。

③ 同上书，第553页。

它仅仅归结为思维的规律。从这种观点出发，恩格斯把辩证法定义为“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①。

那么，这些最一般的规律是什么呢？恩格斯认为：“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②

象在《反杜林论》中一样，在这里恩格斯主要是要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③，即主要是证明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还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但是，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必然要涉及到的。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在不同的地方就谈及了这些规律之间的联系，特别是着重阐述了“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例如，在〔辩证法〕一节中，当谈到辩证法的一般性质时，就把辩证法解释为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在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而主观辩证法则是这种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恩格斯指出，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吸引和排斥。在磁那里开始了两极性，它在那里是在同一物体中显现出来的；在电那里，它就把自己分配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带有相反的电荷的物体上。一切化学过程都归结为化学的吸引和排斥的过程。最后，在有机生命中，细胞核的形成同样必须看作活的蛋白质的极化，而且进化论证明了：从一个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4页。

② 同上书，第401页。

③ 同上书，第402页。

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①恩格斯认为这种对立的运动构成自然界从无机界到有机界、到人的发展的内容和动力。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把自然界中对立的运动和对这种对立运动的认识，看成为辩证法的实质。

恩格斯在揭示辩证法范畴的对立统一关系时，进一步表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地位。他说：“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这是两个主要的对立，当它们被分开来考察时，都互相转化。”^②辩证法的这些范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恩格斯反对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同一性，认为自然科学从细节上证明了这样的事实：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同一和差异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对立，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它们相互作用，由于差异性包含在统一性中，才具有真理性。”^③恩格斯反对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形而上学认为，一个事物、一个关系、一个过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不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范畴。有些科学家把必然的东西说成是唯一在科学上值得注意的东西，把偶然的东西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他们认为，必然性可以纳入规律，是人们知道的东西；而偶然性不能纳入规律，是人们不知道的东西，可以不加理睬。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人们不知道的东西，从偶然性发现必然性。另一种割裂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形而上学观点，是根本否认偶然性，只承认必然性。这一个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今早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3页。

② 同上书，第558页。

③ 同上。

点钟一只跳蚤咬了我一口，而不是三点钟或五点钟，而且是咬在右肩上，而不是咬在左腿上，这一切都是由必然性决定的。恩格斯指出，承认这种必然性，并不能使人们从神学的自然观中走出来，对科学来说，这样的“必然性”同神学家的“上帝的永恒的意旨”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种观点表面上强调必然性，实际上是把必然性降低为纯粹的偶然性。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肯定了黑格尔关于这两个范畴互相制约的辩证法思想，并在总结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这两个范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黑格尔认为，偶然的东西，因为它是偶然的，所以没有根据；同样是因为它是偶然的，所以有一个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恩格斯指出，黑格尔这些观点是合理的，无非是说明偶然性和必然性都有自己的根据，同时两者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必然性又支配着偶然性，在一定条件下，两者会互相过渡、互相转化。然而，自然科学家们不懂这些辩证法的思想，他们把这些命题当作文字游戏抛在一旁。实际上，自然科学的发展，如达尔文的发现，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些辩证法的思想。

联系到对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关系问题的解决，恩格斯进而考察原因和结果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因果观念是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客观事物各种现象之间总是处在相互作用之中。恩格斯指出：“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①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是辩证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4—575页。

关系，它们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在一定条件下，原因决定结果，结果也作用于原因。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必须把它从普遍联系中孤立出来，揭示其原因。但是，任何现象都处在相互作用的链条之中，原因和结果必然又会相互转化，在彼时彼地是原因，在此时此地则是结果，反之亦然。所以，原因和结果，象所有的辩证法范畴一样，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二、总结自然科学成果，阐明哲学的物质概念以及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提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的著名论断。在《自然辩证法》中，他进一步揭示了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概念的含义。他说：“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量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①又说：“……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象‘物质’和‘运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住。”^②哲学的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的具体的物质概念不一样，它不是某一具体的有形物的反映，而是概括了一切客体共有的东西，即客观实在性。但是，哲学讲的物质又是各种实物的总和，哲学的物质概念就是这一总和的抽象，所以，这一概念又是同具体的物质概念密切地联系着的。

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物质的存在总是通过一定的运动形式表现出来。恩格斯说：“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8页。

② 同上书，第579页。

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①运动是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所以不能把物质运动形式归结为这一或那一形式，但可以划分为“次要形式”和“主要形式”、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或基本形式和非基本形式。恩格斯认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等，就是基本运动形式。

恩格斯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因此，物质运动的各种形式之间虽有质的区别，但又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高级运动形式以“扬弃”形式包括着低级运动形式；每一低级运动形式又可以通过辩证的飞跃转变为高级运动形式。在恩格斯看来，任何物质运动的具体形式都不是凝固不变的，他说：“物质的任何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②然而，运动和物质是不可分的，每一特殊的运动形态必然同一定的质上特殊的物质客体联系在一起。物质是不可消灭的，物质运动形态同样不可消灭，但可以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物质运动的低级形态转化为高级形态，并不是这一低级形态的消灭，而是在比它高级的形态中被扬弃而以一定形式保存在后者之中。

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的不同学科是以物质的不同运动形式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自然辩证法》关于物质运动形态的分类原则对正确解决科学分类问题具有巨大意义。恩格斯说：“**科学分类**。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8页。

② 同上书，第379页。

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①因此，物质运动形态的划分也就成为科学分类的根据。同时，物质运动形态之间的联系和转化，决定了科学分类的辩证性。恩格斯说，正如一个运动形式是从另一个运动形式中发展出来一样，作为这些形式的反映的各门不同的科学，也必然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这就说明，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特殊的对象，它们都有其质的特殊性而相互区别。但这种区别又不是绝对的，各门科学之间都存在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科学分类不是绝对的。恩格斯说：“当我把物理学叫做分子的力学，把化学叫做原子的物理学，并进而把生物学叫做蛋白质的化学的时候，我是想借此表示这些科学中的一门向另一门的过渡，从而既表示出两者的联系和连续性，也表示出它们的差异和非连续性。”^②现代科学的发展、各种边缘学科和新的学科的出现，完全证实了《自然辩证法》所阐明的科学分类原则的正确性。

三、阐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恩格斯认为，科学要研究物质运动形态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由无机界到有机界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首次揭示了生命的起源和本质，解决了由无机物向有机物向生命的转化问题。而他对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则解决了自然界向人类社会的过渡问题，这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都是重大的贡献。

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长期以来就是科学和宗教、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欧洲很长的历史上，宗教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3页。

② 同上书，第595页。

学宣传人是“上帝创造”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则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随着社会生产和科学的发展，人类起源的问题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种研究本身就是对神学的一种否定。十八世纪瑞典科学家林耐提出人类同猿是十分相象的，十九世纪初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提出了生物进化的观点。1859年，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系统地论证了生物进化的理论，证明了人类是由进化而来的，有力地打击了宗教神学。1863年英国科学家赫胥黎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确定猿是人类的祖先。这样，证明猿如何转变为人，就成了科学界的尖端课题。

在人类起源问题上，既有自然方面的问题，也有社会方面的问题，当时自然科学界，局限于从自然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他们无法解决作为动物的猿如何过渡到社会的人。黑格尔提出过劳动在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认为人是自己劳动的结果，猜测到了人类起源的社会方面的因素，但由于他把劳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所以，他同样无法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

人类起源、从而社会的起源问题，是历史观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创立唯物史观之初就已提出了正确的、原则的意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他们把劳动当作人的本质特征、当作人脱离动物界的主要标志，认为劳动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发源地”。这些观点，为科学地解决人类起源问题奠定了基础。恩格斯于1876年6月至7月间写的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总结了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具体地分析了猿转变为人的历史过程，使这一问题得到科学的解决。

恩格斯这篇论文的中心是论证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他在论文的开头就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

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

恩格斯认为，由猿转变为人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猿类最初是生活在树上的。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逐渐习惯于直立行走。实现这一步，是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使手和脚的运用发生了分工，结果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②

但是，手仅仅是整个极其复杂的机体的一个肢体。由于生长相关律，人手的逐渐灵巧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脚适应于直立行走的发展，必然会反过来作用于机体的其他部分，引起这些部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由于手、劳动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开始由消极地适应自然环境变为积极地改造这一环境，开始了对自然界的统治；另一方面，促使社会成员之间更紧密地协作和互相帮助，结果产生了新的交往的需要。而“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③。这样，语言便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

在猿向人转变过程中的第三个因素是猿的脑髓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在这里，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而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这就产生了人对外界的反映和认识，产生了人类所特有的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即人类思维。这样，由于长期劳动的结果，便实现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而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便形成了人类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9页。

② 同上书，第511页。

③ 同上书，第512页。

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是劳动。人类的劳动起源于猿类的本能的、动物式的劳动，又与后者具有本质的区别，人类的劳动是以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改造自然为主要特征的。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①这就说明，在从猿向人、从动物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过程，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劳动。

四、总结人类认识史，深刻论证 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

弄清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不论对哲学还是对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在《反杜林论》、特别是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用了很多篇幅阐明这一问题。他考察了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

他首先说明，哲学的发展是同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哲学史来看，唯物主义的发展就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制约。古希腊哲学的辩证的发展观，以天然的纯朴的形式出现，原因就在于科学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进行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还仅仅是一个直观的对象。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分门别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使自然科学获得长足的进步，但主要是在数学、力学、天文学、静力学和动力学这样一些领域获得进展。受这种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发展状况的制约，在哲学上形成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从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8页。

德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提出关于天体演化的星云假说打开形而上学研究方法的第一个缺口开始，自然科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发现。这些发现，特别是细胞、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的发现，集中地证明了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这些最新成就，创立了本质上辩证的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有力地证明，哲学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在他稍后撰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得出结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①。研究和概括自然科学的成果，是繁荣和促进哲学科学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

其次，恩格斯又指出，自然科学研究又必须有正确的哲学的指导。他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恩格斯批判了狭隘经验主义否认哲学对自然科学研究指导意义的错误。他指出，经验自然科学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識材料，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同时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关系，已经不可避免。但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已经不中用，自然科学已经走进了理论的领域，所以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

恩格斯指出，有的自然科学家认为，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4页。

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①事实说明，那些想要摆脱哲学支配的自然科学家，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例如，经验主义轻视辩证法就受到了这样的惩罚：连当时那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

所以，问题是用什么哲学作指导。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他说：“……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②因此，自然科学家必须自觉地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

第三节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和发展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对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划时代的贡献。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挑起了领导工人运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担。一方面，恩格斯为整理马克思的遗著《资本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另一方面，他又在总结新的历史经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2页。

② 同上书，第383页。

和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斗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继续推向前进。

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

研究原始社会的发展及其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学说时，由于他们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现代社会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迫切问题，所以还无法分出时间去详细研究这一问题。但是，即使是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没有忽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就试图对原始社会的结构和特征作出解释。他们认为，与原始社会不发达的生产水平相适应，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社会结构只局限于家庭的扩大。他们已经认识到，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反杜林论》则阐明由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是经由两条道路实现的。这就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作出突破性贡献的，是恩格斯于1884年3月底至5月底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下称《起源》）。恩格斯写这一著作，利用了美国学者摩尔根于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中记载的材料。摩尔根曾经在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中生活了整整四十年，这部著作记录了大量的原始社会状况的第一手材料。马克思在世时非常重视摩尔根这一著作。1881年至1882年间，他曾经对这一著作进行仔细研究，并作了详细的摘要和评注。他当时打算利用摩尔根的发现写一部原始社会史的专著。他来不及实现这一计划就逝世了。恩格斯写的《起源》就是在马克思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他把完成这一著作当作执行马克思的遗言。

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概括了他研究原始社会史在理论上得出的一个基本原理：“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①这就是著名的关于两种生产的原理。

应该指出，关于两种生产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并不是《起源》第一次提出来的，实际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一原理已经提出来了。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基础以后，跟着就指出：“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长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德国除外）从属的关系了。”^②这里不仅提出了两种生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而且认为从历史的最初时期开始，两种生产就同时存在着，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和书信中，都曾谈及两种生产的作用问题。

但是，把两种生产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作为一个完整的原理提出来，并用原始社会演变的材料加以论证的，还是《起源》。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33页。

这里，恩格斯把两种生产当成统一的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因为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就不会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没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不会有人类自身的生产。但是，恩格斯又指出，两种生产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所起的作用是有区别的。一定的劳动发展阶段和一定的家庭发展阶段，制约着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然而，劳动发展程度和家庭发展程度的不同，它们对社会制度的制约也不同。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例如，在原始氏族制度下，人类的社会关系只是家庭亲属关系或这种关系的扩大，而人类的家庭形式是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人类从杂乱性交关系的原始状态中，依次发展为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主要地是自然选择的原则在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经济关系。当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人类开始从改造自然中创造自己的生活来源，劳动产品的数量日益增加，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私有制以后，经济规律就开始发生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说：“在成对配偶中，群已经减缩到它的最后单位，仅由两个原子组成的分子，即一男一女。自然选择已经通过日益缩小婚姻关系的范围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一方面，它再也没有事可做了。因此，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那末，从成对配偶制中就没有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这种动力开始发生作用了。”^①这种新的、社会的动力，就是私有制。从这时候开始，人们的家庭制度、从而社会制度就完全受所有制所支配。这就说明，两种生产同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两种生产本身发展的程度不同，它们作用的程度也不一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65页。

恩格斯指出，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原始氏族社会内部，盛行着原始共产制的共同的家庭经济。分工只存在于两性之间。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生产极不发达，人口极度稀少。在这一物质生产基础和血缘亲属关系基础之上，派生了氏族社会的整套上层建筑。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议事会，这是氏族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由议事会选举产生，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酋长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德性质的，军事首领仅仅在出征时才能发布命令。同族人相互援助，死者的财产转归其余的同族人所有。恩格斯在描绘这种“美妙的”、“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时写道：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就是说，在氏族制度内部根本不存在人对人的剥削和奴役。

但是，这样的制度是建立在生产水平极低和血缘亲属关系之上的，人类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所以，这样的制度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它注定是要灭亡的。

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发现，分析了原始社会的发展及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他把原始社会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每一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人类还栖息在森林中，以采集果实、坚果和根茎为生，分节语产生了，这就开始了向人类社会的过渡。中级阶段，是从采用鱼类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的。由于这种新的食物和火的使用，

使人们可以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并开始磨制和使用石器。后来，发明了弓箭，人类社会就进到了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这时，人类已有定居而成村落的萌芽，以及对生活资料生产的某种程度的掌握，如木制的容器和用具，用本质纤维作成的手工织物，用树皮或芦苇编成的篮子，以及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等等。而从学会制陶术开始，人类社会就由蒙昧时代进入野蛮时代。恩格斯在阐明野蛮时代同蒙昧时代的区别时指出：“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①在恩格斯看来，野蛮时代是原始社会向文明时代即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一过渡的完成，是由生产力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所决定的。

原始社会由蒙昧时代进入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以前按年龄和按性别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出现了部落之间的劳动分工，即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就促进了交换的发生和发展。由于分工、交换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畜牧业、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使人的劳动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于是，吸收新的劳动力便变得有利可图。过去，战俘往往被杀掉，或被吸收为部落的平等的成员，现在，战俘变成了新的劳动力的来源，变成奴隶。恩格斯说：“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页。

者。”^①

这样，原始社会从进入野蛮时代以后，便开始了解体的过程。经过野蛮时代的中级和高级阶段，这一解体过程加速了。这一阶段，又出现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即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这是所谓铁器时代。铁的发现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铁不仅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而且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极其坚固和锐利的工具。人们已不是单纯仰赖自然的赋予，而是开始改造自然，用自己的劳动来创造新的生活来源。手工业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而逐渐独立出来，这就产生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由于工具的改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劳动力的价值进一步提高了。这时候，在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产生的还是零星现象的奴隶制，已经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再是简单的助手，他们被大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中去劳动。同时，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不仅出现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区别，而且在自由民中间出现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这样，也就导致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和在这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的解体，实现向私有财产过渡，个体家庭也就变成社会的经济单位。

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必然会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得到反映。战争成了掠夺性的经常的职业。军事首长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他们的权力不断加强，而且逐渐变成世袭制。“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和人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84—185页。

已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①与新的经济发展和阶级分化相适应，国家开始不知不觉地形成了。

原始社会进入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以后，氏族制度便走到了尽头，并开始向文明时代过渡。这时候，在经济领域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阶级分化日益加剧，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这个由社会内部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产生的阶级对立，社会本身不仅再也不能调和，反而使这种对立日益尖锐化。恩格斯指出，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这第三种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产生的，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分裂为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对立，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为了使这些对立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以缓和冲突，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恩格斯说：“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②由于国家是在阶级对立中、并且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它与旧的氏族组织不同，它不是按血缘关系来划分和组织它的成员，而是按地区来划分和组织它的国民的；它不是居民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而是建立了与居民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它不是全体居民的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88页。

^② 同上书，第194页。

织，而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贡献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写于1886年初。写这一著作的直接动因是评述丹麦哲学家施达克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真正的目的则是利用这一机会，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系统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

当时在德国思想界出现的“时髦哲学”新康德主义等影响极坏，它们抛弃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因素，企图复活那些消极的东西，并且把斗争的锋芒对准马克思主义哲学，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同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原则界限。因此，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联系和区别，就成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迫切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从不讳言，他们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他们对德国古典哲学作了真正科学的评价。在本书中，恩格斯针对新康德主义者的歪曲，又进一步作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先导。”^①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变革的要求。但这种辩证法的革命性质却包裹在唯心主义体系的外壳中，黑格尔本人则公开为德国封建专制制度辩护。所以，在黑格尔哲学中，革命因素和保守方面、精华和糟粕，是混杂在一起的。例如黑格尔的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辩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页。

当时的德国专制政府、自命为“革命派”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是这样认为的。但就在这样一个命题中，也包含着革命的因素。黑格尔认为，凡是现存的东西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在事物发展进程中，凡从前是现实的一切，都会失掉自己的必然性而成为不现实的。而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就会代替衰亡着的东西而变成现实的东西。因此，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黑格尔这一命题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这就导致得出否定德国专制制度的结论。

黑格尔哲学的这种特点，是当时的哲学家、包括费巴哈尔在内，所无法理解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才能够剥去其神秘主义的外壳，发现其合理的内核。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就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①。在黑格尔看来，真理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人对真理的认识，总是从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不可能达到所谓最后的绝对真理。社会历史的发展同样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的最后的阶段。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恩格斯说：“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

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①

但是，恩格斯在这里所表述的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是从黑格尔的方法中逻辑地得出的结论，黑格尔本人并没有作出这样鲜明的概括。相反，由于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体系的基础之上的，方法和体系之间就处于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黑格尔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但又把发展归结为精神的发展；一方面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无限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绝对观念发展到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国家就达到了顶点；一方面认为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又认为他的哲学是“绝对精神”的体现，是“绝对真理”。可见，由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性质，他的辩证法的革命方面也就被闷死了。他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不彻底的。

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另一位伟大代表费尔巴哈的哲学，恩格斯也进行了全面的具体的分析。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把“绝对精神”当作世界的本原。他认为，世界的本原不是“绝对精神”，而是自然界。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德国思想界在黑格尔哲学的长期统治之后，费尔巴哈这些观点的发表，无疑起到某种解放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由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就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

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功绩是很大的。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制服黑格尔哲学。恩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

斯指出：“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① 费尔巴哈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并没有克服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他在自然观上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历史观则是唯心主义的。

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合理因素，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后两者的联系，是错误的。但是，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原则区别，更加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而创立的。它的诞生是哲学上的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则贯穿着辩证法；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并且彻底地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最锐利的武器。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总结哲学史，首次明确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他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② 哲学家们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② 同上。

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①此外，“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②

思维 and 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任何哲学家都必须回答的最基本的问题。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回答这一问题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然而，不管他们采取何种方式，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构成了他们的哲学的出发点，决定了他们对哲学的其他问题的回答。

恩格斯首先指出，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本原这一问题的回答，把哲学家们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他强调这是划分哲学上两大派别的唯一标准，此外没有别的标准。在哲学史上，曾经有过各种划分标准，结果是造成种种混乱。例如，施达克把“相信人类进步”、“追求理想目的”、“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叫做“唯心主义”，而把追求物质享受、大吃大喝叫做“唯物主义”，这就混淆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界限。这样一来，那些饕餮之徒就成了地道的“唯物主义者”，而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就都成了天生的“唯心主义者”，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在一定思想的支配下行动，都会追求一定的目的和理想。这类“划分标准”，除了造成混乱之外，是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的。

恩格斯指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则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哲学史上绝大多数哲学家都肯定世界的可知性，但也有一些哲学家如休谟和康德否认人们能够认识世界。恩格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② 同上书，第221页。

在批判不可知论中，进一步论证了认识的实践标准问题。他指出，对不可知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能够按照某一自然过程的条件把它制造出来，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这就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不可知论也就站不住脚了。

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科学的重大贡献。在哲学的对象、哲学派别的实质、哲学发展的规律性以及哲学的党性等问题上，过去的哲学家们弄得混乱不堪。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使这些问题得到正确的解决。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另一方面的主要内容是对唯心史观的批判和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恩格斯指出，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共同的局限性是在历史领域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们都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他们半途而废，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它的动因。例如，费尔巴哈的历史观从“人”出发，在形式上是现实的。但这个“人”是“人的一般”，是抽象的人。他用人的情感、性爱等精神的东西来说明历史，因此费尔巴哈同样无法摆脱旧唯物主义所共有的局限性。

恩格斯批判唯心史观，着重论证了社会规律的客观性问题。他指出，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早已得到证明，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但是，社会发展史有一点和自然发展史是不同的。在自然界，除了人对自然的反作用，在这里发生作用的，全是盲目的、不自觉的力量，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中。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和起作用的，则是人，而人的行动总是以一定的思想为指导，总是抱有一定的意图和目的的。但是，尽管有这样的差别，历史过程和自然过程一

样，也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这里，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表面上好象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有些人的目的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有的则因为缺乏实现的手段而落空。所以，在社会历史领域，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问题只是发现这些规律。恩格斯认为，我们应该注意研究那些推动广大群众、整个民族，而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推动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研究那些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的头脑中而成为自觉动机的动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隐藏在历史人物动机背后的动力，才能发现支配历史发展的历史规律。

三、恩格斯晚年在一系列书信中，对 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论证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年代，由于他们主要的批判锋芒是历史唯心主义，因此，他们在理论上也主要是论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是，也不是没有谈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问题。例如，马克思总结1848年至1849年的欧洲革命经验的一系列著作，就曾经对国家、政党和传统的作用作了许多论述。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关于上层建筑的作用问题更为突出了。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认识国家、政党以及革命理论等上层建筑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唯物史观进行肆意的歪曲和攻击，因而进一步阐明这一问题也是理论斗争的需要。例如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1858——1922年)就采用无中生有的卑劣手法，硬说马克

思把“经济”的发展看成历史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攻击唯物史观是什么“技术经济历史观”、“社会静力学”、“经济唯物主义”。巴尔特之流的这种歪曲，在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中间获得了广泛的赞许，同时对那些阅历不深、一知半解的青年发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用通讯的方式，反驳了资产阶级学者的歪曲，完整地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就产生了一系列著名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1894年1月25日致符·博尔吉乌斯)。

在这些书信中，恩格斯强调地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本人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他们是在“归根到底”这一意义上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的，这一论断本身就包含了承认其他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一定的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派生的。但一定的上层建筑一经产生，就会在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的范围内，具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和发展阶段，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恩格斯指出，从分工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由于分工，从事一种活动的人就会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从而获得了某种独立性。国家政权是由社会产生的，但国家一旦产生，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出现一种特殊的活动和这种活动所具有的特殊的利益，它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反过来同社会相对立。法也是如此，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出现，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独立部门，有自己的特殊活动和特殊利益。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如宗教、哲学等等，其相对独立性就更为明显。从事这些思想领域工作的人们，形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特殊部门和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都必然

会相对独立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并且有自己的特殊的发展规律。比如，意识形态的发展必定具有继承性，总是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经济条件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它只是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从分工出发阐明上层建筑诸因素的相对独立性，是恩格斯这些书信的一个重要贡献。

阐明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有力地证明上层建筑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因素，并为阐明上层建筑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产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他一再强调，原因和结果并不是永恒对立的两极，并不是不发生相互作用的。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会反过来作用于产生它的原因。例如，“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①上层建筑既可以促进历史的发展，也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其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在这些书信中，恩格斯还通过批判德国党内的“青年派”，深刻阐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这个“青年派”是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在德国党内由一些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青年资产者组成的反对派。这些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但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页。

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的态度。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以为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种教条主义的方法，完全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实质。恩格斯指出，他和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因此，“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① 这些领域无限广阔，过去只有很少的人认真研究过，只取得很少的一点成绩。因此，这里大有可为，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恩格斯希望青年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同时希望青年人不要满足于一知半解，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根据原著来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唯物史观这一锐利的武器，并在研究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获得实际的成果。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为捍卫这一哲学进行了卓越的斗争，并把这一哲学继续推向前进。他在晚年的书信中，对唯物史观方法论意义的论证、关于要重新研究全部历史的论断，仿佛是留给后人的遗嘱。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同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开始了新的发展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

本章阅读书目：

恩格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致梅林（1893年7月14日）、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 的早期传播。第一批马 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贡献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 洲早期传播的概况

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而诞生的。

最初，它在知识分子中获得一部分人的拥护，继而引起工人组织的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工人组织的活动，并在各种工人集会上宣传他们的主张。工人代表逐渐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正确的理论。这样，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一著作的出版，在工人运动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很快就被翻译成法国、丹麦、瑞典、波兰和英国等国的文字出版。

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能够迅速传播开来的决定性基础。《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掌握着宣传工具的资产阶级新闻界、科学界，企图用沉默、抵制的办法来扼杀它。但在工人中间，马克思却获得了热烈的支持。当马克思获悉工人们能够理解并欢迎他的著作时，他高兴地写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

劳动的最好的报酬。”^①第一国际在1868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专门通过了一项关于《资本论》的特别决议，指明这一巨著的伟大意义，号召各国工人学习和掌握它。

欧洲，特别是德国、英国和法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活动的主要舞台，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在这些国家传播开来。到恩格斯逝世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大部分已译成欧洲各国文字出版，他们的思想已成为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导和教育下，成长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德国的约瑟夫·狄慈根、弗兰茨·梅林、卡尔·考茨基；法国的保尔·拉法格；意大利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以及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他们在各国翻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中间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们还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写了一系列著作，进一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有必要研究和阐明他们的贡献。

第二节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狄 慈根、梅林和考茨基

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地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自关怀和教育下，德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成长起来。

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年)：生于德国莱茵省的布兰肯堡，是制革工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他靠自学成为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哲学家。青年时代参加革命活动，1848年革命后流亡到美国。1864年，为找工作，又迁居俄国。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页。

这里，他一面做工，一面从事理论研究，《人脑活动的本质》(1869年)就是在这里写成的。1869年回到德国，随后又去美国，在美国度过晚年(1884—1888年)。他的重要著作还有《论逻辑书简》(1880—1883年)、《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1886年)和《哲学的成果》(1887年)等。

狄慈根是靠自学成为哲学家的。恩格斯说：“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①狄慈根最初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他的世界观的进一步发展则是同马克思的影响分不开的。他在侨居俄国期间，读到了马克思的许多著作。1867年10月24日和11月7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明确地谈到马克思的著作对他的影响，他认为从来还没有那一本书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那样，使他获得如此新颖而有用的知识和教益。他认为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用清晰的、无可辩驳的、科学的形式，第一次阐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他又进行了精心研究，并写了书评。1867年从俄国返回德国结识了马克思以后，他更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得到了许多直接的帮助和教育。但是，也不能否认，由于狄慈根的工人的素质和他顽强的钻研精神，使他能够独立地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某些原理。

首先，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来看，他坚定地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他鲜明地提出：“精神和物质哪个是第一性的，哪个是第二性的？”^②并明确地作出回答：物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人脑的机能。他认为世界只有一个，这个世界是所有存在物的总和，客观物质世界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世界上的事物尽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②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61页。

千差万别，但都是那个唯一的不可分割的单体的各个部分。这里已经表达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的思想。他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整体，并且认为这种整体性就是哲学的对象。

其次，狄慈根还研究了辩证法问题，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他认为辩证法是“中央的太阳”，从这里发出的光，不仅照亮了经济，而且照亮了整个文化和整个科学的发展。他把辩证法了解为世界观，认为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是统一的。他对辩证法的内容和规律的表述，有许多闪光的思想。他认为客观世界是有机的整体，是辩证地互相联系着的现象的总和。物质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运动、变化是“宇宙的本质”。只有从物质世界的物体和现象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它们的运动和发展，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来研究，才能认识物质世界。狄慈根深刻地认识到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矛盾。所以，他的著作非常注重对事物内在矛盾的分析，他对辩证法的一系列范畴的分析，如对原因和结果、现象和本质、特殊和普遍、必然和自由的分析，就坚持了对立统一的观点。

再次，狄慈根对认识论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这方面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也较大。

在考察认识问题时，狄慈根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肯定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性质。他认为，作为人的认识客体的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人的认识和认识能力，却是物质世界的产物。他指出思维是大脑的机能，思维不能离开思维的器官——大脑。人的思维过程是和周围世界、和人们的实践、经验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他把认识当作一个过程来看待。认为认识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是由不知到知的无限深化的过程。我们可以认识绝对真理，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人的认识又不可能一下子达到绝对真理。认

识是对客观认识对象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绝对的符合。狄慈根非常强调人们的认识只是近似地与认识对象一致。但他又认为，这种近似的、相对的认识，又具有“绝对物的本性”，即在相对中包含着绝对。绝对的东西和相对的东西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区别，因为无限的东西是由无数有限的东西构成的，而每一个有限的东西则又在自身中包含着无限的本性。人的认识就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

狄慈根提出了认识的阶段性问题。他认为人们在认识世界过程中，运用了两种形式。一种是具体的、感性的形式，是通过人们的感官所感知的认识；另一种则是抽象思维的形式，即通过大脑的分析和综合的活动所达到的认识。这两种形式是相互衔接的。人的大脑是“汇合器官”，通过分析和综合感性材料，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狄慈根批判了康德和新康德主义者的不可知论。他指出，康德割裂了“自在之物”与现象之间的真实关系，在两者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完全错误的。“自在之物”就是客观世界，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差别，人们透过现象完全可以认识“自在之物”。他提出了实践是对不可知论的有力驳斥的思想。他说，即使人们按照科学的一切要求，从植物学、化学等科学上研究并理解了樱桃，也毕竟只有在看到、摸到、尝到、知觉到樱桃之后，才真正地认识了它。他的结论是，在合理的界限以内，人类能够从事一切，也能够认识一切，没有不可认识之物，只有尚未认识之物。

狄慈根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问题，都作了独立的探讨，提出和阐明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思想。但他的哲学观点也有许多不确切、甚至错误的地方。例如，他强调精神来自物质，是对的，但又认为必须扩大物质概念，把精神现象也包括进去，这就模糊了物质和精神的原则界限，向唯心主义作了让步。又如，他在阐述

认识的辩证过程时，有时片面地强调了人类知识的相对性，模糊了辩证法和相对主义的界限。狄慈根这些缺点和错误后来被马赫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所利用，把他说成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先驱者”。狄慈根的不肖之子欧·狄慈根，也违背狄慈根的本意，制造什么“狄慈根主义”，把狄慈根的观点歪曲成为马赫主义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列宁在评价狄慈根的贡献时写道：“整个说来，约·狄慈根是个唯物主义者。狄慈根是僧侣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敌人……工人们要想成为有觉悟的人，应该读一读约·狄慈根的著作，但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阐述并不总是正确的，只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才能学到哲学。”^①

弗兰茨·梅林(1846——1919年)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杰出的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出生在一个普鲁士官吏家庭，青年时代攻读哲学和文学史，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他起初相信唯心主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而转向唯物主义。八十年代研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逐步认识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八十年代末，随着世界观的转变而同资产阶级报刊决裂，并开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受到人们注意。1891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主要编辑之一，后来又主编《莱比锡人民报》，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上的公认的杰出的理论家。

梅林学识渊博，他的理论创作活动涉及哲学、哲学史、历史和文学等许多领域。他先后撰写了许多有重大价值的著作，如《莱辛传奇》(1893年)、四卷本《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8年)、《中世纪以来的德国史》(1910年)、《战争和军事艺术史概论》(1908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62—63页。

——1914年)、《马克思传》(1918年)等。

梅林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就始终一贯地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而同各种反动的哲学流派作不调和的斗争。在八十至九十年代,他先后批判了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批判了叔本华、哈特曼和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反对新康德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他有力地揭露了这些哲学流派的反科学、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间,梅林最先揭露了尼采主义反映帝国主义利益的反动本质。

梅林的理论创作活动牵涉的面很广,重点是阐发和宣传唯物史观。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在德国党内外,冒出一股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是几个“天才煽动家”所捏造的“幻想”;有的则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而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之流,附和资产阶级学者的歪曲,否认思想、理论、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否定革命的作用,企图用诡辩和折中主义偷换唯物辩证法,把唯物史观篡改成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梅林同这种歪曲和攻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和著述工作的中心,是同这样的斗争环境分不开的。

梅林在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歪曲时,着重阐明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他指出,唯物史观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只有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矛盾充分发展和充分暴露的时代,这一历史观才能被发现,在这以前,即使是最天才的头脑也不能把它硬想出来。梅林把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伟大发现比做达尔文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现,认为这一发现是客观历史规律的反映,是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

梅林在《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其他论著中,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所作的经典表述,概括地阐明

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恩格斯曾经指出梅林对唯物史观的主要观点论述得非常出色。梅林认为，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承认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指出，观念是不能无中生有的，而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决定精神生活的生产过程。观念、思想的力量就在于它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反映得越精确，就越有力量。梅林虽然强调物质生活条件的决定作用，但综观其全部著作，可以发现他在有些地方还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问题作了相当深刻的阐述。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在社会历史观上实现革命的变革，从理论上来说，就在于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彻底地贯彻了唯物辩证法。他有时就把唯物史观称为“历史的辩证法”。他在驳斥资产阶级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歪曲时写道：“有人硬说好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表白他们相信天命的宿命论，并把一切思想的动力从人类的历史发展中驱逐出去。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没有根据的事情了。从他们的辩证方法中自然应引导出如下的原理：社会对国家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国家也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事实是最后的决定因素，而思想观念也能够从自己这方面影响经济事实；意识形态不能发生独立的作用，可是绝对不能由此就说意识形态似乎根本不发生作用。”^①

梅林在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认为唯物史观是一个科学体系，但不是已经达到绝对真理的封闭体系。他强调唯物史观是适用于研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他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唯物史观。他指出，当唯物史观被当作刻板公式来加以滥用的时候，它就会同哲学史上所有其他刻板公式一样走向对真理的歪曲。梅林本人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历史、哲学史、文学史、军事、艺术、道德等领域的研究上取得杰出成绩的马克思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第116—117页。

义哲学家。他的《莱辛传奇》一书出版后，恩格斯给予很高的评价。1892年3月16日，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梅林发表在《新时代》上的《莱辛传奇》我已读过，感到十分满意。这的确是一篇出色的作品。要是我的话，有些地方不会这样去说明和强调，不过一般说来，他还是抓住了要领。令人鼓舞的是，二十年来唯物史观在年轻党员的作品中通常只不过是响亮的词藻，现在终于开始得到恰当的应用——作为研究历史的引线来应用。”^①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方面的著作，是运用唯物史观阐明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第一批重要著作，例如《马克思传》、《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等著作，不仅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伟大的一生，而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再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在这些方面，梅林的研究工作可说是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典范。

梅林的理论观点也有一些不彻底和错误的地方。例如他有时不确切地用“机械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来称呼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容易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界限。在一些场合，他对拉萨尔的活动和理论观点作了不正确的评价，把马克思和拉萨尔的原则分歧称为“误会”，对拉萨尔的“自由的”“超阶级的”国家、农民具有“反动性”等等错误观点作出让步，这都是一些明显的错误。然而，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梅林不失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以自己创造性的理论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出生于布拉格，父亲是戏院舞台美术家，母亲先是演员后来成为著名作家。考茨基早年受路易·勃朗、拉萨尔、杜林、朗格等人的庞杂思想的影响。1875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10页。

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来转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0年大学毕业迁居苏黎世，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著作，1881年在伦敦第一次会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担任恩格斯的秘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

考茨基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期内，对阐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一，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二十世纪初，考茨基写了一系列著作，如《婚姻和家庭的起源》(1882年)、《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1888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1889年)、《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年)、《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1894年)、《基督教之基础》(1908年)、《卡尔·马克思的历史贡献》(1908年)等。在这些著作中，考茨基通俗地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特别强调经济关系对思想关系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对此作过很高的评价。这些著作被译成各国文字出版，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读物。在这些著作中，考茨基强调马克思创造了新的经济和历史的体系。马克思的著作充满批判精神，但他对前人的批判只是为了论证这一体系。在《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等著作中，考茨基探讨了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他认为法国革命的胜利是历史规律性的具体表现。这种胜利表明，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领袖人物只起领导者的作用，人民群众是决定历史过程的最主要的力量，领袖本身的力量来自群众。应该承认，考茨基对唯物史观的通俗解释和宣传是有成效的。

第二，在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中唯物史观的运用。考茨基在通俗地宣传唯物史观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注意运用唯物史观

来研究实际生活和进行理论研究。在这方面他的比较突出的成绩是参与制定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1年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这个纲领的理论部分是考茨基执笔的。在这里，考茨基强调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首要意义，认为这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提，并且强调历史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最后胜利规律性。在其他一些著作，如《社会主义问答》中，他也试图运用唯物史观来阐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考茨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研究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另一方面是在历史、特别是史前史领域。他探讨了婚姻、家庭、人口增殖，以及宗教起源等马克思主义者比较少涉及的领域，写成了《婚姻和家庭的起源》、《基督教之基础》(1908年)、《人口增长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等著作。考茨基认为，我们要了解现在的社会，就要了解它怎样变成这样，就要考察各种现象——资本主义、封建制度、基督教、犹太教等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而且也只有注重这种历史研究，才能掌握历史规律，才能在阶级斗争中成为一个自觉的和眼光远大的战士。

第三，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和阐发。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德国党内已出现修正主义的苗头。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斯坦、福尔马尔就公开掀起修正主义的旗帜。1899年，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伯恩斯坦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伯恩斯坦和辩证法》、《伯恩斯坦关于价值理论和阶级理论》，其后又陆续出版了《土地问题》(1899年)、《社会革命》(1902年)、《伦理学和唯物史观》(1906年)等著作，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言论进行了批判。在这些论著中，考茨基驳斥了伯恩斯坦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和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伯恩斯坦胡说辩证法会导致对社会现象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考茨基则认为辩证法是理论研究的最好的工具，没有辩证法，就不会有马克思和恩格

斯伟大的科学成就。针对伯恩施坦抓住马克思的个别结论企图篡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企图，考茨基提出要把马克思学说中的个别结论同整个体系区别开来，他说他对这些问题研究得愈久，他就愈坚信：马克思的学说只在个别结论上有错误，而其整个体系则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考茨基这些著作和观点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这点应该肯定。

但是，考茨基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早期活动中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有贡献，但即使在这一时期，他的理论观点也有许多片面性和错误。例如，他在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时，就有忽视主观因素作用的倾向；他强调辩证法是“最好的工具”，但只归结为工具——方法，忽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同时又是世界观，不懂得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本质区别；他在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看清伯恩施坦的错误及其危害，后来在批判伯恩施坦的过程中，也显得犹豫不决、摇摆不定。这一切理论观点上的片面性和错误，加上他轻视革命实践的作用、他的教条主义倾向，使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致后来走上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

第三节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

保尔·拉法格(1842——1911年)是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宣传家，他为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法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活动的主要舞台之一。法国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较软弱，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小资产阶级还占法国居民的大多数。这种社会状况为蒲鲁东主义和

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深厚的土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则受到了阻碍。拉法格在结识马克思以前，也深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

拉法格第一次会见马克思，是1865年2月。当时他作为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代表到伦敦向国际总委员会汇报工作。这一次会见成了他的世界观根本转变的转折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和影响下，他很快便认识到蒲鲁东只代表过去，唯有马克思才代表未来，从而转向马克思主义。

列宁曾经指出，拉法格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天才和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①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在参与组织、领导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同时，非常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宗教、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写了多种重要著作，如：《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1885年）、《宗教和资本》（1887年）、《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895年）、《财产及其起源》（1895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1900年）、《思想起源论》（1909年）等。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史上，这许多著作属于重要的历史文献之列。

拉法格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新康德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康德主义在德国复活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走向反动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在理论上走向穷途末路的表现。他集中批判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他指出，康德是“观念天赋”这一先验论思想的继承者和完成者。在他看来，实体、因果性等等概念，是一种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理智范畴”，它们先天地存在于人们的理智中，根本不能从人们的经验中引伸出来。拉法格指出，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学者复活康德这套主观唯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6页。

心主义的理论，完全是为了与正在蓬勃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相对抗。为此，拉法格在不少著作中，专门阐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起源。他用大量实际材料阐明，人们的观念、思想，并非生而具有，而是起源于人们的经验，即使象数学公式那样抽象的概念，也是在社会实践发展到某一阶段上产生的，同样是人们的实践经验的产物。

拉法格在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时指出，康德把本质和现象、把“自在之物”和人类意识对它的反映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人的认识和客体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认识过程就是逐步揭示事物本质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把“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的，实践推翻了不可知论关于“自在之物”不可知的结论。拉法格指出，把感性认识和逻辑认识割裂开来，把其中一种认识形式绝对化而否定另一种，是不可知论的认识论根源。不可知论否定理性的作用和力量，是与科学相对立而为宗教信仰开辟道路的，它完全适应了害怕客观真理的反动资产阶级的需要。

拉法格在哲学上主要的贡献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他的主要著作都是探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他认为马克思从上帝的最后的避难所、即从历史中把上帝驱逐出去，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观。他把捍卫和宣传这一科学的历史观当做自己的理论工作的最主要的任务。

拉法格在批判让·饶勒斯的唯心史观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决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饶勒斯认为，早在野蛮人的头脑中，现代人所掌握的正义和博爱观念就已存在，只不过是它们处于无意识的睡眠状态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一当它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便与外界发生冲突，直到矛盾解决为止。这种观念的发展也就是历史发展的永恒的动力。拉法格在批判饶勒斯这种唯心史观时，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

同饶勒斯之间的争论可以归结为观念的起源和形成的争论。我们从自己的祖先那里继承了经过许多世代延续下来的观念，表面看来好象是先天的，实际上它们来源于我们祖先的经验，是受当时一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而今天我们继承这些观念，又是从一定的经济地位、经济利益出发的，这些观念在内容上已经反映了这些经济关系，所以，归根到底这些观念是受经济关系制约的。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由什么正义观念所决定的，而是受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制约的。为了进一步阐明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等著作中，专门探讨了道德、法律、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的起源问题。他指出，进步、自由、正义、祖国等等思想也和数学上的公理一样，不是存在于经验的领域之外；它们不是在经验之前就存在了，而是跟随经验才有的；它们不产生历史事件，相反，它们本身是社会现象的结果，社会现象在发展中创造、改变和消灭它们。正因为思想是在社会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才成为积极的力量。离开社会环境（即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任意夸大思想的作用，就必然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拉法格探讨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他指出，历史上尽管有种种曲折、停滞和倒退，似乎偶然性在支配一切，但整个说来，在这些现象后面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历史总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过去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没有发现这些规律，是因为他们陷入唯心主义幻想的迷团。拉法格认为，这些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要研究人和社会存在的客观物质条件，只要我们循此方向努力，就一定能发现这些规律。

拉法格在批判唯心史观时，非常强调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和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但并不否认人的活动的意义。他指出，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使人脱出唯灵论者的宿命论的麻木状态。他特别强调指出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工人

阶级能够认识社会规律，能够控制和利用经济力量。他深信马克思主义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就能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的革命力量。

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拉法格也有许多阐述。这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在理论上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如早期著作中的教条主义毛病、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问题不够重视，等等。我们在研读拉法格的著作时，也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一方面。

第四节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43——1904年)是意大利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出生在意大利中部卡西诺城一个教师家庭，学生时代政治上倾向于民主主义，哲学上则是那不勒斯黑格尔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贝特兰多·斯巴芬达的学生，受过严格的黑格尔主义的教育。1862年，当他还不满十九岁时，就写了一部反对新康德主义、捍卫黑格尔辩证法的著作。1871年，拉布里奥拉成为那不勒斯大学的副教授，从1874年起担任罗马大学教育学和伦理学教授，直到逝世。

拉布里奥拉从八十年代中期起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直到九十年代初才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这同意大利的历史环境有关。意大利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很不充分的，封建制度的残余还相当严重，工人运动还没有发展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直到八十年代才开始在意大利出版发行。1892年，当意大利社会党成立时，它的指导思想仍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影响。这样一种情况直接影响了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在拉布里奥拉的世界观转变过程中，费尔巴哈和另一位德国哲学家赫尔巴特的著作曾经产生过作用，但是他实现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原因是他结合意大利的社会生活状况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和恩格斯的直接通讯。拉布里奥拉认识到，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必须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他为了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时期发表的著作，几乎寻遍了整个欧洲。而同恩格斯长达五年的频繁通讯，则帮助他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拉布里奥拉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为在意大利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许多工作。从1895年至1898年，他撰写了他的最主要的著作《唯物主义历史观概论》。这部著作包括四个部分：《纪念共产党宣言》（1895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1896年）、《社会主义和哲学丛谈》（1897年）、《从一个世纪跨入另一个世纪》，最后这部分没有写完，只写了前五章。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对拉布里奥拉这一著作的评价很高，认为是一部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卓越的著作。

拉布里奥拉这部著作的各个部分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但贯穿始终的是对唯物史观的阐述。在第一部分《纪念共产党宣言》中，拉布里奥拉精辟地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系，他说：“这一著作（指《共产党宣言》——引者）的中枢、实质和决定性特点完全贯串着新的历史观。它赋予这一著作以生气，并在这一著作中部分地得到了阐明和发挥。由于有了这一历史观，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希望，一种思念，一种回忆，一种猜想，一种出路，它第一次恰当地表现为意识到它的必然性，也就是意识到它是结束或解决当前阶级斗争的办法。”^①由于有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才由空想变为科学，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学说都可以归结为这种历史观。

^①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在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中，拉布里奥拉专门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进行探讨。他考察了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前提，他强调指出“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①，唯物史观不是两位创始人个人的、可以商榷的意见，而是一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科学发展的伟大成果。他认为恩格斯把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同发现能量守恒定律相类比是非常恰当的。

拉布里奥拉这一著作的突出贡献是通过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因素论，深刻地阐明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和社会的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社会机体不同层次的思想。他指出人类社会存在着与生物界不同的规律，探求这些规律，必须认识人类生存的条件和人类社会生活方式所包含的矛盾和必然性；他坚决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生物界的规律来说明人和人类历史的起源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他是第一个批判了当时非常流行的历史因素论的折中主义性质。他指出，这种因素论成为一种“半教条”，被某些历史学家一再提出来作为反对唯物史观一元论的决定性论据，而一些自称拥护唯物史观的人也相信它能够消除一切困难。因此拉布里奥拉把批判因素论看成是维护唯物史观理论基础的大事情。他指出，因素论者把人类历史看作许多孤立的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是完全错误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各种因素处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这些因素无疑会影响历史的发展，但是，成为其余一切的基石并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是经济基础，因此，必须抛弃这种因素论而坚持唯物史观的严格的一元论原则。拉布里奥拉还进一步分析了产生因素论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

但是，拉布里奥拉也不同意那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他指出，如果以为我们当作我们总的历史观基础的非常明确的

^①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90页。

一元论原则可以象护身符那样，总是明显地作为把庞大复杂的社会机体分解为简单的构成部分的绝对正确的手段，那是不正确的。他说：“经济结构作为其余一切东西的基础并对它们起决定性的作用，不是直接地和似乎自动地产生制度、法律、习俗、思想、感情和各种意识形态形式的简单机体。从这个基础向其余一切过渡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有时是微妙的和曲折的，不是总能够被揭示出来。”^①

在拉布里奥拉看来，社会是一个由多层次构成的复杂的机体，考察一定社会的内在结构，必须坚持辩证的观点。在这一结构中，经济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由这一基础决定的。但这一决定作用不是直接的、自动地实现的。拉布里奥拉分析了上层建筑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并根据它们相对独立性的不同程度，把它们分为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产物。阶级、法律、国家、道德属第一级的产物，而艺术、宗教、科学属第二级的产物，离经济基础更远。因此，拉布里奥拉强调指出，我们的学说不是要把历史发展的整个复杂的进程归结为经济范畴，而是要从构成历史事实的基础的经济结构出发去解释每一个历史事实。这样，拉布里奥拉在反对折中主义的因素论、坚持经济关系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揭示了社会机体的复杂结构和历史过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从而同“经济唯物主义”的机械论观点划清了界线。

为了进一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拉布里奥拉具体地考察了阶级、国家和法律、道德、科学等意识形态的起源和作用问题。他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国家的产生是直接地同阶级斗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的作用就在于用暴力或暴力系统

^①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88页。

对付被统治者的反抗，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考察各种意识形态的起源时，拉布里奥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他着重阐述科学的起源和作用。他指出，科学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科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科学不仅推动生产的发展，而且驱除黑暗和迷信，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的力量。

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中，拉布里奥拉最重视历史唯物主义。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实践哲学”，强调在实际斗争中的运用。认为把唯物史观应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必然会得出历史辩证法的结论。他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发展趋势以后指出，共产主义生产阶段的到来，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目标，而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

拉布里奥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为宣传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很大的贡献，但也有些比较严重的错误。特别是他于1902年发表的支持意大利政府的殖民扩张政策的言论，影响很坏。他把世界上的民族错误地划分为积极民族和消极民族，为所谓积极民族统治消极民族辩护，表现了露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哲学上，他认为人类的认识无法达到客观世界的某些领域，向不可知论作了让步。尽管拉布里奥拉有这种种错误，他的功绩还是主要的，应该充分肯定他在国际共运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本章阅读书目：

约瑟夫·狄慈根：《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

弗兰茨·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

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取得政权的道路》。

保尔·法拉格：《思想起源论》、《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

安东尼奥·布拉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俄国的传播和列宁 哲学思想的形成

(1883—1903年)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和他的战友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回答了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①。列宁的哲学思想是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续和发展。

第一节 十九世纪末俄国革命运动的 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历史阶段。自从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地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在这个阶段上，生产社会化的程度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85页。

越来越高，但生产资料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的说来，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帝国主义的这些矛盾，使资产阶级日趋没落和反动，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革命日益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同时，被压迫国家的人民的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进一步动摇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造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为无产阶级冲击资产阶级造成良好的条件。“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①。

在这种历史转折的关头，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在政治上鼓吹改良主义的策略路线，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修正。尤其在哲学方面，他们妄图以新康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现象。

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新的理论任务，这就是：总结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经验，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哲学，从各个方面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适应时代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高涨

在欧洲，俄国本来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自1861年农奴制度被废除以后，资本主义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十九世纪末，俄国的资本主义也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是，俄国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有所不同，它是垄断资本主义同封建农奴制残余的结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37页。

合，沙皇专制制度是它在政治上的支柱，所以列宁称之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在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身受沉重的剥削和奴役；各族人民受沙皇政府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残酷压迫，沙俄是各民族的监狱；同时，沙俄帝国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相勾结，向外扩张、侵略，尤其是对东方各国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引起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的强烈反抗。各种矛盾交错在一起，使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成为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焦点，也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也逐渐地成长起来。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开始觉醒，向资本主义和专制制度展开斗争。到了九十年代，现代工业工人的人数已增加到二百八十万左右，各地的工人组织也相继诞生，1875年在敖德萨成立了“南俄工人协会”，1878年在彼得堡成立了“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工人运动逐渐高涨。农民暴动和学生运动也不断发生，俄国正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

三、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开始传入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民粹派中的一些先进人士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曾与马克思、恩格斯发生过通讯联系，并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1869年《共产党宣言》俄译本第一次在俄国秘密出版。随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著作先后译成俄文出版。但是，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革命的民粹派的理论家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尚未能在俄国发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这一时期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广泛传播的前奏。

直到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创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才开始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列宁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个侨民团体（“劳动解放社”）的著作中产生的。”^①随后在国内也诞生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广泛传播开来。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一道把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成俄文，传播到俄国，并结合俄国的现实问题，写出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列宁指出：“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指十九世纪四十至九十年代——引者注）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雄气概、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经过检验，参照欧洲经验，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②

第二节 普列汉诺夫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贡献

一、从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出生于一个小贵族的家庭。在学生时代，他崇敬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具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想。从1875年开始，他参加了秘密的革命组织民粹派的小组活动。1876年参加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社，后来成为《土地与自由》杂志的编辑，积极参加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宣传工作，为民粹主义的刊物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36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2页。

撰写传单和文章,并曾两次“到民间去”宣传民粹派的主张。在此期间,普列汉诺夫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到彼得堡的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对工人运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这些研究和活动促使他对民粹派的观点发生怀疑和向马克思主义接近。1879年民粹派组织发生分裂,一部分成员主张采取个人恐怖的策略,组成“民意党”;另一部分人组成“土地平分社”,普列汉诺夫是“土地平分社”的领导人,他们不赞成个人恐怖策略。“民意党”人的暗杀活动失败后,沙皇政府对革命活动进行疯狂镇压,革命者遭到迫害。1880年普列汉诺夫和一些“土地平分社”的成员,被迫离开俄国到了西欧,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七年之久的政治侨民生活。

普列汉诺夫在侨居国外的初期,经常参加当地的工人活动,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其他革命文献,对过去从事的活动和所信仰的理论,作了回顾和检讨,决心与民粹主义决裂。他说:“在国外,只是对我们在俄国所做的事和所知道的东西作一个总结”^①。1882年,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并写了序言。1883年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巴·波·阿克雪里罗德、维·伊·查苏里奇、列·格·捷依奇、华·尼·伊格纳托夫等人,在日内瓦组成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同年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列宁称这部著作作为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普列汉诺夫在批判民粹派的斗争中

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要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清除民粹主义的影响。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4卷,第92页。

民粹派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派别，唯心史观是他们的理论基础。和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俄国民粹派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民粹派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中起过一定的作用，八十年代民粹派起了分化，九十年代以后民粹派已完全丧失了革命性。他们用主观社会学即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来对抗历史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同他们展开激烈的论战，写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一批著作，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首先，普列汉诺夫深入探讨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民粹派的理论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普列汉诺夫系统研究了历史哲学的发展史，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继承性与变革性的统一，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普列汉诺夫认为，作为一个完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以前是不存在的，但是作为唯物史观的萌芽则古已有之。特别是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黑格尔等人的历史观中，都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但他们都未能走出唯心史观的迷宫，只有马克思才引导历史哲学走出迷宫，到达真理的殿堂。“马克思的名字是和新的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的”^①。

第二，普列汉诺夫系统地阐明了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再强调，“社会历史过程的基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②。民粹派和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有时也承认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他们认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是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又是依靠人的智慧所创造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文学遗著》俄文版第3卷，第43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19页。

和使用的，所以人的智慧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力量，成为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归根到底是理性决定一切。普列汉诺夫为了杜绝他们的后路，彻底批判他们的唯心史观，指出历史运动的原因不在人的天性而在人之外，是在人对自然的作用、在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人的智慧也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周围的地理环境。他批判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说明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指出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而影响社会发展的具体途径，阐明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受生产力发展程度制约的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环境学说。

第三，普列汉诺夫具体分析了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是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基本观点，对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和社会结构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概括，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论”即“五项要素”的公式。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已包含了“五项要素”的观点，后来，在1907年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明确提出，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可以简短地概括出下面几点：“（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①根据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述，“五项要素”可作这样的理解：就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而言，前三项属于社会存在，后两项属于社会意识；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则前两项属于经济基础，后三项属于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95页。

上层建筑。就是说，社会存在包括的内容是很广泛的，最基本的要素有三项，即生产力、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制度。普列汉诺夫对三者及其相互关系作了具体说明，对它们如何决定社会意识的问题也作了充分的论证。生产力决定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它们共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政治制度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属于上层建筑，但相对于社会意识而言，又属于社会存在。因为它具有社会生活本质的属性，对社会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

第四，普列汉诺夫深入研究了社会意识的基本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明确地把社会意识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种基本形态，又把思想体系(或译作意识形态)分为低级的意识形态(如政治理论、法权思想等)和高级的意识形态(包括哲学、艺术、宗教等观点)，并具体阐明了社会心理与各种思想体系的相互关系，阐明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心理通常是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是没有经过理论加工和系统概括的日常意识，是一定时期特定的民族、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中普遍流行的精神状态。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被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所决定的，但对于比它更高一层的社会意识即思想体系来说，又是后者的根源，在一定意义上说，思想体系是社会心理的反映，是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加工概括而成的，它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间接地反映社会存在。但是，思想体系对于社会心理又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并通过社会心理，实现对社会经济的反作用。

普列汉诺夫还论证了思想体系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原理。他认为，思想体系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原因不仅在于思想体系并非直接从经济基础中生长起来，而且在于各种思想体

系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任何思想体系，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总是与以前时代的意识形态存在着批判继承关系，又与同一时代的其他思想、观念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着的。因此，思想体系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论述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更加具体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第五，普列汉诺夫科学地阐述了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既批判了民粹派夸大个人作用否认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主观唯心论，又反对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历史宿命论。民粹派的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年)把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的主观唯心论移植到俄国，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普列汉诺夫对此作了深刻的批判。他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出发，论证了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不是个人的意志，而是受生产力所制约的社会关系。他说：“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中的)就是人的关系；没有人的参加，没有大多数人即群众的参加，人类的历史要向前迈进一大步也是不可能。”^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这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汉诺夫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说明了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规律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关系问题。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是历史运动的一般原因。所谓偶然性就是历史发展中的个人因素，如个人的知识、才能、性格、品德等因素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历史发展的个别原因。必然性制约着偶然性，个人因素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个人因素的偶然性不是消极被动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它会在诸必然性的交叉点上出现，给社会的命运、社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34—235页。

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理论批判了民粹主义，扫清了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障碍，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工人运动逐渐结合起来，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普列汉诺夫在国际上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

普列汉诺夫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国际上，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的时候，他就以俄国社会主义者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与各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保持着联系，并到伦敦拜会过恩格斯。从1900年起被选为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主要领导人，积极参加国际的活动，逐渐成为第二国际的杰出的活动家和著名的理论家。正当国际上修正主义开始泛滥，新康德主义逐渐蔓延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在国际舞台上第一个举起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旗帜，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刊物上，第一个发表批判新康德主义的文章《伯恩斯坦与唯物主义》(1898年)。普列汉诺夫在理论斗争中，特别是在批判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①。

首先，普列汉诺夫是一位战斗的唯物主义者。他根据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研究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历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为武器，批判各种唯心主义。为了批判新康德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对物质概念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说，“我们所说的与‘精神’相对立的‘物质’是指的在对我们的感官起作用时，引起我们的这些或那些感觉的东西。”“物质不是别的，而是一些自在之物的总和，因为这些物是我们的感觉的源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65页。

泉。”^①在这个解释中，普列汉诺夫既肯定康德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也指出了康德否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暴露了康德哲学的不彻底性，从而揭露了施米特、伯恩施坦等人企图以康德哲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动性，戳穿了他们抛弃康德哲学的唯物主义因素，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实质。普列汉诺夫的解释还表明，物质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存在。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不是指具体的实物，而是指“自在之物”的总和。这些观点，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后来在批判马赫主义的斗争中，普列汉诺夫又具体地发挥了这些思想，这是对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的具体发挥。

第二，普列汉诺夫在捍卫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面，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人的感觉来源于客观的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他维护了恩格斯关于实验和工业是对不可知论的最有力的驳斥的观点，阐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多次地引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明“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在认识论方面，普列汉诺夫也有一些不确切的表述，例如他曾把人的感觉比喻为象形文字。1892年普列汉诺夫在《费尔巴哈论》注释中写道：“我们的感觉是把现实界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的特种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不同于它们所传达的那些事件。但是，它们能够完全正确地传达事件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后者是主要的）。”^②这里，他在强调感觉能够完全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同时，强调感觉与被感觉的对象是不等同的，这对于反击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观点是有意义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02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60页。

但是，把感觉比喻为“象形文字”却容易使人产生错觉，把象形文字论等同于唯心主义符号论和不可知论。后来，普列汉诺夫意识到这个不恰切的表述所带来的种种不便，于是公开声明放弃“象形文字”的术语，可见，他对理论问题的态度是严肃的。

第三，普列汉诺夫热情地宣传了革命的辩证法。他经常引赫尔岑关于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的话，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一切方法中最革命的方法。他考察并说明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对辩证法的“矛盾逻辑”作了具体的论证和运用。针对庸俗进化论否认飞跃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否认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的错误，普列汉诺夫充分地论证了量变质变的规律，指出“一个一定的内容的渐进的量的变化，最后要突然激起质的变化”。“不论在自然界、在人的思想和历史中，飞跃都是不可避免的。”^①同时指出事物发生量变和质变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的自我扬弃。他还精辟地阐明了经济进化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批判了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路线。指出伯恩施坦之所以抛弃唯物辩证法就是因为他害怕辩证法的革命本质。在批判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家把辩证法归结为“三段式”时，普列汉诺夫捍卫了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对否定之否定规律作了具体的说明，并运用这一规律研究了俄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道路。普列汉诺夫还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如自由与必然、必然性与偶然性、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一般与个别等都作了具体的阐述和运用。

在政治上，普列汉诺夫一生走过曲折的道路。1903年以后，他与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逐渐转向孟什维克一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但在理论上，他不仅为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43页；第1卷，第497页。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哲学史、唯物史观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普列汉诺夫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之间的桥梁。列宁指出：“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①

第三节 列宁在反对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派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于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诞生于辛比尔斯克城，父亲任国民教育视察员，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列宁从学生时代起就同情工农的悲惨遭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888年，他在喀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认真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1889年列宁移居萨马拉，开始了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这时，他一方面和先进工人一起钻研和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另一方面着手研究俄国的经济状况，特别是深入农村收集关于农民的资料。他还十分注意阅读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和“劳动解放社”的秘密出版物。1893年，列宁来到了当时俄国经济政治中心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彼得堡，这时他已经是一个热诚投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了。1895年列宁把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时又亲自出国，同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劳动解放社”取得直接的联系，为在俄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一、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丰富 和发展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

列宁走上政治舞台时，正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建立工人阶级新型政党和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的时期。当时围绕着俄国的社会性质，改造俄国社会的革命道路和力量等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主义者展开激烈的论战。民粹派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否认无产阶级是俄国革命的社会力量。因此，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反对唯物史观。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成“经济唯物主义”而加以攻击。米海洛夫斯基说：“事物的历史进程的实质根本不可捉摸，经济唯物主义学说也没有把它捉摸住，虽然这个学说看来依靠两个基石，一个是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具有决定一切意义的发现，一个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经济唯物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①他们妄图推翻马克思的学说的这两块基石。列宁在1894年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着重对民粹主义的上述观点展开深入的批判。列宁指出，米海洛夫斯基“想要打破的学说第一是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二是依据辩证方法的。”^②列宁通过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丰富和发展了历史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

第一，批判民粹派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攻击，阐明物质关系决定思想关系的原理。

民粹派的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鼓吹以“人类天性”为出发点的主观社会学，认为人的主观意志是决定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力

①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1卷，第30、28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47页。

量，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从而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列宁深刻地批判了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他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概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作了具体的发挥。列宁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关系是人们维持生存的活动的形式(结果)。”^①就是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结成了各种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和思想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在研究历史发展规律时，必须贯彻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抓住社会生活中的主要方面，“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②，又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社会关系的各种层次及其关系，才能发现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才能发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列宁还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但它并不否认其他社会关系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③列宁还强调指出，马克思“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④。

第二，批判民粹派对历史辩证法的攻击，揭示俄国社会革命

①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18、6页。

③ 同上书，第9页。

④ 同上书，第10页。

的发展规律。

米海洛夫斯基要推翻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另一块基石是历史辩证法。他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历史看作是偶然事件的堆积，是个人意志的产物，历史的进程是根本不可捉摸的。民粹派还从主观愿望出发，把小生产者理想化，把小农经济看作是永恒不变的，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通过农民村社走向社会主义。列宁指出，他们的方法是“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②。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与此相反，它把社会运动看作是服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按照长官的意志、政府的意志可以随便改变的。只有研究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才能发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米海洛夫斯基还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是套用黑格尔的三段式而推论出来的。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根本不同的。在黑格尔看来，观念发展的三段式决定现实的发展，而在马克思那里，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物质的东西的反映，辩证法不是单纯的证明工具。马克思只是在探索和研究了现实过程，作出了历史的经济的证明之后，才指出这是按辩证规律进行的过程。这就驳斥了民粹派的攻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还根据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说明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农民村社基础上只是空想。他还分析了俄国的社会阶级结构，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把希望放在无产阶级身上，他们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

第三，批判民粹派“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阐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民粹派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史观出发，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断言“英雄”创造历史，突出“有批判头脑的个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11页。

人”的作用，宣扬唯意志论和实行个人恐怖的策略。列宁批判了他们的荒谬观点，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个人的活动是受历史的必然性制约的，同时也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是通过个人的活动来实现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又是一致的，尊重历史的必然性就必须尊重群众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个人的作用。“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①问题是：要使这些社会活动得到成功，就必须吸引群众参加，才不致使个人的活动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汪洋大海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对社会的现实作深入的分析，才能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列宁认为，“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②在俄国，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造成实现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俄国工人阶级一旦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群众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列宁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论述，有力地驳斥了民粹派的英雄史观，并为正确地解决俄国社会改造的主要力量问题提供了理论根据。

二、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主义，揭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列宁在反对民粹主义的同时，也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民粹主义斗争中的同路人。他们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哲学上是新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

^② 同上书，第78页。

康德主义的拥护者。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于俄国的情况下，这些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宣扬他们的思想。由于这些人常在合法的、即经沙皇政府准许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因此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司徒卢威(1870——1944年)等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1894年司徒卢威出版了他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批判民粹派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指出民粹派保护小农、对抗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性，宣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为了批判民粹派，列宁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建立过某种暂时的联盟，但列宁一刻也没有忘记批判他们的自由资产阶级观点。1895年，列宁发表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书，从哲学上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

司徒卢威根据新康德主义的先验论，把资本主义生产说成是一些抽象的范畴的永恒体现，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抽象地描述为以私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经过辩证的发展走向社会化的过程，完全撇开剩余价值、危机等具体表现资本主义阶级对抗的东西，闭口不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大谈“历史过程的必然性”，但只承认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而否认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他用抽象的议论来代替具体的分析，用超阶级的观点来抹煞阶级对抗的历史事实。列宁从哲学上把这种观点概括为客观主义，实质上是主观唯心主义。

列宁指出，司徒卢威的客观主义决不是唯物主义。客观主义只说明社会(如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它貌似客观，实际上它在证明资本主义现有事实的必然性时，站到为这些事实作辩护的立场上，抹煞资本主义的对抗性质及阶级斗争，否认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把它看作是永恒存在的。这正是资产阶

级主观主义的表现。而唯物主义在对待社会问题时，不仅分析事物存在的客观性，而且揭示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不仅指出现存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而且揭示现存事物灭亡的必然性，这才是对事物的真正的客观态度。“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①

列宁在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时，还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党性与科学性相一致的原则。“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②由于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它的根本利益是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相一致的，因此，只有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立场上，才能彻底坚持唯物主义。无产阶级党性是真正科学性的必要条件，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品质。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③。

列宁特别强调，司徒卢威的客观主义实质上是新康德主义，提出要认真对付新康德主义。当列宁读了普列汉诺夫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反对伯恩施坦和施米特的新康德主义的文章时，感到非常满意，表示坚决地站在普列汉诺夫一边，而对他没有及时批判司徒卢威的新康德主义表示惊异。后来普列汉诺夫在列宁的催促下，写了一组批判司徒卢威的新康德主义的文章，总标题是《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发表在列宁主编的《曙光》杂志上。

^{①②} 《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81页。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批判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高涨的先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写作活动是无产阶级发动的斗争，即1896年举行的有名的彼得堡罢工的直接序幕。这些罢工为我们整个革命中最强大的因素即后来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开辟了新纪元。”^①

三、批判经济派的“自发论”，具体阐明 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主义斗争的胜利，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建立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但是，这仅仅是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一个政党的尝试，实际上没有真正达到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没有统一的党纲和党章，加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不久便遭破坏，列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批富有经验的革命家被关进监狱，一些新加入革命组织的青年缺乏理论修养，党内由于受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思想混乱状况更加严重。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一个新的机会主义派别即经济派。他们宣扬经济主义观点，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政治斗争、革命理论和革命政党的作用。这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严重地影响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1900年列宁从流放地回来后，立即创办《火星报》，开展对经济派的批判，为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02年列宁写了《怎么办？》一书，对经济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具体地阐明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进一步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751页。

第一，批判经济派的改良主义路线，阐明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辩证关系。

经济派崇拜经济斗争，轻视政治斗争，提出了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他们说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贵”^①。这种以暂时改善一下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为满足，不鼓动工人从政治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是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的改良主义路线的翻版。

列宁严厉地批判经济派的这种错误观点，论述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辩证关系。他明确地指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两种形式。所谓经济斗争就是工人为暂时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例如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等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可以唤起工人群众的觉醒，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必要的斗争形式，但只靠这种斗争不能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根本的经济利益。“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一种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②这是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著名论断的具体发挥。

经济派为了证明“经济斗争有首要意义”的错误结论，提出“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的论断。这就由两种斗争形式的关系问题扩展到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加以歪曲和庸俗

①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1卷，第252、253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5页。

化。列宁在批判他们时，进一步阐明了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列宁说：“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当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主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利益，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无产阶级要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列宁阐明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提供了哲学论证，大大提高了俄国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自觉性。

第二，批判经济派的自发论，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是改良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他们鼓吹不要革命理论指导的“纯粹工人运动”，“反对任何非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鼓吹让工人运动自发形成、自流发展，否认工人阶级自觉斗争的意义。列宁在批判经济派的自发论时，论述了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列宁首先肯定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理论来源于实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的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只能形成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62页。

思想体系。”^①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离开工人运动，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所以这种理论容易为工人所领会和接受。但是，工人运动的经验本身还不是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从工人运动中自发形成。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是一个能动的反映过程，从经验到理论是能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是由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一些“非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总结科学发展的成果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果。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巨大的反作用，只有在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工人运动才能成为革命的运动。在阐述这一思想时，列宁发挥了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中提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②的著名论断。他根据国际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指出必须用革命理论来武装工人运动。他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③因此，必须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给工人，才能使工人运动由自发的斗争发展为自觉的斗争。

第三，批判经济派的组织路线，论述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经济派的自发论不仅表现在政治路线上的改良主义，和在思想路线上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还表现在组织路线上，崇拜狭隘落后的手工业方式。他们主张组织涣散，放任自流，反对建立全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98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242页。

俄集中的秘密的革命家组织，否认革命政党的作用。这是经济派否认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的又一表现。列宁指出，“他们不仅对于我们的政治任务，而且对于我们的组织任务也持着狭隘的见解”，是“在理论、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缺乏修养和眼光狭小的表现”^①。列宁根据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原理，通过批评经济派的自发论，论述了革命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列宁指出，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克服分散落后、各自为政的状态，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政党，特别是要建立集中的秘密的革命组织。“我们最迫切的首要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固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在俄国目前这样的历史关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②。因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够担当起向工人阶级灌输革命理论、把工人阶级所进行的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的任务，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经济派还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煽动工人“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列宁批判了这种蛊惑人心的论调，深刻阐明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③列宁的这些论述，深化了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原理，发展了唯物史观。

总之，从1894年到1903年，列宁批判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以及经济派的理论斗争，有力地清除了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俄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311、314页。

② 同上书，第316—317、337页。

③ 同上书，第332页。

国广泛传播的反动理论思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并且在许多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为俄国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形成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这是列宁的理论斗争的成果的集中表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出现，标志着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诞生，也标志着列宁哲学思想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本章阅读书目：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列宁：《怎么办？》（第二、三章）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五章“现代唯物主义”）。

第六章 列宁在1905年革命 前后对辩证唯物主 义认识论的发展

(1903—1914年)

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产阶级哲学、修正主义哲学在认识论领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国际工人运动的逐渐高涨，资产阶级理论家在认识论领域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也由于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在西欧和俄国出现了一些从认识论上宣传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俄国1905年革命前后，这一斗争特别激烈。这个时期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著述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他的哲学巨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第一节 俄国1905年革命和认识论问题

一、俄国1905年革命前后的党内斗争突出了认识论问题

俄国1905年革命前后围绕着策略路线上的问题，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发生尖锐的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俄国人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不断发展，工人罢工的浪潮此起彼伏。这时候，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认

识论去分析形势，制定正确的策略，是十分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布尔什维克认为革命应由无产阶级领导，工农结成联盟，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孟什维克则主张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反对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主张用和平方式进行改良，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两种策略分歧的根本点是能否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这是两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分歧的表现。布尔什维克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具体地分析了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特点，科学地认识了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俄国的阶级关系，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孟什维克则固守第二国际的旧教条，无视时代特点及俄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看不到俄国工农革命力量的壮大和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因而，它们的策略路线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认识路线的表现。

1905年革命在沙皇政府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以后，革命进入了低潮。这时，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提出退却的策略，主张把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以便积蓄力量，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孟什维克则主张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取消党的秘密组织，建立一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党，成为取消党、取消革命的取消派。而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些人则以“左”的面目出现，反对利用合法斗争，主张召回党在国家杜马(议会)中的代表，召回一切合法组织中的党员，使党同群众隔离开来，放弃对群众的教育和领导，成为召回派。召回派实际上是变相的取消派。在退却问题上的两种策略的斗争实质上也是两种世界观斗争的表现。

革命失败以后，沙皇政府的御用文人配合沙皇对革命人民的血腥镇压，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无产阶级展开进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讨伐”与“围剿”。革命队伍内的不坚定分子企图从资产阶级的时髦哲学中找寻精神上的寄托，唯心主义哲学逐渐泛滥。这种

种因素的作用，使哲学上的斗争，认识论领域的斗争上升到首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消化”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为了批判各种反动的哲学思潮，列宁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和运用。

二、1905年革命失败后马赫主义在俄国的泛滥

马赫主义又称经验批判主义，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比较流行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是资产阶级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创始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1838—1916年)和德国哲学家阿芬那留斯(1843—1896年)。他们把经验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声称对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经验要进行彻底的清洗，并生造一些独特的术语，宣扬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他们还宣称自己的哲学是自然科学的哲学，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中立哲学。马赫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虽属不同的哲学流派，但它们本来就有血缘关系。马赫本人供认，他早年受康德哲学影响，后来回到贝克莱和休谟那里去了。因为他“对认识论问题的醉心和兴趣，他转向以自己的感官作试验”，从而得出结论，“物理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我们感官的各种感受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①。由于马赫主义打着“科学”和“中立”的旗号，蛊惑了一些人，特别在自然科学家中有较大的影响。

马赫主义在俄国也曾经风靡一时，并产生了以波格丹诺夫为主要代表的俄国马赫主义。波格丹诺夫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常务局委员，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的编委，召回派的首领。在哲学上他最早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在1899年出版的《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中，他受了唯能论者的影响，对唯物主义开始动摇，并通过唯能论逐渐转向马赫主义。1904年他的《经验一元

^① 马赫为《感觉的分析》1907年莫斯科俄文版写的序言。

论》(第一卷)和《社会心理学》的出版,说明他已经抛弃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完全陷入马赫主义的泥潭。1904年俄国另一名马赫主义者卢那察尔斯基也写了《通俗说明“纯粹经验批判”》一书,把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批判》一书介绍给俄国读者。声称要“打破《批判》一书论述的坚硬外壳,让读者看到论述中所包含的闪闪发光的内核”。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俄国是一片白色恐怖,革命队伍中一些动摇变节分子和对前途感到悲观失望的人,想从马赫主义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加剧了这种思潮的泛滥。在1908年不到半年的时间,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就出版了四本书,来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妄图用所谓“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入马赫主义队伍的不仅有布尔什维克的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也有孟什维克的瓦连廷诺夫和尤什凯维奇,还有社会革命党的切尔诺夫。他们已打破党派的界线,结成伙伴,共同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攻。而对这一严重的情况,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奋起反击,批判马赫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说“‘马赫主义’是波格丹诺夫修正过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这种哲学是孟什维克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布尔什维克弗·伊林坚决反对的。”^①孟什维克的普列汉诺夫和布尔什维克的列宁在哲学战线上,在批判马赫主义中,在不同的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普列汉诺夫在批判马赫主义中的贡献和缺陷

普列汉诺夫公开批判马赫主义时,政治上已站到孟什维克方面,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他是错误的;但在哲学理论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了马赫主义和其他修正主义哲学。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普列汉诺夫的“策略是极其庸俗卑劣的。但在哲学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494页。

方面他捍卫的是正确的东西。”^①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普列汉诺夫就已经注意到波格丹诺夫哲学思想的错误倾向。后来他在和列宁一起工作时，曾多次谈到这一点。当时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波格丹诺夫追随唯能论者和马赫而犯的错误，还没有严重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因而，还打算争取他作为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同盟者，没有公开批判他。后来，波格丹诺夫在马赫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普列汉诺夫意识到这已无法挽回，就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公开地评击马赫主义。例如，1905年7月写的《费尔巴哈论》俄译本二版译者序言，1907年写的《约瑟夫·狄慈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著作，都指出了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1907年，波格丹诺夫在《生活通报》第七期上，发表了《一封给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公开信》，挑起公开的论战。1908——1909年，普列汉诺夫写了《战斗唯物主义》（答波格丹诺夫先生的三封信），对马赫主义及其俄国的信徒作了深刻的批判，捍卫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说，普列汉诺夫“在马赫主义盛行时同马赫主义者的斗争有巨大的功绩”^②。

针对马赫认为“物是感觉的复合”的论点，普列汉诺夫运用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批判了马赫主义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他指出：“物质的对象（物体），就是那些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唤起我们一定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反过来又成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即关于这些物质对象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观念的基础。”^③在这里，普列汉诺夫说明了物质的客观性和可知性，说明了物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物质是感觉的源泉，感觉来源于客观的物质对象，又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8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67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50页。

是人的认识的起点，是观念的基础。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感觉论。他还指出马赫的感觉论是十八世纪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的感觉论的翻版。

普列汉诺夫还揭露和批判了马赫主义的不可知论，论证了物质世界的可知性。他说：“除了通过物体所给予我们的那些印象而得到的知识以外，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知识的。……这完全不等于说我是在宣布物质是某种‘不可知的’和不可认识的东西。相反，这是说，第一，它是可以认识的；第二，人类认识它的程度取决于人类通过在其动物生存和历史生存的长期过程中由人类得到的印象而熟悉它的各种属性的程度。”^①普列汉诺夫的论述指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在感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说明了人通过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等实践活动，认识客观事物的各种属性。他始终强调人的知识来源于感觉，而感觉来源于客观事物，物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他还指出波格丹诺夫否认“物质是我们感觉的来源”，否认感觉以外事物的可知性，“完全为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成见所浸透了”^②。

普列汉诺夫批判马赫主义的态度是坚决的，观点是鲜明的，他捍卫和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是，他在批判马赫主义中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一个是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未能作出哲学上的总结和概括。普列汉诺夫对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和“物理学危机”的出现等重大问题未作深入的研究，未能揭露马赫主义与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联系。因此，在批判马赫主义中，停留在一般地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阐明的原理的水平上，未能给哲学理论增加新的内容，在理论上没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另一个缺陷是不善于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57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56页。

虽然他也说过，“如果没有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不充实的、片面的，甚至是不可能存在的”^①。但实际上，他在批判马赫主义中未能在认识论上把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在感觉问题上，比较强调感觉来源于客观世界，但没有充分论证感觉的起源。在真理问题上，他强调真理的客观性，但未能阐明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关系。关于实践的观点，他也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但没有指出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等等。

普列汉诺夫批判马赫主义的贡献是巨大的，但由于他在哲学理论上存在严重的缺陷，加上政治上受孟什维克倾向的局限，所以未能彻底战胜马赫主义。列宁说：“普列汉诺夫反对他们实质上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不会或者不想或者懒于具体地、细致地、简明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而是用深奥的哲理来吓唬这些人。我无论如何要按自己的方式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②。因此，列宁重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著作，研究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主要著作以及俄国马赫主义者的著作，还研究了各种哲学流派的大量资料，利用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文献，在1908年2月至10月写成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彻底批判了马赫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达到了一个普列汉诺夫所未能达到的高度。

第二节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一、批判马赫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提出 两条基本哲学路线对立的原理

马赫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是：“物是感觉的复合”，以感觉作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8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95页。

为它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础。马赫认为，不是物体唤起感觉，而是感觉的复合组成物体。后来他又提出“要素”这一术语来代替感觉，宣称世界是由“要素”构成的。阿芬那留斯提出“原则同格”说，认为世界是由“自我”和“非我”构成的，自我是中心项，非我是对立项，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同格。列宁运用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揭露他们的伪装，指出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感觉和物质谁是第一性的，这是唯物主义与马赫主义的根本分歧。恩格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人的感觉、思想是第二性的。马赫关于物是感觉的复合的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是贝克莱的“物是观念的集合”的简单的重复。列宁指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路线。”^①从马赫主义的前提出发，认为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感觉，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必然要走向唯我论。列宁在这里明确提出两条基本哲学路线相对立的论断，是对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阵营的思想的具体发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对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物质和意识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的不同回答，把哲学家分成两大阵营。列宁从认识的出发点的对立，阐明两条基本的认识路线的对立，这是对恩格斯的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列宁还根据恩格斯的理论，在批判马赫主义的感觉论时，着重说明了感觉的起源和感觉的来源问题。关于感觉的起源，列宁指出：“明显的感觉只和物质的高级形式(有机物质)有联系，而‘在物质大厦本身的基础中’只能假定有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②感觉是物质发展的产物，无机物没有感觉，只有一种和感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0页。

觉相似的能力，感觉就是在无机物的反映属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就具体发挥了恩格斯关于精神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的思想。关于感觉的来源问题，列宁认为感觉是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的，是外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在认识论上有两个重要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感觉是我们认识的唯一源泉；第二个前提是，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的源泉。马赫主义承认第一个前提，但否认第二个前提。从感觉出发，可以遵循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也可以遵循主观主义路线走向唯我论。马赫主义者走的是后一条路线。列宁关于感觉的起源、感觉的发生、感觉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感觉的内容和本质等论述，具体论证了物质第一性，感觉第二性的原理，丰富和发展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

二、批判马赫主义的不可知论，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

马赫主义者从主观唯心主义的感觉论出发，宣扬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认为人的知识不超出感觉，在感觉范围以外还存在什么东西，是根本不能确定的，这是赤裸裸的不可知论。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为了宣扬不可知论，都极力把恩格斯歪曲成不可知论者，胡说恩格斯主张人的认识不能超出经验的界限，恩格斯所主张的“未被认识的东西”，不过是康德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这样一来，就把恩格斯混同于不可知论者，混淆了不可知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界限。列宁坚决地驳斥马赫主义的歪曲。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论述，指出恩格斯强调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是对不可知论的最有力的驳斥，这表明了恩格斯既反对休谟，又反对康德，他与不可知论者的明确界限是不容抹杀的。列宁还根据恩格斯关于人们从煤焦油中提炼茜素证明“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的论述，以及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对辩证唯物论的认

识论作了系统的概括，提出了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

“（一）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

“（二）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只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

“（三）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①

这三个重要结论，系统地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第一个结论是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承认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说明作为认识对象的物是不依赖于认识的主体，不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客观存在着的。这个结论划清了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界限。第二个结论说明世界是可以认识的，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世界上只存在着尚未认识的东西，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这个结论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不可知论的界限。第三个结论是认识论的辩证法，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这个结论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界限。这三个结论的基本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中已蕴含着，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中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说明，对辩证法与唯物论在认识论中的结合作了具体的阐述，这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且在实践上指导人们沿着正确的路线去发现和认识真理。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00页。

三、批判马赫主义的主观真理论 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论

真理问题是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既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也存在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波格丹诺夫妄图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真理论修正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他一方面歪曲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基本观点，声称马克思主义“否认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混淆了真理论中关于真理的客观性和关于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关系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妄图通过否定绝对真理来否定客观真理；另一方面又从马赫主义的“物是感觉的复合”这一基本前提出发，认为“真理是思想形式，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抽掉真理的客观内容，宣扬主观主义的真理论。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时首先明确地提出了关于真理的两个问题，指出：“（一）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二）如果有客观真理，那末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表象能否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现它，或者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现它？这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①能否正确回答第一个问题，关系到能否坚持唯物主义的真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划清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真理论的界限。能否正确地解决第二个问题，关系到能否坚持真理论的辩证法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决，划清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真理论的界限。列宁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概括了哲学史上关于真理问题争论的基本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重要贡献。

列宁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所谓客观真理即真理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21页。

客观性,就是指认识中具有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内容,人的认识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相符合就是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客观对象在人脑中的反映,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否认客观真理就是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波格丹诺夫把真理看作是“思想形式,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论。列宁对此作了深刻的批判。列宁指出,如果真理只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么天主教的教义也可以说是真理了,因为天主教也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波格丹诺夫也谈到所谓“客观性”,但他认为客观性就是“集体经验”,就是它的“普遍意义”。列宁认为,真理的标准不在于它是个人的经验还是集体的经验,而在于它是否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如果抽掉真理的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内容,就是对客观真理的否定,就是主观主义的真理论。

在关于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关系问题上,波格丹诺夫宣扬相对主义的真理论,否认真理的绝对性,攻击恩格斯既承认相对真理也承认绝对真理是“折衷主义”。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时,捍卫了恩格斯的思想,具体论述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列宁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相统一的论述,说明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它能够给人们提供绝对真理,但作为某一个时代和每一个人的认识能力又是有限的,只能给人们提供相对真理。绝对真理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人们认识真理的过程就是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日趋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①。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15页。

列宁进一步指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的区分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一方面真理作为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在它适用的界限内是绝对真理，这是确定的，只有坚持这点才能果断地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每一科学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随着科学的发展，真理的界限时而扩张，时而缩小，作为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界限不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区分是不确定的。只有树立这样的真理观，才不致于陷入思想僵化，才不致于把科学真理变成教条。

列宁还说明了辩证法和相对主义的区别与联系，划清了相对主义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界限。马赫主义以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否认任何绝对真理，陷入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辩证法在我们的认识受一定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因此，辩证法包含着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则是在否定认识的客观内容和客观标准的意义上承认知识的相对性，因而陷入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①

四、批判马赫主义的实践观，阐明 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

马赫主义者把实践排斥于认识论之外，宣称实践是一回事，认识论是另一回事，否认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和真理的标准。他们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前提下，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来迷惑读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36页。

者。马赫说，“认识是对生物机体有用的心理体验”，“只有成功才能把认识和谬误区分开来”^①。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天真地认为，马赫这些话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相接近。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的这些观点时，首先划清了马赫主义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客观实在，通过实践使人的认识与客观实在相符合，这种认识是成功的，因而是有用的。马赫认为，认识是心理体验，坚持了他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前提。他所讲的“成功”、“有用”是指满足个人需要的主观效用，不管它是否同客观对象相符合，以主观效用作为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根本不同的。“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离来考察的。”^②

列宁进一步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这是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先提出来的。恩格斯在1888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1892年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中都反复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指出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是对不可知论最有力的驳斥。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中发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③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一切唯心主义的

①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13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139页。

③ 同上书，第142页。

认识论的根本不同点，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本区别，正是实践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实践贯串认识过程的始终，贯串认识论问题的各个方面。

列宁还把辩证法贯彻于实践观，提出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原理。列宁认为，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就是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人的每一项具体的实践活动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它不能无条件地证实或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就是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限发展的实践检验着一切理论的真理性的。坚持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原理有着重大的意义。列宁说：“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①

列宁的这些论述说明了实践观点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同时，又提出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原理，把唯物论与辩证法在实践观中密切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三节 列宁对物理学革命的哲学总结

一、阐明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物理学方面有了许多新的发现。1895年法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引起了对放射现象的研究。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柏克勒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尔发现了天然铀的放射现象。1898年居里夫妇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1897年英国物理学家汤姆生提出了电子论。新的科学成就表明，原子不是不可分割的，物质元素是可以转化的，物质的质量是可变的。这就打破了物理学关于物质结构及其特征的传统观念。面对着物理学的新发现，一部分物理学家由于受原有定理和传统观念的束缚，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一时出现了所谓“现代物理学的危机”的思潮。他们怀疑物理学的科学价值，得出否认物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否认物理学原理客观内容的结论。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昂·彭加勒(1857—1912年)在《科学的价值》一书中说，物理学有发生“严重危机的迹象”，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物理学旧原理的“废墟”，是“原理的普遍毁灭”。认为物理学一些基本原理被推翻，证明这些原理不是自然界的反映，而是人的意识的产物。于是得出唯心主义的结论：“凡不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无”^①。马赫主义和一部分唯心主义者抓住这些现象作为驳倒唯物主义的根据，他们认为一切科学理论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人们主观创造的符号、记号。

列宁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了物理学的新发现所提出的认识论的新课题，概括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揭示了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列宁指出，所谓“物理学危机”，实质上并不是物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发生了危机，也不是说物理学的科学定律和原理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而是有些物理学家在物理学新发现面前，由于不能从自发的唯物主义提高到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不能对科学理论的发展作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而陷入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这是物理学家们的认识论发生了危机。“旧物理学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物质世界的实在的认识’，就是说，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物理学中的新思潮则认为理论只是实

^①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258、259页。

践的符号、记号、标记，就是说，它否定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并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的存在。”“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就是：旧定律和基本原理被推翻，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被抛弃，这就是说，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①列宁揭示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是对马赫主义妄图利用物理学的新发现向唯物主义发动进攻的有力回击，同时也向自然科学家们指明，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才是克服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

列宁还研究和总结物理学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指出物理学唯心主义产生的两个认识论根源。其一是数学方法在物理学中的广泛应用。物理学家们广泛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由于数学的高度抽象性，它撇开具体的对象而进行数学的推演和论证，容易使人们忘掉它的客观基础，忽略了自己所研究的具体客观对象，以至怀疑物理学本身的客观性，而陷入唯心主义。其二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物理学的原理、定律，同其他科学知识一样，都是自然规律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它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因而它是相对的。但是，一些物理学家长期以来习惯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把物理学的原理、定律看作是绝对不变的永恒真理。物理学的新发现表明它们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时物理学家们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知识只是相对的，否认知识的绝对性一面，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列宁指出，相对主义“这个原理在旧理论急剧崩溃的时期以特殊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在不懂得辩证法的情况下，这个原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②列宁分析这个问题时，说明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划清了唯物辩证法与相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62、264页。

② 同上书，第314—315页。

对主义的界限，为物理学家克服这场危机指明了方向。

二、对物理学新发现的哲学概括

一部分物理学家由于对物理学的新发现未能作出科学的说明，得出了所谓“物质消失了”的错误结论。法国物理学家乌尔维格在《科学的进化》一书中写道：“原子非物质化了，物质消失了。”^①这种论断被马赫主义和其他唯心主义者所利用，以此作为攻击唯物主义的根据。他们宣称，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已经“陈腐”了，被自然科学的发展驳倒了。

物理学家们所讲物质消失是什么意思？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概念和物理学的物质结构理论的区别和联系怎样？这是物理学新发现给哲学所提出的新问题。列宁对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对哲学的物质概念作了科学的说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列宁认为，物理学家们所说的“物质消失了”是指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说明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人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前进了一步。由于物理学的新发现，人们原先所理解的物质特性正在消失。旧物理学把物质归结为原子，把原子的特性看作是不变的，现在发现原子是由电子及原子核构成的，原子不再是物质的最小单位，原来关于物质构造的理论不完全适用了。这是物理学家所谓“物质消失了”的含义。其实，物质并没有消失，因为电子及其他粒子也是物质的一种形态，是一种物质。这些新发现驳倒了形而上学的物质观，却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列宁论述了哲学的物质范畴和物理学的物质结构理论的区别与联系。“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任何关于物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动着的物质会从

^①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264页。

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①。世界上的物质是多样性的统一，物质的具体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相互转化和不断发展的，因此人对物质的具体形态的认识是相对的。但哲学上所理解的物质的特性是它的客观实在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绝对的，在人的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永恒存在的。一些物理学家由于不懂得辩证法，所以陷入唯心主义。马赫主义抹煞哲学上的物质范畴与物理学上的物质构造理论的区别，攻击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说明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的概念已经“陈腐”。列宁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他指出：“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②相对主义否认物质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绝对性，导致唯心主义。

列宁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给物质概念下了科学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③列宁的物质定义从认识论角度表明了物质的客观性和可知性，又从辩证法角度揭示了物质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它是在人的感觉之外存在的，又为人的感觉所感知的；它是无限多样的具体的物体，又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千差万别的物质的高度概括，是广泛已极的概念。列宁指出，对于物质这种广泛已极的概念只能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上来下定义。这个定义的实质是表明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说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67、266页。

② 同上书，第268页。

③ 同上书，第128页。

列宁说：“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①就是说，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物质和意识的对立就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二者在一定的条件下是统一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列宁具体发挥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丰富和发展。

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中，还具体阐述了恩格斯关于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的思想。马赫主义者利用物质结构和物质运动形式的新发现，在宣扬“物质消失了”的前提下，宣扬没有物质的运动。他们认为电子不是物质，只是“纯粹的能”，“能”是唯一的“世界实体”，是能在运动，是没有物质的运动。唯能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年）。他说，“一切外界现象都可以说是能量之间的过程，其原因非常简单：我们意识的过程本身就是能量的过程，它把自己的这种特性传给一切外界现象。”英国的马赫主义者毕尔生更直截了当地说，“万物都在运动——但只在概念中运动”^②。他们把运动看作是我的感觉在交替变换，是我的表象在消失和出现，在我之外什么也没有。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论调。列宁指出，在物质和运动的关系问题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存在根本的区别。“唯心主义者可以认为世界是我们感觉（即使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高度‘协调起来的’感觉）的运动；唯物主义者则认为世界是我们感觉的客观泉源的运动，即我们感觉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7—148页。

②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277—278、274—275页。

的客观模型的运动。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者可以承认没有运动的物质的存在(即使是暂时的、在‘第一次推动’之前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者则不仅认为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离的特性,而且还批驳对运动的简单化的看法等等。”^①列宁的这些论述在物质与运动的关系问题上划清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界限,是对恩格斯关于“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论断的进一步发挥。

三、论证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关系

马赫主义标榜自己是“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哲学”、“自然科学的最新哲学”。它利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物理学危机的产生等来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列宁根据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必然随着自然科学的划时代的发现而改变自己的形式的思想,阐述了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关系。

第一,列宁指出,自然科学的发展表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正确性,辩证唯物主义是同自然科学相一致的。因为自然科学以研究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目的,是以承认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自然科学家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自发地接受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由于他们缺乏自觉性,所以在新的科学发现面前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不能概括出新的科学理论去代替或补充旧的理论。有些自然科学家不仅没有能够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而且原来自发接受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也被唯心主义的和不可知论的认识论代替了,成了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和渺小的哲学家。列宁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物理学前进中的暂时波折,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已冲破了旧理论的形而上学的思维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76页。

方法的束缚，物理学家们只要能够实事求是地总结物理学发展中所提供的丰富资料，就必然会得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结论。列宁指出，“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①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自然科学家从自发地接受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提高到自觉地按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总结自己的研究成果。

第二，列宁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哲学应当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中吸取营养，对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作出概括和总结，使哲学理论得以丰富和发展。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指出，随着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列宁遵循恩格斯所指引的方向，从事哲学研究工作。1908年2月25日他在《给阿·马·高尔基的信》中谈到，自己“在革命火热的时候很少研究哲学”，“不够内行，不想急于发表文章”^②。后来，为了批判马赫主义，列宁深入研究哲学，不仅重新认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还深入地研究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文献，研究了各种哲学流派的大量资料，对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作了哲学上的概括和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而普列汉诺夫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他虽然有较好的理论修养，但在批判马赫主义中，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物理学危机”的出现等重大问题未作深入研究，忽视了马赫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联系。因此，未能彻底战胜马赫主义，也未能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增加新的内容。“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忽视这种联系来研究马赫主义，就是嘲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也就是为了恩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19页。

②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26、425页。

格斯的某个词句而放弃恩格斯的方法。”^①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批判马赫主义中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作出贡献，理论修养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吸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丰富和发展。

四、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

马赫主义标榜“中立”、“超党派”，是“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哲学。俄国马赫主义者竭力掩盖马赫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以无党性自夸。列宁揭露和批判了马赫主义的实质，总结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进一步阐明哲学的党性原则。

列宁明确指出，哲学是有党性的。哲学的党性体现在不同哲学派别的整个哲学体系上，集中地表现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②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总是用一些虚伪的词句，新奇的术语来掩盖其唯心主义实质，标榜无党性，这正是资产阶级哲学党性的表现，事实上，他们每时每刻都陷入唯心主义。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的对立。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看作是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看作是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仍然把哲学家分为两大阵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背弃唯物主义以及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57页。

② 同上书，第365页。

纵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倾向。”^① 列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榜样，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

列宁进一步揭示了哲学党性的阶级实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的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②。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特别是在存在严重阶级对立的现代化社会中，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哲学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往往是阶级的对立和斗争的理论表现。因此，对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应当进行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同时列宁又指出，要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各种流派及其哲学家作具体的分析，在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时，要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研究成果，不能一概排斥、全盘否定。在马赫主义者中，有些人在化学、历史、物理等专门领域中写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说的话就不可信。因此，要善于汲取和改造他们所获得的成就，同时要善于消除他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③ 既要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作具体分析，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又要在哲学理论上同他们划清界线，作坚决的斗争，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列宁关于哲学党性原则的论述，是对恩格斯关于两大哲学阵营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列宁在俄国1905年革命前后这段期间，还在国际舞台上开展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捍卫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多次地参加了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高举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欧洲工人运动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46页。

② 同上书，第365页。

③ 同上书，第350页。

的分歧》(1910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等著作,分析和批判了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及其产生的根源,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为反对哲学上的修正主义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理论武器。自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的学说得到了检验和发展。但是,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不仅要同统治阶级的御用学者的理论作斗争,还要同工人运动内部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作斗争。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中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①第二国际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已经不像过去的机会主义者那样打着自己的旗帜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进行全面的修正。在哲学方面,他们用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用资本主义的表面繁荣现象来否定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篡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在政治学方面,企图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放弃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列宁说:“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②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识别伪装的马克思主义,既要批判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也要批判来自左面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

② 同上书,第337页。

的修正主义。

综上所述，列宁在俄国1905年革命前后这个时期，总结俄国社会革命的经验，概括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个时期是列宁在自己的哲学思想形成以后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期。在这段期间，列宁从学习、吸取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到发现和克服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中的缺陷，从而后来居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著述方面超过了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说，总结恩格斯逝世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作出新的概括，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是列宁，而不是普列汉诺夫。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本章阅读书目：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普列汉诺夫：《战斗唯物主义》（答波格丹诺夫先生）。

第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1914—1917年)

1914——1917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的时期。在这段期间，为了分析帝国主义的矛盾，揭示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批判修正主义，同时为了正确认识战争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以引导俄国的社会革命取得胜利，列宁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着重系统地研究了唯物辩证法，写下了《哲学笔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国家与革命》等光辉著作，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把唯物辩证法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和运用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日益加深。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分割殖民地，各帝国主义国家扩军备战，战争危机日益加剧，形成了德、奥、意等国的“同盟”和英、法、俄等国的“协约”两大帝国主义集团。1914年8月终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各帝国主

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也为了维护本国的反动统治。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是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强占土地和征服异族；打垮竞争的国家，掠夺它的财富；使劳动群众不去注意俄、德、英等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分裂并以民族主义愚弄工人，迫害他们的先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现时战争的唯一真实的内容和意义。”^①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

战争爆发后，第二国际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在历史转折的关头，第二国际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先后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沙文主义者。他们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立场上，高喊“保卫祖国”，鼓吹“国内和平”，强迫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煽动各国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利益而互相残杀。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为自己的叛卖行为辩护，其中威信最高、影响最大的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妄图用折衷主义来调和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矛盾，用诡辩手法把已经成熟的革命说成是不合时宜的，编造了臭名昭著的“超帝国主义论”，掩盖帝国主义的本质，否定帝国主义国家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普列汉诺夫也提出了“祸首论”，认为德国是战争的祸首，英、法、俄等国是自卫的。他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战争的论述，来为他们支持本国资产阶级进行掠夺性战争的叛卖行为辩护。列宁说：“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创了新纪录。”^②由于第二国际大多数党的领导人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使第二国际彻底破产。“国际的破产不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68页。

^② 同上书，第624页。

是社会主义的破产，而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破产”^①。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二、列宁研究唯物辩证法的目的和方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列宁开始写《卡尔·马克思》，这是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的。文中概述了马克思的传略和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由于篇幅所限，未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详尽的阐述，但文中体现了列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卡尔·马克思》完稿之后，列宁继续深入研究哲学。大战爆发后，列宁迁居到中立国瑞士的伯尔尼，充分利用伯尔尼图书馆的丰富资料，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和文献，写下了《哲学笔记》等一批著作。在这段期间，辩证法问题是列宁研究哲学的重点。

列宁之所以特别关心辩证法，是为了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来分析帝国主义的矛盾，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列宁在研究哲学史上的优秀遗产，如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著作的同时，还大量收集现实材料，写成了《第二国际的破产》、《论欧洲联邦口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无产阶级的军事纲领》等著作。这些著作体现了列宁哲学研究的成果。这些著作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特征，说明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列宁说：“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所下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6—7页。

的定义，他的思想曾为黑格尔所发扬。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也始终是这样的，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做是当时各有关国家(及其内部各阶级)的政治的继续。”^①列宁还运用唯物辩证法进一步揭示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之内首先获得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列宁重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也是为了针对社会沙文主义者对辩证法的歪曲，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机会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战争的性质和对待战争的态度等问题上都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其哲学基础就是折衷主义和诡辩论。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列宁就曾经指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在哲学方面就是用新康德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用庸俗进化论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用诡辩论来冒充辩证法，为帝国主义战争和机会主义的路线辩护。列宁在深入研究哲学时，对新康德主义、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等哲学思潮及其社会根源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特别注意划清唯物辩证法与庸俗进化论、折衷主义诡辩论的界限，为无产阶级认清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清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从实际斗争需要出发，把研究与运用结合起来，这是列宁研究哲学的重要方法，也是他一贯提倡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的具体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在研究哲学中写了大量的摘要、札记、评语和短文，这些笔记就是后来于1933年出版的《哲学笔记》的主要内容。这些笔记虽然主要是为自己进一步研究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26页。

而写的，但内容极其丰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贵财富。列宁在这段期间写的其他著作，也体现了他的研究成果，因此，要把学习《哲学笔记》和学习列宁在这个时期写的其他著作结合起来，才能深刻领会列宁的哲学思想。

1914——1917年是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

第二节 列宁论辩证法的核心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全面地探讨了辩证法的要素，概括出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体系，明确地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从而深刻地阐明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这不仅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提供了锐利的武器，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对辩证法的性质、对象、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都作了科学的论述。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发掘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对唯物辩证法的内容，唯物辩证法的出发点、根本特征、基本规律和范畴，辩证法和认识论、逻辑学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全面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全面探讨辩证法的要素，说明 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

列宁在1914年7—11月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作了概括。他指出，辩证法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这里揭示的是它的几个特点：发展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以往的阶段，是按螺旋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转化；事物内部各种相互作用的力量和趋势的矛

盾或冲突造成发展的内因；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等。^①这是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成果的综合和概括。在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过程中，列宁进一步地探讨了辩证法的内容，提出了辩证法的十六条要素^②。从内容上分析，辩证法的十六条要素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第一、二、三、八条指出了辩证法的基础和根本特征；（二）第四、五、六、九、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条揭示事物运动的根源和普遍规律以及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三）第七、十、十一、十二条揭示了认识的辩证法。列宁的辩证法十六条要素，为建立唯物辩证法的完整的严密的科学体系提供了一个雏型，为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辩证法的要素中，列宁首先提出了“观察的客观性”问题。就是说，辩证法首先要求按客观事物本身的关系和发展去观察事物，并且在进行观察时不能只抓住事物的个别实例，而是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如实地反映事物本身的辩证法。这就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划清了界限，明确提出了辩证法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

要按照事物本身的关系和发展去观察事物，就必须看到事物的普遍联系和自己运动。列宁在辩证法要素的第二、三、八条中指出了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自己运动这两个根本特征。要看到客观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要认识“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因为事物的本质只有在它们的相互联系中才能表现出来，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注意这一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关系的全部总和。而形而上学则相反，它用孤立、片面的观点看待事物，既看不到事物的内部联系，也看不到事物之间的外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239页。

部联系，因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

唯物辩证法的另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事物“自己运动”的原则。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运动变化的，不断发展的，而事物的运动是自身的运动，发展的源泉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都有内在的矛盾性，都能“自己运动”，这种自身的运动使得事物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因而就是事物自身的生命。唯物辩证法的这一根本特征表明了它与形而上学的庸俗进化论的根本区别。庸俗进化论表面上也承认事物的发展，但是把发展看作是简单的位置移动和数量增减，否认事物的“自己运动”，否认事物的转化，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这种庸俗进化论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理论基础。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反对暴力革命，迁就眼前的事变，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列宁在1915年写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中指出，庸俗进化论同意“发展原则”是一种窒息真理、使真理庸俗化的“同意”，因为它把发展看作是简单的数量增减，否认事物的转化^①。稍后，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短文中进一步指出：“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见到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0页。

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①列宁从理论上揭示了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策略及其理论基础，从而捍卫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二、确定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列宁在全面探讨辩证法的要素的基础上，确定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他在列举辩证法的十六条要素之后，概括地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②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又进一步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③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中，例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也谈到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和重要性，但没有明确提出什么是辩证法的核心。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表明他和马克思在当时着重说明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对这些规律的相互关系未作详细的考察。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但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明确提到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论断。列宁不仅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论断，而且深入研究了这一规律的丰富内容，论证了这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

列宁认为，对立统一的基本含义包括对立面之间既对立又统一这两个方面。对立面的统一就是对立面的相互依赖、相互转化。辩证法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相互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②③ 同上书，第240、407页。

依赖和相互转化的，应该把对立面的统一看作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就是它们之间的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对立面的相互排斥和相互斗争是绝对的，事物的发展实际上是对立面的转化，而对立面的转化则是对立面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结果。“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①。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列宁进一步探讨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第一，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学说，事物为什么会发展，对立统一规律回答了辩证法的这个根本问题。第二，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理解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钥匙。事物发展为什么会从量变到质变，为什么能飞跃，对立面为什么会相互转化等，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所以列宁把辩证法的其他规律看作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或“实例”。第三，是否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同形而上学、诡辩论根本对立的关键问题。形而上学否认事物的内在矛盾，否认事物的转化，诡辩论则否认对立面转化的条件。所以，列宁研究辩证法重点是研究对立统一规律，进而深入揭示对立统一规律与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关系，确定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三、关于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但它不是辩证法的唯一的规律。列宁全面地探讨了辩证法的各个方面，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说明了辩证法的一系列的规律和范畴。规律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是通过运动表现出来的。范畴揭示事物运动的一个环节，范畴之间的联系就是规律。例如，质和量、肯定和否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定，是范畴，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否定之否定，就是规律。列宁把范畴看作是“自然和人的规律性的表现”^①。

列宁针对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庸俗进化论，说明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的规律，强调质变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渐进性没有飞跃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②。列宁联系社会革命的实际问题，批判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说明量变质变规律的普遍性。他说：“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也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实际生活和实际历史本身包含有这些各不相同的趋向，正好象自然界的生命和发展过程既包含有缓慢的进化，也包含有迅速的飞跃，即渐进过程的中断一样。”^③列宁还指出，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就在于飞跃。他非常强调飞跃、质变的意义。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量变质变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形态之一。

否定之否定规律，实质上体现了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任何事物内部有肯定的因素和否定的因素。“一切都有自己的肯定的规定的因素和否定的规定”，“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④。辩证的否定作为发展的一个环节，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由于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必然出现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上的某些特征，“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⑤，因此，事物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这一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前进趋势和曲折途径。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87页。

② 同上书，第127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393、394页。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43、244页。

⑤ 同上书，第239页。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还对本质与现象、自由与必然、原因与结果、形式与内容等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作了具体的阐述，说明这些范畴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是思维对客观世界不同侧面的本质的反映，从不同侧面揭示客观世界的矛盾。这样，列宁就深刻地证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的整体，为建立唯物辩证法的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提供了一个雏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阐明辩证法和诡辩论的根本区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公开用庸俗进化论反对革命的辩证法。战争爆发以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用诡辩论来偷换辩证法，为帝国主义战争和他们的社会沙文主义策略辩护。列宁在《哲学笔记》和有关著作中，对他们的诡辩手法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论述了辩证法和诡辩论的根本区别。

诡辩论的一个表现是，抓住事物表面的一些枝节，掩盖事物的本质，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处，离开事变的内部联系。唯物辩证法要求全面客观地观察问题，揭示事物的内在的本质联系。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战争的论述，为自己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叛卖行为辩护。他们抓住交战国有“民族性”这一表面相似之处，抹煞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战争的本质差别。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指出：“一切诡辩家的手法向来是：引用一些分明与当前实际情况根本不符的例子来作证。”“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最科学的进化论，它正是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塞奥战争的民族因素对全欧的战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的。”^①列宁在《哲学笔记》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27、642页。

中曾摘录黑格尔反对诡辩论的话并加以评注。黑格尔认为，用毫无根据的假设或从事物外部寻找不真实的根据来说明事物是诡辩论。列宁肯定黑格尔的看法，指出了诡辩论与辩证法的对立。

对概念的灵活性加以主观的应用，抹煞概念的客观内容，是诡辩论的另一种表现。唯物辩证法认为，概念反映事物的矛盾，它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改变自己的内容，因此，概念具有客观性和灵活性。如果从主观随意性出发来运用概念，抹煞概念的客观内容及概念转化的客观条件，就是诡辩论。例如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用“保卫祖国”的概念来抹煞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区别，以此来欺骗群众，为自己的贩卖行径辩护。列宁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①辩证法与诡辩论都承认概念的灵活性。然而，辩证法客观地应用这种灵活性，因而正确地反映了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诡辩论则主观地应用这种灵活性，因而歪曲客观世界的联系及运动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抹煞概念的客观内容，成为玩弄概念的诡辩。

割裂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是诡辩论的又一表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阐明了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指出相对与绝对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只承认相对，否认绝对，就会陷入诡辩。在《哲学笔记》中，又进一步批判了相对主义诡辩论。列宁指出：“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2页。

客观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是排斥绝对的。”^①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以及人对它们的认识都是既含有相对，又含有绝对的，相对之中有绝对，它们的差别也是相对的。而相对主义诡辩论割裂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把相对看作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否认相对中有绝对，绝对由相对构成的正确理论。古希腊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说：“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他的学生克拉底鲁说：“连一次也不可能”。列宁指出：“这位克拉底鲁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弄成了诡辩”^②。

第三节 列宁论认识的辩证法

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十分重视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把辩证法与认识论统一起来的思想。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唯物主义的分析和改造。针对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割裂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错误，深刻地论述了认识的辩证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理论。

一、阐明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出并克服了旧唯物主义者认识论上的缺陷，把唯物论与辩证法在认识论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列宁在深入研究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后指出：“当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列入认识论时，他的观点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③。虽然马克思和黑格尔对实践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黑格尔把实践看作是绝对观念自我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② 同上书，第390页。

③ 同上书，第228页。

认识的一个环节，是向客观真理的过渡，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是认识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把认识看作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在这方面他们的观点是接近的。因此，列宁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①

辩证法既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也是人的认识运动的规律，认识的辩证法是事物的辩证法的反映，事物的辩证法创造了概念的辩证法。因此，“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②客观世界是充满矛盾、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类的认识过程也是充满矛盾的辩证的运动过程。因此辩证法本身就是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把对立统一规律当作认识的规律和方法，论述了认识过程的各种矛盾，如客体和主体、实践和认识、感性和理性、现象和本质、个别和一般等。所以，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③。

列宁还进一步探讨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的关系，提出了三者统一的原理。在哲学史上的一些哲学家的哲学体系中，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被看作是彼此独立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从彻底的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比较完整地叙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一致。在黑格尔看来，绝对观念的发展就是辩证法，绝对观念通过概念运动的表现就是逻辑，绝对观念的自我认识就是认识论，三者是一致的。列宁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逻辑的合理内核。他认为，“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

①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0页。

③ 同上书，第411页。

逻辑；不能把它现成地搬来。要挑选其中逻辑的（认识论的）成分，清除掉它的神秘观念：这还是一项巨大的工作。”^①列宁在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时，继承了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列宁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资本论》体现了三者的一致性，体现了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列宁给辩证逻辑下了科学的定义。他说：“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②按照这个定义，辩证逻辑是关于整个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的学说，也是对世界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是关于概念和认识的辩证法，是概念、范畴发展的历史的概括和总结，是辩证法应用于思维科学。这个定义体现了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三者的一致性。唯物辩证法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研究认识的产生和发展的辩证规律，辩证逻辑研究辩证思维的规律和形式，三者的内容是一致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统一的思想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尤其是体现在《资本论》中，但他们没有就此作出明确的论述。列宁深入地研究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专门探讨了并明确论述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三者统一的问题，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一重大贡献。他还注重把这一思想运用于实际生活中，使之得到丰富和发展。列宁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3页。

② 同上书，第89—90页。

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題。”^①列宁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运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逻辑，分析帝国主义的矛盾，研究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的，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一致的具体体现。

二、揭示认识发展的辩证途径

列宁首先肯定认识是一种运动，是一个充满矛盾、不断出现转化、飞跃的过程。“科学认识的[·]运动——这就是实质。”^②人的认识不是直线的，要经过一系列的[·]科学抽象的过程。列宁揭示了认识运动的辩证途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③认识的第一步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生动的直观”，这是指包括感觉、知觉、表象在内的人的感性认识。任何人的认识都是以生动的直观为起点的，离开生动的直观便无法认识客观世界。但认识不能停留在这里，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列宁强调科学抽象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只有经过科学的抽象，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使认识运动产生能动的飞跃。

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仅表现在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的过程，更为重要的还表现在经过科学抽象得到的理论回到实践中，使认识得到检验和发展的过程。只有实践才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列宁认为，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作用，并不是在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阶段以后才有的。实际上，实践是整个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② 同上书，第84页。

③ 同上书，第181页。

认识过程的基础，包括生动的直观和抽象的思维在内的“所有这些认识的环节(步骤、阶段、过程)都是从主体走向客体，受实践的检验，并通过这个检验达到真理”^①。

列宁还进一步指出，人类的认识运动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认识是思维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必须通过实践，不断认识发展中的事物，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列宁说：“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②列宁关于人类认识运动永无止境的论述，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鼓舞人们通过实践不断接近客观真理。

列宁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辩证法，指出真理是一个过程，真理是全面的。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主要看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也就是说，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而要达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就必须有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列宁吸取了黑格尔认为“观念是过程”的合理思想，指出：“真理是过程。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和技术），走向客观真理。”^③认识离不开人脑，人脑是生命长期发展的产物，客观事物反映在人脑中形成理论，在实践中证明认识的真理性，是一个通过实践达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过程。真理既然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正确认识，这就表明真理不是对某个事物的某个方面的认识，而是对事物的一切方面、对事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6页。

② 同上书，第208页。

③ 同上书，第215页。

物各种属性的认识，这样才能找出事物的共同本质及其规律性，这就是真理的全面性。“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真理是全面的”^①。

列宁强调在认识真理过程中要反对片面性和表面性。他以价值和供求关系为例说明抽象思维在认识真理中的作用。价格是我们能直接感觉到的现象，它随着市场供求情况而上下波动，从整体来看，商品是按价值确定价格的，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比感性的现象更深刻地揭示商品的本质。“价值是没有感性物质的范畴，可是它比供求规律更具有真理性”，“真理不是在开端，而是在终点，更确切些说，是在继续中。真理不是最初的印象”^②。

三、提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著名论断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说：“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③。他还深刻地论述了实践的特点及其在认识真理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实践提到首要的地位，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与实践比较，实践高于理论。列宁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④这是列宁在研究黑格尔辩证法中提出的又一著名论断，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内容。实践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两个本质特点。所谓实践的普遍性优点，是指实践的共同的规律性，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212页。

② 同上书，第183、182页。

③ 同上书，第233页。

④ 同上书，第230页。

一方面人们通过实践可以从个别中概括出事物的一般的共同本质和规律性。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只要具备相同的条件，便可以产生同样的结果。所谓实践的直接现实性的优点，就是指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物质性的活动，通过实践能检验主观的东西是否正确，能使观念的东西转化为现实的东西。实践与理论相比较，理论也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但是理论本身却不具备直接现实性的优点。即使是正确的理论，也只是主观领域的东西，只是精神力量，它本身不是直接现实性的力量。理论是否正确，它本身无法自我检验。因此只有通过实践，把主观的东西见之于客观，转化为直接现实性的东西，理论的正确性才能得到检验，精神的力量才能成为直接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

列宁关于认识论的辩证法的论述，说明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三者的统一，认识发展的辩证途径，和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指明了通过实践走向客观真理的具体道路，这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且在实践上，指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争取社会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第四节 列宁对国家与革命的 理论的研究和发展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深入研究了唯物辩证法，他的研究成果不仅表现在写成了内容丰富的《哲学笔记》上，而且还表现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分析帝国主义的矛盾，揭示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考察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和制定策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揭示帝国主义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激化，形成了自由竞争时代不同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与灭亡的客观规律，并具体地揭示了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列宁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成果，运用唯物辩证法，收集了大量资料，分析帝国主义的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为无产阶级制定革命策略提供了依据。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造成了垄断；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为金融资本，形成了金融寡头；由商品输出发展为资本输出；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的领土分割完毕。而主要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代替”^①。

这些特征是怎样形成的呢？最根本的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引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作了全面的分析，当时就预见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和资本趋向集中，并走向垄断。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了大量资料后指出：“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②。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生产集中引起垄断，当垄断占据统治地位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就是“量转化为质，发达的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③。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社会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自由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所具有的不同特征，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阶段性的质变。所以列宁说：“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07页。

② 同上书，第743页。

③ 同上书，第809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①

资本主义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但垄断并没有消除竞争，而是使竞争升到更高一级。“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②。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竞争主要在企业之间进行，到了垄断阶段，竞争升级，垄断组织内部、垄断组织之间甚至在国际范围展开剧烈的竞争，这时竞争规模更大，破坏性更严重。这必然促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日益加深。

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研究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得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科学结论。

二、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充分表现出来。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用新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经断言，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必须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这个结论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当时资本主义还处在相对稳定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还未充分表现出来。大工业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页。

^② 同上书，第807—808页。

社会发展不相上下，世界市场的建立，使各国的交往密切起来，如果在某一国内首先单独地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将遭到各国资产阶级联合的镇压而归于失败。恩格斯说：“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答：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①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显著地表现出来。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出新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获得胜利。1915年8月，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②过了一年，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进一步阐明这个结论，由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③。这个新结论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的新贡献。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垄断前资本主义阶段已起作用，主要表现在各国发展水平的差别上，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一规律起作用的范围、内容及形式都具有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不在于发展水平的差别上，而在于各国经济跳跃式地发展。“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④。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跳跃式地超过原来发展较快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③ 同上书，第873页。

④ 同上书，第783页。

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就加剧了竞争，引起经济冲突，导致军事冲突。帝国主义战争势必使帝国主义国家力量互相削弱，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薄弱环节上突破。同时，各国革命条件的成熟程度也是不同的，要在所有或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说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首先获得胜利是可能的。

列宁用新的理论武装了俄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实践证明列宁的新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表明了列宁的理论勇气和科学态度。他深入研究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得出了新的结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和其他真理一样，马克思主义也是过程，我们要把它作为过程来研究，不能把它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三、论述国家的起源与本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的内部矛盾十分尖锐，俄国是当时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在1917年2月，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达到了1905年革命没有达到的目的。但是，革命后的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孟什维克窃据了苏维埃组织的多数席位。他们鼓吹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在国内欺骗和压制群众。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因此，国家与革命问题成了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①1917年8月至9月列宁写成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全面论述了国家的起源与本质，总结了1848至1917年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歪曲和篡改，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171页。

主义。

首先，列宁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讲起，说明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下去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级，在阶级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便产生了国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①这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机会主义者把国家看作是阶级调和的机关的有力驳斥。

第二，列宁深刻地论述了国家的本质。列宁在驳斥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国家的歪曲时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②表面看来，国家是驾于社会之上的，实质上它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国家产生以后，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的形式也是多样的，但其实质都是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列宁特别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阶级实质，指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资产阶级一掌握这个外壳，就能巩固地确立自己的权力，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

第三，列宁系统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指出：“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③列宁总结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175页。

② 同上书，第176页。

③ 同上书，第200页。

了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的经验,指出,必须教育群众认识到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深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专政与民主的辩证关系,考察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不仅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作好理论上准备,并且为革命胜利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

总之,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深入研究唯物辩证法,全面探讨辩证法的要素,确定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探讨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三者的一致性;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帝国主义的矛盾,揭示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分析了国家与革命问题,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方面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本章阅读书目:

列宁:《卡尔·马克思》。

列宁:《辩证法的要素》。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

第八章 十月革命后列宁 斯大林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发展

(1917—1953年)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俄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从1917—1924年，苏联人民在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成为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列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拓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

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领导苏联人民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并总结建成社会主义的经验，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增加了新的内容。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节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和哲学的新的历史使命

一、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政权被资产阶级所窃取，机会主义者

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路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镇压群众的示威行动，造成了流血的“七月事变”。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列宁及时提出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任务。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以后革命向全国范围扩展，从城市向农村迅速展开，到1918年2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没有建立工农联盟，巴黎公社仅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只存在了七十二天就失败了，未能取得全国的胜利。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巴黎公社未完成的事业，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曾经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①

二、战斗唯物主义者的新任务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俄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新任务。列宁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取了俄国……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②在原来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新课题，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业，“这是一桩书本上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1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6页。

不到的、历史上没有见过的新事业”^①。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人民，遵循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和创造，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了巩固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消灭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击败了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镇压了国内反动势力的武装叛乱，实行新经济政策，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些活动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但他们不是把现成的理论当作教条，而是强调要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注意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发现新规律。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多次引用歌德的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这句话含有深刻的哲理。理论固然重要，但实践高于理论，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会失去生命力。列宁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②

为了解决面临的新课题，列宁强调要勇于实践，但并没有忽视理论的重要作用，认为实际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十月革命后，在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都十分重视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在1918年5月，列宁在人民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科学院的决议草案中，就提出建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门机构。1920年12月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博物馆的决定。1921年1月，遵照列宁的倡议，又把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改称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还建立了一批高等院校，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全国出版了许多宣传马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422页。

^② 同上书，第398页。

克思主义的杂志，例如《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创刊于1922年)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还大量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1922年春，列宁写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发表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22年第3期上，向哲学理论工作者提出了重要的战斗任务，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研究的纲领。文章指出战斗唯物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去团结和教育群众，为解决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课题，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二节 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一、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

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理论，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十月革命后，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和斗争，对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又是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既有资本主义的因素，又有共产主义的因素。在过渡时期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有三种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因此，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经济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

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①。这些矛盾和斗争性质是复杂的，形式是多样的，其中包括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的结果就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②

列宁还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新旧事物的矛盾和斗争，揭示社会主义社会新事物发展的规律。新生事物的出现是必然的，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这是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新生事物出现时，往往是弱小的、不完善的，但富有生命力，必然会成长壮大，它是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新生事物成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列宁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称为“伟大的创举”。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为完全的共产主义。”^③

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④的著名论断。他运用矛盾的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分析了国内外的具体环境和各个时期的矛盾的特点。

首先，列宁强调要对不同的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十月革命后，一些“左派”共产党人把辩证法简单化，教条地对待十月革命的经验。列宁为了帮助他们克服教条主义的错误，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十月革命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但各国的共产党人要把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同各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充分研究各国的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84页。

② 同上书，第89页。

③ 同上书，第19页。

④ 同上书，第290页。

特点。如果不顾各国的不同环境与条件，机械地搬用十月革命的经验，就会犯严重错误。

其次，列宁指出，矛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时期中，具有各不相同的表现形式。因此，要善于分析和抓住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环节和关键。“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①。列宁以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的实际情况，说明了抓主要环节的重要性。1917年的关键是摆脱战争，1919年和1920年的关键是抗战，1921年的关键是实行有秩序的退却，1922年的关键是挑选人材。由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抓住各个时期的主要环节，使革命政权得以巩固，革命事业得以发展。列宁关于抓主要环节的论述，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的成功的范例。

二、提出辩证逻辑的基本要求， 论述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关系

第一，关于辩证逻辑的基本要求。在《哲学笔记》中，列宁给辩证逻辑下了科学的定义，对辩证逻辑的内容、结构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论述。十月革命后，列宁在批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时，提出了辩证逻辑的四点基本要求，进一步说明了辩证法与折衷主义的区别，对辩证逻辑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1年苏联人民已击退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粉碎了国内资产阶级的叛乱，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而进入经济恢复时期，必须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业，苏维埃政权才能巩固。因此，要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教育和团结群众，调动群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26页。

众在恢复国民经济中的积极性。列宁认为，工会是教育的组织，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而托洛茨基（1879—1940年）提出“整刷工会”、“把螺丝钉拧紧”的口号，妄图把工会变成国家行政机关，实行强制的组织，使工会脱离群众，分裂工人队伍。在争论中，布哈林（1888—1938年）以“缓冲派”的面目出现，他认为把工会看作是政权机关和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两个原理都是对的，说那个不对都是没有逻辑上的根据的。列宁指出，这是用折衷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批评布哈林的错误时，列宁提出了辩证逻辑的四点要求：第一，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要求全面性，防止片面性和僵化；第二，要从事物的发展变化中观察事物，看到事物的“自己运动”；第三，必须把作为真理标准的人的全部实践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①

列宁提出的辩证逻辑的四点基本要求表明，正确的逻辑思维必须坚持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认识论的辩证法，表明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一致性，是对他在《哲学笔记》中提出的“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命题的具体发挥。

第二，关于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关系。列宁在1922年3月写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战斗唯物主义者的任务。首先是共产党员必须同非共产党员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引导广大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反对宗教迷信，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迷信思想。除了用现代科学批判宗教外，还要把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著作翻译出版，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战斗唯物主义者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根本就既没有战斗性，也不是唯物主义。”^①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必须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作出概括和总结。唯物主义如果脱离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就会丧失生命力。列宁提议吸收自然科学家参加哲学杂志的工作，注意自然科学领域里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因此，“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②。

列宁提出的要建立哲学理论战线上的两个联盟的任务，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哲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运用和发展。

三、阐明民主与专政、群众与领袖的辩证关系

第一，关于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1918年8月考茨基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作了全面的歪曲和篡改，鼓吹“纯粹民主”，割裂民主与专政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民主方法与专政方法是绝对对立的，“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攻击苏维埃政权，说由于俄国落后才不得不实行专政。列宁说：“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竟这样骇人听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这该怎样解释呢？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要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08页。

② 同上书，第609页。

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①

1918年10月至11月，列宁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继《国家与革命》之后，进一步阐明了国家的起源、性质和作用，并根据十月革命后的经验，论述了国体与政体、民主与专政以及民主的消亡等问题，批判了考茨基的谬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民主和专政的辩证的统一，专政与民主是国家政权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也是一种消灭方式)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②

专政与民主是相互对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敌对阶级实行专政，这就意味着消灭它的民主权利。对人民则实行民主，不能专政。“专政是一个大字眼，大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说的。专政就是铁一般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③ 专政与民主不能同时用于对一个阶级、一个人的身上，不能滥用专政。在这个意义上说，专政与民主是对立的。

专政与民主又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敌人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的保证，没有专政就没有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才能对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④。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1页。

② 同上书，第622页。

③ 同上书，第517页。

④ 同上书，第629页。

无产阶级民主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无产阶级民主把民主发展和扩大到绝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为了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一方面要对敌对阶级和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另一方面要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同官僚主义作了不懈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第二，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辩证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承认杰出人物、革命领袖的重要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时从理论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列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仅始终坚持了这个基本观点，而且通过总结群众的斗争经验，使这个原理得到丰富和发展。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列宁十分强调，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不是少数人所能实现的，必须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积极性，防止脱离群众而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他说：“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①

1920年4月，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总结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论述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当时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由于对第二国际的“变节领袖”的不满，也由于党的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迅速更替破坏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正常关系，他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51页。

们提出了“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的问题。列宁认为，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列宁指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第一次全面阐明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把群众和领袖、阶级和政党对立起来，四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割裂开来，夸大政党和领袖的作用，就会走向唯心主义；如果忽视领袖和政党的作用，崇拜群众的自发性，就是庸俗的机械论。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帝国主义时代，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俄国的革命实践中，领导苏联人民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总结实践经验，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包括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留下的宝贵的理论财富，直到今天仍有学习和研究的重大价值。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成前斯大林的哲学思想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继承列宁的事业，领导苏联人民把苏联建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进行了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把社会主义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1879—1953年)生于俄国梯弗里斯省哥里城的一个皮鞋工人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工党。1901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委员。从青年时代开始，斯大林就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不屈的斗争。1906年，为了批判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写了《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是他青年时期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斯大林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策略，概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普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作出了贡献，1912年，斯大林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年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十月革命时期协助列宁领导了武装起义，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总书记。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撰写了大量理论著作。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有《论列宁主义基础》、《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

1923—1924年间，托洛茨基一伙利用列宁的病重和逝世，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他们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理论上诋毁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们胡说什么列宁主义仅仅是俄国的现象，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特别攻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斯大林为了捍卫列宁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写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等一批富有战斗性的著作。

《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对什么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主要内容和国际意义等，都作了科学的阐述。这本书对于从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捍卫列宁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

什么是列宁主义？同托洛茨基结成反党联盟的季诺维也夫

(1883——1936年)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季诺维也夫强调俄国的落后性，把列宁主义看作是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把农民问题看作是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为了驳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一伙对列宁主义的歪曲和攻击，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了科学的定义。他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and 策略。”^①这个定义说明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基本内容和普遍意义。

第一，这个定义说明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俄国是列宁主义的诞生地，俄国共产党人的领袖列宁成为列宁主义的创造者，但是列宁主义不仅是俄国特殊情况下的产物。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激化，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并且当时仅仅在俄国才有能够用革命方法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现实力量。因此俄国就成了列宁主义的诞生地。

第二，这个定义说明了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继续，但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的重复。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了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总结工人运动的新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这个定义说明了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列宁主义无疑包含了农民问题，但不能把列宁主义归结为农民问题。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和基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85页。

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指出：“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①

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实质和基本内容的阐述，捍卫了列宁主义，对帮助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认识列宁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对研究列宁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也有指导意义。斯大林捍卫和宣传列宁主义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二、开展对机械论和德波林派哲学的批判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哲学界出现了所谓“机械论者”与“辩证论者”的争论。机械论者季米里亚泽夫、萨拉比扬诺、阿克雪里罗德等，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宣扬运动的来源在于事物的外部冲动。他们还否认低级运动形式和高级运动形式之间质的区别，把高级现象归结为低级现象，认为社会现象可以用化学的、物理的、生物的方法施以定量的分析。这些机械论者甚至公开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布哈林的“平衡论”也犯了机械论和外因论的错误。他认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平衡性质决定着社会运动的基本路线”。“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路线，是矛盾缩小和最后消亡的路线。”还认为小农经济的农村会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斯大林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以德波林(1881—1963年)为代表的所谓“辩证论者”(还有卡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25—226页。

列夫、卢波尔、史登等)同机械论者展开论战。德波林早期在国外研究哲学,受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影响,在批判马赫主义中起过一定的作用。十月革命后,先后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等院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并主编《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在宣传唯物主义、批判机械论中作出了贡献,但同时犯有严重的错误。他的主要错误是:哲学脱离政治、脱离实际,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列宁阶段,过高地评价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也存在一些错误观点。斯大林亲自参与了哲学界的斗争。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向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局发表谈话,指出德波林哲学思想的错误。提出要“清查德波林派的一切著述和哲学界的一切错误”。随后,苏联哲学界就迅速地开展了对德波林派哲学的批判。

斯大林领导苏联哲学界开展对德波林派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通过批判,促进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尤其是推动了对列宁的哲学遗产的研究,整顿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加强了对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从而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但是在批判中,未能全面分析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联系与区别,犯了简单粗暴和扩大化的错误,带来了不少消极的后果。

三、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1925年,苏联的国民经济已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如何继续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这是苏联人民面临的迫切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坚持发展了列宁主义。

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获得胜利的理论,是列宁在1915年首先提出来的,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当时托洛茨基

竭力反对和攻击这个理论。他否定一国首先获得胜利的可能性，胡说什么“德国不发生革命，俄国或英国就不能有胜利的革命，反过来也是一样”。“休想革命的俄罗斯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同时也宣告托洛茨基的谬论的破产。但托洛茨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错误理论。正当苏联由经济恢复时期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关键时刻，托洛茨基又一次公开反对列宁的一国胜利学说。他打着“世界革命”的旗帜，否认一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认为苏联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十分落后，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俄国工人不能保持政权，更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污蔑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徒劳的，是“民族狭隘性”。

斯大林发表了一系列的讲演和文章，批驳了托洛茨基的谬论。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苏联的内外条件，论证了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捍卫和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斯大林指出，当时苏联面临着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①他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苏联的内部关系问题，工人阶级能够和农民结成联盟，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用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另一个是外部关系问题，由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还不能排除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因此，建成社会主义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斯大林把“建成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区别开来，说明建成社会主义任务的主要内容是实现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36页。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斯大林的论述鼓舞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经过大约十年的努力，取得了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1936年通过了新宪法，用法律形式肯定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①他还探讨了建成社会主义以后阶级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他指出，当时苏联已消灭了剥削阶级，留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他们之间的界线正在消除，经济政治矛盾正在缩小，他们团结合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捍卫了列宁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伟大胜利。

第四节 社会主义建成后 斯大林的哲学思想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系统的概括和通俗的说明

1938年，苏联共产党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战斗历程，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已通过群众的革命行动，成为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为了总结联共(布)党的历史经验，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编写了《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斯大林写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编入党史的第四章第二节，强调马克

^① 《斯大林文选》第90页。

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了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作斗争的经验，系统地概括和通俗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第一，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列宁在《卡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一节中，概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几个特点，阐明辩证法是一门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斯大林进一步发挥了列宁的思想，概括出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世界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统一的整体；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是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事物内在的矛盾，对立面的斗争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是从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

在论述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时，斯大林强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同时力图说明辩证法四个基本特征的内在联系，从人类认识由浅入深的规律来安排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首先指出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接着说明事物发展的状态、趋向和根本原因，表明辩证法的各个特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在论述辩证法的特征时，注意引导人们运用辩证法去观察现实的社会生活，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提出了“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等著名论断。这些论断在实践上指导人们注意认识事物发展的新特点，研究新问题，防止思想僵化，是很有意义的。

斯大林在论述辩证法的特征时，未能理解和掌握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思想，没有明确说明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在谈到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时，强调了“对立面的斗争”，忽视了对立面的统一；在谈到事物发展的趋向时，没有明确提到否定之否定规律。这都是一些不足的地方。斯大林根据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对唯物辩证法所作的概括和

论述，在宣传、普及唯物辩证法上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二，关于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斯大林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尤其是根据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把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三条：世界按其本质来说是物质的，世界上各种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以认识，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是可靠的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只有还未被认识的、而将来科学和实践的力量会加以揭示和认识的东西。他引用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对康德、波格丹诺夫等人的不可知论作了批判。

斯大林概括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时，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具体说明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的原理。他批判了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的唯心主义和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的庸俗唯物论，阐明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否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从抽象的“人类理性原则”出发，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因此，他们的改革社会的方案、计划都是无法实现的，是终归要失败的。经济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不承认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因而在客观事物面前显得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同样归于失败。斯大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在自己的活动中以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依据，任何时候也不脱离社会的现实生活，同时，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先进思想、革命理论的动员力量、组织力量和改造力量，既反对唯心论，又反对庸俗唯物论，把理论和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精神的能动作用结合起来。

第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斯大林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为依据，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具体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本内容。他首先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概念作了具体的解释。他认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个概念包括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组成社会的人口和物质资料的生活方式。这些方面都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地理环境和人口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但它们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的主要力量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就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斯大林研究了生产方式运动变化的特点，探索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性。

斯大林认为，生产力是由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和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构成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的生产运动。斯大林指出了生产的三个特点。

生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会长久地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即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人们的生活方式怎样，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就怎样。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因此，历史科学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

生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生产关系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观念形态也发生变化。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加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

生产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新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合的生产关

系的产生过程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它经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在新的生产力没有充分成熟以前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自发进行的。这是因为：第一，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新一辈人是在前一辈人所造成的现成的生产方式下生活的。第二，人们在改进生产工具时，只考虑它所带来的直接利益，而不会意识到这种改进可能引起的社会后果。在新的生产力成熟以后，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现存生产关系，就必须通过新兴阶级的自觉活动，通过这些阶级的革命来实现。于是，自发的过程让位给自觉的过程，和平的发展让位给暴力的变革，进化让位给革命。

斯大林所概括的生产发展的三个特点，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考察了人类历史上五种基本的生产关系的更迭，具体地说明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但是，斯大林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表述，有的地方不够确切。他认为在苏联当时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这种“完全适合”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后来，斯大林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改变了自己的提法。

总的看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基本上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统的概括和通俗的说明，是一本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好教材。

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1941年，正当苏联人民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时候，发生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的战争。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战争中，斯大林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战争，对战争的原因、性质、战争中胜败的因素等作了科学的分析，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也体现出斯大林的哲学思想。斯大林无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伟大的军事家。战后，斯大林又领导苏联人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进一步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而斗争。他写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研究了在新的条件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1950年在苏联《真理报》上开展了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讨论。在苏联语言学界，马尔(1864—1943年)及其信徒宣扬错误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上层建筑，是有阶级性的。讨论展开以后，许多青年来信要求斯大林发表意见。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批判了马尔等人的错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事物发展的特点。

斯大林为了说明语言不是基础的上层建筑，首先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作了具体的解释。他说：“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①斯大林还进一步论述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

^① 《斯大林文选》第520页。

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更为明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才建立起来的。但是，应该看到，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斯大林认为，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不是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是没有阶级性的。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造现存语言的基本要素的方法。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经过爆发，而是经过语言的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斯大林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一步指出：“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从个体农民的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是通过逐渐过渡来实现的。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新生事物发展的特点，是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外部条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事物性质的多样性决定了飞跃形式的多样性。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事物发展的特点的论述，关于飞跃形式多样性的论述，给唯物辩证法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内容。

1952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最后的重要著作。斯大林指出，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首先必须承认规律的客观性。当时有人认为苏维埃国家及其领导人能够“废除”现存的规律，“创造”新的规律，把规律和政府的法律、法

① 《斯大林文选》第521页。

② 同上书，第539页。

令混为一谈，否认规律的客观性。斯大林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指出，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规律，还是社会科学的规律，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是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①。否认了客观规律，也就否认了科学，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斯大林指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在客观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不能把规律偶像化，做规律的奴隶。人们可以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斯大林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命题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深刻地阐明了规律的客观性和可知性，指出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够使客观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同时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才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是对恩格斯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的思想的具体运用和进一步的发挥。

斯大林不仅重视研究一般规律，而且重视研究各种具体规律。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具体分析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起作用的各种经济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新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有相适合的一面，也有相矛盾的一面。领导机关的任务在于及时地

^① 《斯大林文选》第572页。

看出和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保证社会生产高速增长。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一般不用爆发式地改变现存制度，而是采取逐渐过渡来实现。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起作用的特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①。

斯大林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②它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它表明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斯大林还阐述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价值规律、扩大再生产的规律等。指出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的经济规律，都必须认真研究、掌握和运用。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的揭示和论述，是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结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成果。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一生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曾犯过严重的错误，但他的贡献是主要的。毛泽东曾经指出，“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的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① 《斯大林文选》第575页。

② 同上书，第602页。

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①“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②

本章阅读书目：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① 毛泽东：《最伟大的友谊》，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第九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1919—1937年)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诞生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哲学思想史上都是划时代的事件，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具有不容置疑的伟大意义。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欧洲，它能够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不但因为这一哲学本身的普遍真理的性质，而且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着传播和发展的客观基础。马克思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是产生革命理论的客观基础和动力，同时也是理解、接受一种革命理论的基础和动力。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必须首先分析这一传播的前提条件，即分析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和革命的客观需要。

中国长期处在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但在鸦片战争以前，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

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对中国进行强盗式的掠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基础走向解体，因而又客观上造成了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和可能。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在纺织业和面粉业这些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些发展，加上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一个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也就产生和发展起来。到“五四”运动时，中国的产业工人已发展到二百多万人。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阶级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使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象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是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他们并没有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屈服，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起义和反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七十多年间，先后出现了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和反侵略斗争。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但是，这些斗争或者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斗争，或者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由于没有一个先进阶级的用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为领导，最后都毫无例外地走向失败。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人，曾试图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样板来改造中国，结果证明是完全走不通的。中国革命的发展迫切需要一种正确的革命的理论来指导，这种理论

就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从鸦片战争失败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时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并逐步在欧洲、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的时候。但是，中国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十月革命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他们的思想，已开始零星地被介绍到中国来。1899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月刊，曾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思想。其后，梁启超、朱执信、吴玉章和李大钊等人，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著作作过片断的介绍。1905年11月和1906年4月，朱执信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二、第三号上，连续发表了《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第三号改称“列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和思想，译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一些重要内容和片断。1908年在日本出版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天义报》、1912年上海出版的《新世界》杂志，都曾译载《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部分内容。1902年，改良派办的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的日本人福井准造写的《近世社会主义》。该书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以讲究经济上之原则，而认信真理与正理”^①，接触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也多次谈到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1912年他在一篇讲演中称赞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阐发真理，不遗余

^① 转引自《新建设》杂志1953年第3期，第6页。

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①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条件的局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得到传播。一些知识分子介绍马克思主义，往往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去理解，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西方诸种社会思潮中的一种加以介绍。而且这种介绍当时只在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中间发生影响，广大工农群众对此还一无所知。所以，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虽然开始传入，但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还没产生什么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从这时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即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前途和道路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李大钊就在《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论文，热情地歌颂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他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提出中国革命必须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达、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都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去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形成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其次，这个时期的传播，在哲学上以唯物史观为重点。这是由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决定的。这个时期，李大

^① 《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民立报》1912年12月15日。

钊、陈独秀、李达和毛泽东等人，都着重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是组织翻译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唯物史观的著作。1920年8月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的部分内容，以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等著作也在这个期间陆续出版了。李大钊则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专门阐述唯物史观的论文。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概括地转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达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把唯物史观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在这些著作中，他一再宣传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认为阶级斗争学说象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联结起来。为了扩大唯物史观的影响，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毛泽东和蔡和森在通讯中，讨论了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他们一致认为，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①。蔡和森明确表示，他是“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②。他们认为，只有以唯物史观为出发点，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问题。因此，他们都把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当作极其重要而又迫切的大事。其他人如李达、周恩来以及陈独秀等，都为唯物史观的传播做了许多

① 见《蔡和森文集》第63—64、72—73页。

②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9卷4号。

工作。

再次，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同工人运动、同建党活动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使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使他们明了中国革命的主力 and 希望在于广大人民。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批判了那种机械论的观点。他指出，唯物史观认为经济行程的道路是必然的，但这与宿命论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历史规律的作用是通过人来实现的。《共产党宣言》号召劳工阶级起来革命，因为只有这种革命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进步。李达写了《劳工神圣颂》，热情歌颂“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主”、是“圣人”^①。更可贵的是，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不仅认识到了工农大众伟大的历史作用，而且身体力行，到工农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发动工作。1920年，在李大钊的推动和组织下，邓中夏等进步学生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举办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5月1日成立了长辛店工会。李大钊则到郑州等地向工人讲解唯物史观，宣传革命道理。“五四”运动以后，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在全中国形成为历史趋势，这一过程发展的最初的成果，就是导致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要在两年内成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②，即共产党。1920年夏天陈独秀、李达等人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并由李达主编出版了我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北京、湖北、湖南、广东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成立后又成为进一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阵地。它们有组织地翻译出版马克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43—44页。

②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88页。

思主义的著作，创办刊物，千方百计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一开始就受到种种阻力，不仅有来自反动政权物质上、政治上的扼杀，而且有来自“走狗学者”文字上的围攻，因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又是在同反动派、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展开的。1919年6月和7月，胡适首先发难，一方面在《每周评论》上，连续两期刊载他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来华讲演录；另一方面，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公开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其后又有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勱等人挑起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以及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易家钺等人挑起的争论。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三次大论战”。这些论战的实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胡适攻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他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胡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制造了阶级仇恨心”，把本来团结互助的两大势力变成两座对垒的敌营，使历史上演成许多“不须有的惨剧”。胡适这套谬论一出笼，立即遭到李大钊、李达、邓中夏、蔡和森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回击。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针锋相对地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能分开的。他认为只有以“主义”为指导，实现“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以俄国而论，十月革命未成功，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现在则全部解决了。这个“全部解决”虽然说得过份，但这里表达了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具体“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主义”的指导，离不开“主义”指导下的根本解决。李大钊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把解决经济问题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但要实现这一点，又必须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没有政

治上的革命，经济上的革命则永远不能实现。李达写的一系列论文，有力地反击了研究系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进攻。李达深刻地揭示了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实质，清算了它们的理论渊源和哲学基础，并在批判过程中，准确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实质和基本原理。针对“走狗学者”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制造了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胡说，他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写道：“社会构成的基础，成立在支持人类生活的物质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的。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的。简单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①

这三次大论战，掀动了中国的思想界，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受到锻炼，促进他们进一步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把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吸引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所以，斗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壮大。

以上是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概况。这种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干部和思想条件。在这一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先驱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因此，应该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党成立初期，党的领导者李大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47页。

钊、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就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寻找中国革命的规律。其中毛泽东同志的运用最有成效。他于1926年和1927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批成果。这些著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标志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一、青年毛泽东对新世界观的探索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代表。但是，他并非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曾经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世界观则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的早期革命活动中，曾经历一个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由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他也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经历一个不会运用到比较会运用、到能熟练地运用的过程。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又名毛润之)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里。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近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革命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的世界观的转变，就深刻地反映了这一伟大的转折时期。

毛泽东的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他最初是在私塾里读书，接受“四书”“五经”、孔夫子那一套教育。他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受母亲的影响，少年毛泽东也曾相信过神的存在，毛泽东从小就参加田间劳动，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有深切的了解。他非常同情贫苦农民的遭遇。他在劳动之余，发奋读书，

乡里远近能借到的书他都借来读了。其中广东人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对他影响最深。此外，还读了一些关于列强如何瓜分中国，呼吁救亡图存的小册子。通过读书，他了解了许多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史实，对照他耳闻目睹的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他便逐渐萌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1910年秋天，他第一次离开闭塞的家乡，进了县立东山高小。在这里，他又读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深为该刊所倡导的民主进取精神和康有为的改革运动所吸引。

在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从1913年至1918年在湖南公立第一师范时期，是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他在政治思想上趋向于革命民主主义，并第一次开始了哲学世界观的探索。

1911年春，毛泽东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堂，第一次到了长沙，这在他的生活和思想上，都是新的起点。长沙是湖南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处南来北往的要冲。当时又是辛亥革命正在酝酿时期，革命党的活动十分活跃。毛泽东来到这里，很快就成了“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热心的读者，成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反清斗争的支持者。他在来长沙之前，在政治观点上主要受梁启超改良主义的影响。来到长沙之初，他还分不清梁启超改良主义和孙中山的民主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一段时间内，他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等观念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但在政治上是坚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1915年，《新青年》出版，倡导科学和民主，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支柱——孔家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新青年》和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成为新文化运动最热烈的拥护者，并且逐步认识到康、梁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杆树立枝叶扶疏之妙”^①，不能解决问题。这样，他就抛弃改良主义

^① 1916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

而走向革命民主主义，走上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道路。

在一师时期，围绕着改造社会改造国家这一中心问题，毛泽东也开始了哲学的探索。在这里，他和朋友们组织哲学研究小组，经常在一起读书、讨论，交换学习心得。他广泛地研读了古今中外许多哲学著作，如孔孟儒学、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的著作，以及赫胥黎、斯宾塞尔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和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民主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以致托尔斯泰主义的著作，研读了《新青年》刊载的陈独秀、李大钊的论文。他从研读这许多著作和结合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中，形成了最初的哲学思想。从他当时写的《讲堂录》、他对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下称《批语》）以及一些文章、书信中，大体上可以看到这些思想的概貌。

毛泽东这些早期著作表明，当时他在世界观上受到各派哲学的影响，同样具有那种“混合物”的特点。但主要思想倾向则是夸大精神的作用，是唯心主义的。他从改良主义的失败中，深感中国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因此，他着力于探索历史发展的“大本大源”。他认为这个“大本大源”，就是“宇宙之真理”，就是哲学精神、道德观念。他在《批语》中写道：“道德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这就把精神、道德观念当作主观自生的东西。他认为，人类只有精神生活，而无物质之生活，文明是由观念创造的，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把社会黑暗和腐败的根源归结为思想、道德观念的“不洁”，认为“思想主人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因此，改变人们的思想便成为改造旧社会的根本。他认为中国的黑暗和腐败，皆因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种根甚深，结叶甚固”，因此，改造中国就

在于抓大本大源，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入手，改变全国之思想和道德观念。

青年毛泽东这个时期唯心主义观点的另一个表现，是夸大个人的作用。他认为，人对大本大源的认识和掌握是不同的，因而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他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①“圣人”深得大本大源，他能够“远达天地，明其现在过去和未来，洞悉三界现象，百无不知”^②。中国只要出现这样的“圣人”，中国就得救了。他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暄皆开。”看来，这种观点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有关。恩格斯在批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夸大个人作用的英雄史观时，曾经指出：“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③

但是，青年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坐以论道的书生。他刻苦读书，更重视对实际生活的了解。他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④。1917年暑假，他和萧子升从长沙出发，走遍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同普通的工人、农民接触，进行实地调查，获得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实际知识。同时，他还读了许多自然科学的

① 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

② 同上。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8页。

④ 《讲堂录》。

书籍。这一切又使他在世界观上时时闪现出和唯心主义相矛盾的观点。在《批语》中，他强调“精神不灭”，但又承认“物质不灭”，肯定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他说：“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在论及人的认识的来源时，他又反对唯心的先验论，他说：“此种言语在其起源确已合于客观界之事实，乃由种种经验而来者也。”“由一个人而论，从幼小之时即兼而得之，似为构成先天者；从历史观之，则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识觉也。”人们的观念来源于经验，合于客观之事实，这已是一种明确的唯物主义观点。由此出发，他又否定有所谓“先知先觉者”，主张“人皆可为尧舜”。在《批语》中，他在夸大“圣贤”的作用时，跟着又写道：“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为期向者也。”既然人的知识和才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来自后天的经验，那么，只要努力，人人都是可以达到的。这样，又和先验论的天才论区别开来。

特别可贵的是这些早期著作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法思想。他说：“天下万事，万变不穷”（《讲堂录》），任何事物都处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在《批语》中，他进一步描述了世界发展变化的情景，他说：“世上只有各种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者必毁于彼，毁于此必成于彼。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成于此。生非生，死非死也。”世界上各种现象总是处在矛盾转化过程中，这里表达了变化即矛盾转化的思想。他认为社会生活也处处存在着矛盾，他在《批语》中写道：“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亦自有实际生活之价值。”人类历史就是在

矛盾冲突中发展变化的。在《批语》中，青年毛泽东还表达了人具有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他说：“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自然。”人受自然的制约，但人非自然的奴隶，人可以反作用于自然、改造自然。

在一师时期，毛泽东在政治思想上，围绕着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克服了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确立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哲学上，则进行了最初的探索。其基本倾向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常常闪现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光辉。这样，就为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1918年8月，毛泽东在一师毕业后，为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

北京是全国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中心。毛泽东在这里停留不到半年时间，但对其世界观的发展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这里，他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在李大钊担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他参加了学校的哲学会、新闻学研究会，还旁听了北大的一些课程。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北京正在酝酿着新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而北京大学则是传播革命思想的摇篮和民主革命运动的策源地。毛泽东在同李大钊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者的交往中，在他如饥似渴地研读的种类繁多反映新思潮的报刊、书籍中，初步了解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从而促使他的世界观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

1919年初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不久，“五四”运动就爆发了。这个期间，毛泽东领导了湖南的学生运动，组织湖南全省学生联合

会，并主编出版了联合会的会刊《湘江评论》。在该杂志的《创刊宣言》和《本报启事》中，他明确宣布该刊以研究、宣传、实施最新思潮为主旨。毛泽东满怀激情地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该刊发行了四期和一期临时增刊，大部分论文出自毛泽东之手。这些论文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揭露军阀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特别是《民众大联合》和其他一些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认为十月革命体现了人类解放、劳农阶级革命的方向，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人民的革命、中国革命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些观点表明，毛泽东这时的政治观念，虽然其基本倾向仍是革命民主主义，但已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

这些论文也表明，毛泽东的世界观已开始转向唯物主义。这主要表现在他对革命产生的根源、对人民群众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他在创刊宣言中写道：“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社会黑暗，从而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他已经认识到，要取得革命成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他总结中外革命的历史经验，认为法国的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依靠民众的大联合取得胜利的，中国的“五四”运动也由于群众的觉醒和联合而显示了威力；辛亥革命则由于没有发动群众、没有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而失败了。他由此得出结论：民众大联合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强的力量。这就表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基本观点。

但是，这种转变还是很不彻底的。在政治观点上，毛泽东这时还崇尚资产阶级的民主，还不懂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意义，还没有克服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希图劝说“强权者”放弃强权，不同意马克思的用革命手段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主张。在世界观上还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唯心主义。例如，他认为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他们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谬误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的结果。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抽象人性论的观点。他还不懂得从经济地位、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出发分析“强权者”与“平民”之间的对立。所以，这段时期毛泽东在政治观点和世界观上的转变，还仅仅是开始。

毛泽东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是1919年12月第二次到北京以后实现的。北京经历了“五四”运动之后，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吸引了愈来愈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形成一股充满革命生机的社会思潮。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却感到了恐慌。在“五四”运动中，他们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现在则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公开挑起了论战，这就是相继发生的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这些论战正在进行。他一到北京就被这些论战吸引住了。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写道：“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他结合中国的情况去了解种种主义、学说，将它们进行对比研究。他热切地搜寻和研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中译本。他参加了李大钊组织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得到李大

钊的具体帮助。特别是阅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确信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理，使他从根本上转到马克思主义上来。这时候，他就转过来明确地批判其他种种主义的谬误了。1920年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写道：“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921年1月2日，在新民学会开会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时，他再一次明确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是永世都做不到的；极端的自由主义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唯有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在哲学上，他认为唯物史观是“对历史的正确的解释”，因而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一切表明，毛泽东此时已经克服了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已经克服了哲学唯心主义的影响，实现了向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起点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和中国的工人运动、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这种结合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党成立以后，面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进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党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骨干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运用他们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道路和方法，进行了初步的、然而正确

的探讨。当然，党成立的时间还不长，党还是幼年的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等问题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固然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蒋介石的叛变，同时也同党还是幼年的党有关。但是，应该肯定，党刚成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中，进行了成功的尝试。这种尝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新篇章，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党的领袖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其中运用得最好的是毛泽东。在当时党内的一些领导者中间，如陈独秀和张国焘，仍存在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和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倾向。他们从错误的阶级估量出发，在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张国焘只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对立的一面，没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区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看不到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与无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一面，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陈独秀走另一极端，认为只有民族斗争，没有阶级斗争，否认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矛盾和对立，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前途应该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这样，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不论是张国焘的“左”倾关门主义，还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其哲学基础都是唯心主义的主观社会学。当时，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张国焘、陈独秀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这一斗争的产物。

这两篇论文既是政治论文，也是哲学著作。在这里，毛泽东

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又始终贯穿着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他以这些基本观点为指导，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然而又是创造性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特点最初的表现。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其社会状况与阶级结构具有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特点。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资产阶级划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他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都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附庸，它们代表了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则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是剥削者，同工人农民有矛盾，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受外资的打击和军阀的压迫，这种经济上的二重性决定了其政治态度上的二重性。它对待革命的态度是动摇的，其左翼可能是革命的朋友，右翼可能是革命的敌人。对这个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是彻底孤立敌人，争取革命胜利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中国人口中，农民占绝大多数。毛泽东指出，中国贫苦农民受封建地主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剥削与压迫，迫切要求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由于中国贫苦农民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他们是“革命先锋”，是革命的主力。在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工业无产阶级在数量上所占比重虽然不大，但它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经济地位低下，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分布十分集中，能够形成坚强的革命集体，因而特别能战斗，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只有它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分析中，毛泽东正确地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敌、

我、友，初步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他说：“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①

毛泽东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关系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原理出发，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然而和一切机械决定论不同，他在这种分析中，始终贯穿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辩证发展的观点。对中国社会每一个阶级的分析，既看到其共性，又看到其个性；尤其是着重联系共性来分析个性，着重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既看到它和各国资产阶级一样，代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无产阶级实行残酷剥削，主张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又看到它是半殖民地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把它同买办资产阶级区分开来，着重分析其经济上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动摇性，看到它在革命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种种变化。毛泽东指出，这个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到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当它感到其生存发展受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所以，在革命起伏变化过程中，这个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他们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这种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又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另一个特点。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9页。

毛泽东还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矛盾放在世界基本矛盾的总体联系中来考察。他指出，十月革命以后，世界上出现了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之下，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国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这样，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分析，毛泽东分清了中国革命的敌、我、友，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主力、领导者和前途，从而初步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这两篇著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的第一批文献。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于十字路口上。党内围绕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发生尖锐的对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观地消极地看待革命形势，变成取消派。而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同样主观地估量革命形势，不承认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他们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力主在全国中心城市组织暴动，进行所谓“无间断性的革命”。这一切使本来已大受损伤的革命力量进一步遭受损失。

这时候，又是毛泽东代表了正确方向。他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同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毅然把秋收起义的队伍拉上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伟大的战略转移。在井冈山斗争时期，

他总结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生存？》（1928年10月）、《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等著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国情，进一步论证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他指出，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他认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①这个观点，既同陈独秀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区别开来，也同瞿秋白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盲动主义区别开来。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他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具体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说明这种转向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道路，是中国革命取胜之路。他指出，中国革命走这样的道路，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国家，帝国主义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城市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在乡村则是封建的农业经济。这就造成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城市，在农村是比较薄弱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强烈要求进行改变现状的革命。因此，在农村，中国革命在力量上占有相对的优势。加上中国土地广阔，革命势力有回旋余地，以及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这一切就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象十月革命那样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而必须走向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8页。

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还从世界观的高度，深刻分析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以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认识论根源。他指出，在某些党员中，主观主义还浓厚地存在着。他们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往往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例如，1927年革命失败，有的人只看到失败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削弱，而没有看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没有看到革命发展的必然性，因而得出悲观的结论。而另一些人，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只看表面现象不看本质，当革命小有胜利，就认为敌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把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在这样的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毛泽东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方法。”^①为教育党员在克服主观主义，掌握这种可靠的科学的方法，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提出了两点重要要求：第一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第二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大家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②在这里，实际上已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在这个时期的著作中，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开始从世界观上来揭示和批判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问题。党内有些人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把“本本”当成万灵药方，因而常常作出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导致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的错误。这种“本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96页。

② 同上书，第90页。

本主义”表面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实践斗争证明这一理论是对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①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科学论断，提出和论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并且认为这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他指出，一切正确的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你对某个问题不能解决，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本本主义”迷信书本，以为不需调查研究，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显然，毛泽东在这里已提出了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相对立的、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已初步形成。

第四节 《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 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在领导井冈山的斗争过程中，提出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还不可能对这些带有根本性的路线问题和哲学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的科学的论证。他的正确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第20页。

思想也正在经受实践的检验，还未被全党所接受。相反，由于当时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党内还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广大市场，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的存在还相当严重。三十年代初，党内继瞿秋白“左”的错误之后，又相继出现了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且错误一次比一次严重。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从1931年到1934年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正确领导受到排斥，使革命事业遭受十分惨重的损失，几乎断送了整个革命。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才结束了错误路线在全党的统治，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这个时期，中国革命面临着新的考验。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制造了蓄谋已久的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事件。在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内，就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此后，接连不断地挑起事端，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社会矛盾发生急剧的变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在一起，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新的形势面前，如何教育全党认清矛盾的发展变化，从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划清正确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界线，从而团结全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成为党的最为迫切的任务。因此，毛泽东率领长征的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他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报告。1936年12月，他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重要论文。这两部著作，从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上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1937年7、8月间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则从哲学上、思想路线上清算了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些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丰硕成果，是毛泽东思想进入成熟阶段的表现。

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 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毛泽东曾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这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战争问题的一部杰出的著作。毛泽东指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指导战争也是如此。只有研究战争，掌握战争的规律，才能指导战争，夺取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指出，战争是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条件下，存在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毛泽东说，战争规律是发展的，“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①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同时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研究这些规律在中国革命发展不同阶段上的发展。毛泽东反对照搬苏联革命战争的经验 and 照抄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他指出，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有许多特殊的情况。如果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就会打败仗。但是，还要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也是发展的，同样不能把中国革命过去的经验绝对化。毛泽东说：“战争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57页。

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① 在研究战争规律问题上，毛泽东在这里坚持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同时特别重视对矛盾特殊性的分析。这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而且为形成《矛盾论》的理论核心作好了准备。

那么，应该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呢？毛泽东提出一个原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对军事规律的认识，象对其他事物的规律的认识一样，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从实践中来的。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并不是先验的东西。学习这些理论是必要的，但不能代替实践中的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认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我们的主要方法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但是，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不是一下子达到的。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深刻地阐明了认识战争规律的过程。他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② 指挥员首先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尽可能都收集起来，然后再对这些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③，并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从而认识战争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制定出战争计划。这是一个认识过程。毛泽东跟着指出，“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57页。

② 同上书，第163页。

③ 同上书，第164页。

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①在这里，毛泽东把执行计划、实施计划的过程，看做是整个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他指出，在第一个过程中达到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是尚未解决的，因而需要在实施过程中加以检验。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所以这个过程是检验认识和进一步发展认识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在这里，毛泽东把实践看做是整个认识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把认识看做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这同样是为《实践论》的诞生做好了准备。

在中国革命史上，这是第一部系统地阐明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著作。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自己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特殊的规律。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则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即规定了战争的持久，如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这就说明，中国革命战争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顺利”和“困难”两方面同时存在着，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规律派生出来的。谁看不到这一根本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中国革命战争一系列战略和战术问题。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64页。

东西。因此，他着重阐明战争“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因此，“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①。而局部则是指全局的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局部和全局是统一的，因为局部性的东西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脱离全局，局部也就不能存在；然而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全局性的东西也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所以，全局和局部是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但是，两者除了统一的一面，还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一面。全局高于局部、决定局部，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方面，是对全局性的问题处理得好或不好。而局部，作为全局的一部分或一阶段，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局部问题处理得好坏又会反过来影响全局问题的解决。所以，全局和局部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一面。解决两者的矛盾，必须坚持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局部问题的解决服从全局问题的解决。有些局部的成败对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有的局部对于全局则有决定意义，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全局的成败。毛泽东说：“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②

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还论证了战争中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59页。

^② 同上书，第160页。

指导能力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但不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他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毛泽东既反对无视客观物质条件起主要决定作用的唯心主义，也反对把客观物质条件绝对化、无视主观指导能力的作用的机械论；既坚持唯物论，也坚持了辩证法。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虽然这一著作的主题是军事问题，但自始至终闪耀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它不仅奠定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基础，而且生动地表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这一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重要问题，是后来《实践论》和《矛盾论》着重加以论证和发挥的主要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一著作准备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诞生。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的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为了武装全党以迎接抗日战争的斗争任务，毛泽东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政治理论、军事理论和哲学理论问题。党已经不是年幼的党，它经历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也有许多血的教训，特别是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打着“最革命”的旗帜，使许多人长期看不清其面目。这时候，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尚未消除，党内经验主义又有所抬头。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66页。

路线，是以错误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毛泽东认为，从政治上、军事上清算错误路线是必要的，但如果不进一步从思想路线上进行清算，那么，这种清算就不是彻底的、巩固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集中精力去研究哲学问题，从世界观的高度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他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和国内外许多哲学家的著作。他不仅自己钻研，而且推动党的干部去钻研。他亲自组织哲学座谈会和新哲学会，在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揭露和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并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哲学的总结，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名的哲学论文。

这两篇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同时也总结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研究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一）《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

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目的是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重点是揭露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在这一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第一，科学地系统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以及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不同场合曾对实践的内容和形式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作过阐述。例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人的能动的感性活动、“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理解为社会实践。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则理解为实验和工业。在其他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理解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思想，

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形式。他指出，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人们在其中的一切活动，如生产活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等，都属于社会实践的范围。毛泽东认为，物质生产、科学实验(在阶级社会还加上阶级斗争)，是基本的实践活动形式，其中“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①。社会实践的一切形式，都为生产实践所决定，生产实践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毛泽东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他特别强调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他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人们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接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虽然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一个人的知识多数是从间接经验来的，但在人为间接经验者，在人仍为直接经验。所以，就知识的总体而言，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离开实践，也就离开认识的源泉，不可能产生正确的认识。社会实践是发展的，人的认识必然会随实践的发展而一步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所以，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而人的认识是否符合真理，不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59页。

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①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最后，毛泽东又强调，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这样，毛泽东从认识的源泉、动力、标准和目的几个方面，全面地论证了实践的作用。

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这一基本观点作了最全面和最系统的论证，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第二，具体阐明认识产生和发展的辩证过程。关于认识的辩证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③这是对认识的辩证过程最概括的说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则对这一过程作了系统的、具体的阐发。

毛泽东指出，认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人们在实践过程中，起初只是看到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是认识的感性阶段，即感觉和印象的阶段。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多次反复，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产生了概念。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和事物的内部联系，它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是性质上的不同。循此继进，人们运用概念作出判断和推理，得出合乎论理的结论。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是认识的第二阶段，即理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具有本质的区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61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别，理性认识高于感性认识，但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没有感性认识，就不会有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而感性认识阶段又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阶段。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认识的真正任务是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所以，这两个认识阶段虽有高低之分、虽有本质区别，但它们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他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这种统一体现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征。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毛泽东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一半。他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①这是把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运用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把精神力量变为物质力量的过程，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毛泽东不但把这一过程看做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而且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过程，这就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贡献。

第三，揭示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进行了新的概括。人类的认识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这一过程的规律性和一般特征。恩格斯说：“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能力仅在外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69页。

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①列宁说：“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②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和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作了新的概括，他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③这一概括深刻地表明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以及认识不断深化、无限发展的过程，可以说凝结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全部精华。

《实践论》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毛泽东在批判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时，提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原理，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他认为，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这就深刻地阐明了绝对真理以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16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

③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73页。

（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贡献

列宁曾经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①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的《矛盾论》是对列宁这一思想的出色说明和发挥。通过这种说明和发挥，使唯物辩证法内容更加丰富，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第一，揭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对立，阐明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它们是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否认事物由内因所引起的发展变化，只承认事物由外因所引起的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这样，就否定了发展、否定了质变。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即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即外因，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②毛泽东关于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分析，深刻地阐明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阐明了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

第二，阐明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强调矛盾的普遍性，他们用了许多事例来加以说

① 《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0页。

②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77页。

明，毛泽东的贡献是在理论上进一步揭示了矛盾普遍性的含义。他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①他指出，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正是每一事物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事物的生命，推动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同时，不仅每一事物都存在着矛盾，而且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他批评了德波林学派否认差异是矛盾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②。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对矛盾普遍性的最科学的阐明。

鉴于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在《矛盾论》中则强调认识矛盾特殊性的意义，并对矛盾特殊性作了透切的阐明。他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一点，他们不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他们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因而使革命招致失败。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固然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法确定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怎样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呢？毛泽东根据列宁的意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80页。

② 同上书，第282页。

见，认为最根本的就是“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①。他认为，矛盾特殊性有几种不同情形。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都各有其特性。研究这些矛盾的特性，不能带主观随意性，而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矛盾的特殊性。

毛泽东指出，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上，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个是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我们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同时，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就是矛盾起主导作用、支配作用的方面，它决定了事物的性质。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发生转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毛泽东指出，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是研究矛盾特殊性所必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只有进行这种研究，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研究和掌握这两种矛盾情况，是共产党人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92页。

第三，创造性地提出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的原理。毛泽东分别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以后，跟着阐明两者的关系。首先，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是互相联结的，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每一个事物都是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统一体。其次，他又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因此，不能把两者的区别绝对化、凝固化。再次，毛泽东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性，是绝对性。但这种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而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

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的科学的命题。毛泽东把作为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理解为一个复杂的体系，而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则贯串于这一体系的各个方面，是理解这一体系以及这个体系的每个方面的关键；同时也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原理，深刻地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不仅在理论上解决了如何从根本上认识和掌握对立统一规律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上解决了应该如何运用这一规律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所以，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95页。

这个原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四，深刻论证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列宁曾经指出：“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①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通过对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分析，科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他指出，从哲学上讲，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指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②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是矛盾同一性第一种含义。毛泽东指出，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所谓互相转化，就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毛泽东认为，矛盾同一性的第二种含义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只有矛盾双方互相转化才会有旧的矛盾统一体的解体 and 新的矛盾统一体的形成，才会有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所谓矛盾的斗争性，指的是矛盾双方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性质。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因而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则是无条件的，它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因而是绝对

① 《哲学笔记》，第111页。

②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301—302页。

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属性，虽然两者有区别，但又是不能分割开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①，推动事物不断地向前发展。这样，毛泽东就具体地阐明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史上，《实践论》和《矛盾论》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继续和发展，标志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至此，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自己的、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胜利，就是在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本章阅读书目：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反对本本主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实践论》。

《矛盾论》。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307页。

第十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 发展和多方面展开

(1937——1949年)

从1937年至1949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普遍的学习、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并在战争实践中，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个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特点，一方面是毛泽东本人把《实践论》、《矛盾论》所阐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应用于形势分析，应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另一方面党的其他领导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以及党的理论家们，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做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所以，这一时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极为丰富多采的时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多方面展开的时期。

第一节 开展全党的学习和整风运动， 形成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基本内 容的完备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展开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恶劣的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是经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考验，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日益走向成熟的党。中国共产党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深刻地认识到，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关键是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因此，尽管战争异常激烈、残酷和紧张，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始终注意结合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学习、研究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注意概括新鲜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曾记下当时毛泽东研究哲学的一些生动材料，他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①

从1941年到1943年的整风运动，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

^① 《西行漫记》第67—68页。

党八股为主要内容，因此，这也是一次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宣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教育运动，是为了在全党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路线的运动。整风运动的过程，是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清除王明路线的影响的过程，也是进一步认识和接受毛泽东思想的过程。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者、理论家们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讲演，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进行精辟的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就是这个时期正式提出并为全党所接受的。特别是《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反对党八股》（1942年5月）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等论著，从哲学上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并通过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完整地提出和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以及“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推向前进。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式提出和科学论证

“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正式提出并加以深刻论证的。早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等著作中，毛泽东就已论证了这一思想路线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改造我们的学习》用“实事求是”这一科学概念加以概括和论证，是上述思想的直接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实事求是”原是中国一句成语，毛泽东经过改造赋予它崭新的内容。它生动地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同时渗透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指出，有两种对立的思维路线：主观主义的思维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维路线。实事求是的思维路线，就是理论和实际统

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他在具体解释什么是实事求是时写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

这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所作的概括而又完整的解释。根据这一解释，“实事求是”主要包含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毛泽东把“实事”解释为“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从而阐明“实事求是”的前提就是承认外界事物的客观实在性。人的认识不是主观自生的，不能凭主观想象、不能凭一时的热情和死的书本，而须凭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这里，“实际”和“实事”是内涵相同的概念。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出发。客观事物是千差万别的，每一事物都有不同于别事物的质，都有自己的矛盾特殊性。毛泽东强调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也就是从事物的特殊矛盾、特殊本质出发。同时，“实际”是发展变化的。“从实际出发”，又要估计到实际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要把客观事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我们研究事物，不仅要了解它的现状，而且要了解它的历史。要了解中国革命的规律，就不能割断历史；不但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而且要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所以，从实际出发，又包含了从历史实际出发。

其次，毛泽东指出，从实际出发，重要的在于从实际材料中引出事物发展的规律。从实际出发，解决了认识的出发点问题，但认识的真正任务，是由此继进，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59页。

即“求是”。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实际”本身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因此，只有认识事物的规律，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实际，才能做到真正从实际出发。从实践来看，只有认识和掌握事物的规律，才能制订出正确的行动计划，人们的行动才有正确的向导。所以，毛泽东把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看做是“实事求是”的核心要求。

再次，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的方法，当作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加以论证。他在许多讲话和论著中，阐明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阐明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认识和掌握规律的过程。他指出，当人们对一事物进行调查研究时，第一步是了解材料，这时只能看到这一事物的大致轮廓，形成一般概念。第二步则用分析方法把该事物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仔细的研究和分析。第三步则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形成作为整体的事物的概念。他指出，在调查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分析。但这里既有分析，也有综合。就是在第二步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分析中有综合，综合中有分析，分析与综合的结合，就是矛盾分析方法。在《反对党八股》等论著中，毛泽东进一步发挥这种调查研究的矛盾分析方法，指出这个过程是“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里关键是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①。材料收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和重点，要抓住矛盾的主导方面。十样东西，如果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主要的东西没有抓住，犹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仍无法发现事物的本质，无法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指出调查的对象是群众，调查的过程就是做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的过程。没有向群众学习的决心和热情，是做不好调查的。他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5页。

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①毛泽东把虚心向群众学习，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看做是认识规律，达到实事求是的主要途径。

再其次，毛泽东认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包括了在实践中运用、检验和发展理论。我们从实际出发，经过调查研究，获得了对于事物的规律的认识，还需回到实践中去。这不但因为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而且还因为理论本身只有经过在实践中的应用，才能得到检验和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形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书本知识假定都是真理，也是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经验写成的理论。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光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际知识，那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的。毛泽东指出，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即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包括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作出的独创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表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特色。

二、群众路线理论和方法的系统形成

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观点，是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页。

定性力量。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不但从理论上进一步阐发了这一原理，而且把这一原理当作他所制定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又说：“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②由此出发，毛泽东确定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则，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毛泽东指出，革命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共产党人只是人民的公仆。中国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是完全为着人民的解放，彻底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整风的主要内容之一。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根本的立场和世界观问题。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脱离人民群众，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以权谋私，他就丧失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群众路线，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路线。

共产党人要解放人民，为人民服务，但不是包打天下。毛泽东指出，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必须坚决反对恩赐观点。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就是相信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力量，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依靠群众，就是和群众打成一片，动员和组织群众去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动员老百姓。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真理。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932页。

② 同上书，第635页。

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和基本内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此外，群众路线还包括另一方面的内容，即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公式。这一公式是对《实践论》中所概括的认识论公式的补充和深化。首先，这一公式明确把社会实践归结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指出领导者的正确的思想、意见、政策、计划、办法等，不是来自单个人的或少数人的实践，而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其次，这一公式还说明领导者形成正确思想的认识过程。这过程包括了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材料的阶段，大体上相当于感性认识阶段。第二阶段是对材料进行集中概括、整理加工的阶段，即理性认识阶段。经过这两个阶段，领导者就获得了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根据。再次，这一公式还说明，从群众中来，还需“到群众中去”，即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和行动，这个过程就是在群众的实践中检验理论、改造世界和进一步发展理论的过程。最后，毛泽东指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是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上升的过程。在这个无限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854页。

循环的发展过程中，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更接近真理，而不是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样，毛泽东就把“群众——领导——群众”的领导方法同“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科学地统一起来了。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在理论上，这一路线体现了认识和实践、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认识论和方法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贡献；在实践上，则解决了领导者如何依靠群众、领导群众的问题。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我们应该继承它和发扬它。

三、“独立自主”基本原则的形成

“独立自主”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这个时期形成的。中国革命是在特别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中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一个基本观念，即中国革命的问题，必须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井冈山的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围剿斗争，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抗日战争开始，中国革命面临着更为强大的敌人，所处的环境更为恶劣，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的问题，就更加突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正式提出“独立自主”的原则不是偶然的。

这个原则的正式提出，最初见于1938年11月毛泽东写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在这里，毛泽东针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写道：“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①“我们的方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05页。

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①从这里可以看出，最初提出这—问题是同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同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1945年1月，毛泽东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文中，提出了经济工作中的“自力更生”问题。他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②他指出，我们要立足于自力更生，不能象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这里明确提出了“自力”与“外援”的关系问题。从这时开始，就正式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指导原则。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点，是相信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力，坚信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本国的革命任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国际性的事业，无产阶级主张国际主义，主张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之间要互相支援。但这种外援不能代替本国无产阶级的努力。无论哪一个国家，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都必须立足本国，立足于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所以，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处理自力更生与外援的关系时，要把自力更生放在首位，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但是，独立自主不是排外。“内”和“外”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没有以自力更生为主不成，没有外援也不成。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还千方百计争取外援。世界上的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关起门来干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集中体现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唯物史观，同时又体现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因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05页。

② 同上书，第917页。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去探求事物发展规律，就是从群众的实践出发，通过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智慧发现规律。所以，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则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理论基础。只有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如实地承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才能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而独立自主也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独立自主就是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相信群众，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去夺取胜利。所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者是互为前提、互相补充的。但是，三者的关系又不是平行的关系。三者之中，核心的方面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都是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理论基础的，都是实事求是的具体运用和必然要求。所以说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精髓。

第二节 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独特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

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战争历史最长，经验最丰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研究战争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研究战争问题成了他的理论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他研究了战争史，特别是研究和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独特经验，写了一系列光辉的军事著作，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论持久战》（1938年5月）、《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6年9月）等著作，以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中关于十大军事原则的制定，非常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的性质和战争的规律、特别

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为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增添了许多独创性的内容。

一、批判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坚持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

在如何考察战争问题上，当时党内外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即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有的人主观地、片面地或者机械地看待战争。毛泽东认为，这种唯心论和机械论倾向，是在战争问题上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根源。他说：“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①毛泽东认为，研究战争同研究任何问题一样，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本人在这方面就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的竞赛，战争的规律、战争中的一切问题，都是同战争双方这些基本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研究战争问题坚持客观性和全面性的观点，首先就要从分析战争双方这些基本特点出发，从分析它们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等实际情况出发。如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的战争。从日本方面来看，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于它不利。相反，中国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足以支持持久战的条件，并且得到世界的多数国家的援助，这些就构成了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毛泽东指出，正是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15页。

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从思想根源来说，就在于它们分析问题都不是从这些基本特点出发，犯了主观主义和机械论的错误。

其次，进行客观的、全面的分析，要估计到战争双方各种基本因素的历史及其发展。毛泽东在分析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时指出，这一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处在这个时代的中日双方，都带有时代的特点。这个时代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它现在是处于没落、退步和寡助的环境中。而中国方面，虽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弱国，但它处于历史上的进步时代。抗日战争的进步，不是普通一般的进步。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了数十年的革命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以上这些特点，加上其他条件，决定了中国不会灭亡，必然取得最后胜利。

最后，进行客观的、全面的分析，还要分清战争双方的基本因素和附随因素、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和暂时起作用的因素。毛泽东认为，在决定战争过程的诸种因素中，必然有基本因素和附随因素、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和暂时起作用的因素之分。如抗日战争中的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因为这种因素依敌我双方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决定其作用的大小。所以，对战争双方的分析，看不到各种因素的作用固然不成，分不清各种因素的性质、作用及其变化，同样没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坚持客观的、全面的分析，乃是认识战争规律的关键。

二、阐明战争的本质以及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关于战争的本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许多深刻的论述。列宁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或者说是政策的另一种方式（即暴力）的继续。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中，毛泽东继承和发挥了这些观点。他批判了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的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把战争等同于政治，一种是否认战争和政治的联系。毛泽东指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他坚持“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指出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自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它的胜利不仅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而且离不开坚持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人民、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以及其他许多政策措施、政治行动，就是说，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战争就是政治。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有其特殊组织、特殊方法和特殊过程，所以战争又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所以，战争与政治是不可分割开的，“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①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这里，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一切战争行动，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47页。

止，都是贯彻这一原则的。以抗日战争来说，我们就要从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出发，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最后达到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战争的目的，也就是战略战术的目的。但是，正确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战争指导，不是凭空产生的。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敌对双方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规定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因此，战略战术的制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敌对双方的基本特点出发。毛泽东制定抗日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就是从这样的原则出发的。

根据中日双方的特点，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应该是持久战，并且指出制定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和战术，是坚持持久战最后夺取胜利的保证。毛泽东把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持久战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中日双方的情况不同，因而我方的战略战术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要按照实际情况，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他指出，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在这里，进攻和防御、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就是说，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是相反的、对立的，但它们又是相成的、统一的。采用这样一种战略战术，是同敌强我弱这样的实际情况联系在一起的，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毛泽东指出，采用这样的战场作战的指导方针，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改变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

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则由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这样，经过一系列局部胜利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总体上、全局上削弱敌人，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变成我优敌劣。这时就可以转入战略反攻，驱敌出国。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关于战略和战术的思想。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一文中，他提出战略上轻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重要原则。他指出，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中国人民有把握、有信心战胜它们，在战略上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但是在战术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在1947年12月25日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人民战争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原则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的，它正确地反映了实际情况、反映了人民战争的规律。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因此，虽然敌人熟知这些战略战术，但他们不能利用。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中，十大军事原则得到全面的应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是毛泽东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伟大胜利。

在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中，毛泽东身经百战，亲自领导和指挥战争的时间最长，经验最丰富。在他众多的军事著作中，关于战略战术问题的论述，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史上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意义重大的发展，至今仍有学习和研究的重大价值。

三、战争的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较之别的社会现象，它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它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①。战争这种社会现象象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有其客观的内在的规律性。否认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就不是唯物主义者。

虽然战争规律比之别的社会规律更难捉摸，但是同样可以认识和被人所利用。毛泽东指出，战争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的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主观指挥的正确或错误，就在于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即主观能动作用发挥的正确或错误。

毛泽东指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是人类所特有的。人与动物消极地适应自然环境不同。人能够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作为行动的向导。因此，人在行动之前，总是抱着一定的目的和为实现这一目的而作出的设想和计划的。人的行动、实践过程，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是把思想转变为现实的过程。毛泽东指出，这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就是人类所特有的“自觉的能动性”。

毛泽东指出，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自觉能动性的特点，这种特点鲜明地表现了战争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他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58页。

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①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赞成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必须提倡每个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这些分析表明，主观能动作用是建立在客观条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客观条件一方面规定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范围，另一方面则给主观能动性发挥作用提供了客观基础，在客观条件划定的范围之内，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可以得到巨大的发挥。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深刻，人们在实践中越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就越大，主观能动作用就越大。有的指挥员在战争中能够驾驭战争风云的变幻，表现了极大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这就是因为他们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深刻地认识和掌握了战争发展的规律。所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的大小，是直接地同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程度联系在一起的。

在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上，一般来说，客观规律性是决定的方面。不承认这点，就会陷入唯心主义。但是，如果否认在一定条件下，主观能动性也会起决定作用，又会导致机械唯物主义。毛泽东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②在战争中，客观条件、客观规律是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但是，客观条件本身只是提供胜利的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46页。

②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54—455页。

条件、即提供胜利的可能性。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战争的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因此，要把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就要依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客观条件本身不能自然而然导致战争的胜利。在具备一定条件以后，主观努力就成为决定的因素。显然，这里所谓“决定作用”，是指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并没有离开客观条件，也不是说反过来决定客观条件。这种观点既坚持了唯物论，也坚持了辩证法。

同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问题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1941年，毛泽东针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写的《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一文，精辟地论证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这两个过程的，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他特别强调改造世界对实现自由的重要意义。他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取得自由的关键基础，在于改造世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命题，毛泽东关于自由必然的关系的阐述，补充和发挥了恩格斯的观点，更深刻地揭示了自由的实质和意义。

第三节 总结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创立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的贡献。毛泽东在自己的一系列论著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正确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

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基本问题。到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毛泽东进一步地系统地研究了这些基本问题，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等著作，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一、从中国国情出发，科学地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毛泽东指出，领导中国革命，必须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规律，而要懂得这一切，又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他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认清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前提。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从1931年“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开始，中国又进一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了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然严重地存在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买办的、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形成为中国社会独特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这一专政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相勾结，象大山一样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使中国人民过着极端贫困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另一方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96页。

了某些发展，但其力量仍很软弱。加上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和半统治之下，使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如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反动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最主要的矛盾。

中国社会的这种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规律。近代中国革命，整个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在这之前，中国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之后，则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从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来看，中国革命性质的变化就更加明显。毛泽东认为，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革命的主要敌人、革命的对象就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则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革命的领导者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不是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是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即建立人民民主主义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因此，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在革命对象、任务、动力、领导者和革命的前途等方面，都具有全新的性质，因而已经不属于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这一革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一样，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也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没收帝国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大资本大企业归国家所有。毛泽东说：“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①毛泽东把这一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二、概括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科学地阐明中国革命的道路

在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最有独创性的部分，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和道路的理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已提出和初步论证了这一理论。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考验，不但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而且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毛泽东能够进一步科学地系统地阐明这一理论。

毛泽东强调指出，解决中国革命的形式和道路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俄国十月革命提供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的经验，即首先夺取城市、然后夺取乡村的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毛泽东在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时，是完全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断和十月革命的经验。1938年11月6日，他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在谈到战争和战略问题时，就明确地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都是正确的。这是普遍规律。但是，他又强调地指出，由于各国的历史条件和斗争环境不同，这一规律在不同的国家又会有不同的表现，必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各国，其内部，已经消灭了封建主义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其外部，没有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12页。

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在这些国家，有议会讲坛可以利用，有合法斗争的条件，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积蓄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占领乡村。这就是十月革命成功的道路。但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①这相反的道路，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新阶段》（1938年10月）、《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以及《〈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独特的道路。主要是进一步地科学地论证了如下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第一，进一步阐明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然性。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由城市和农村长期形成的不同的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但其主要的力量集中在城市，在农村是比较分散和薄弱的。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因此，革命队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去进攻城市，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争，那必然会遭受失败。只有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98页。

相反地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包围城市，逐步削弱敌人，经过长期斗争，才能最后消灭敌人，占领城市，夺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第二，进一步阐明农村包围城市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条件。毛泽东在以前的著作中，曾经分析过这些条件，现在他综合这种分析，把这些条件当作一个整体加以阐明。在《新阶段》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存在着“三位一体的条件”：一是半殖民地的城市不能完全统治农村；二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广大的游击活动的地盘；三是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他指出，这三个条件结合起来，“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的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①

第三，进一步阐明农村根据地建设的内容。毛泽东指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因此，如何建设根据地，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毛泽东总结自井冈山斗争以来的根据地建设经验，在过去提出的建党、建政、建军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他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领导核心，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斗争的英勇战士。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必须围绕着这三大法宝进行。毛泽东把统一战线作为根据地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这就使根据地能够建立在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49页。

在这个时期的著作中，毛泽东还对根据地的形式、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同其他斗争形式的相互配合等问题，作了全面的系统的阐述，这样，就形成了一整套建设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

三、从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分析出发，阐明革命转变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关系

毛泽东阐述的革命转变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关系，主要讲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对这样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长期存在着根本对立的意见分歧。右倾机会主义者如陈独秀，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割裂开来，认为这两个革命中间横隔着一个资本主义的阶段，中国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他们从这种观点出发，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因而招致革命的失败。“左”倾机会主义则混淆两个革命的性质和界限，否认革命发展的阶段性，鼓吹“毕其功于一役”，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批判了这种右的和“左”的错误，科学地阐明了两个革命阶段的区别和联系，从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指出，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主张，都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右倾机会主义把中国革命等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中国革命走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老路，是忘记了时代的差别。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时代。处在这样的时代，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允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不是要中国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增加一个竞争对手。帝国主义失去殖民地半殖

民地，就失去生存的基础。因此，帝国主义必然要侵略中国，断绝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使中国永远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其次，社会主义也不容许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走不通的。但是，能否象“左”倾机会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越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毕其功于一役”，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呢？毛泽东指出，毫无疑问，中国只有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出路。但是，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希图“毕其功于一役”，只是“左”倾空谈主义的空想，同样是错误的。

毛泽东同这种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相反，他从中国的革命实际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科学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他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① 第一步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则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其目的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反对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27页。

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不能混淆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只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才有可能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这两个革命过程又是相互联系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要求，虽然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的、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革命，这一革命已经不是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而是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目标。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它已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同社会主义革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两个革命性质的不同，决定了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只有走完第一步，才能走第二步，这就是革命发展的阶段性。但是两个发展阶段又是互相衔接的，中间不容插入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因此，开始走革命的第一步时，就要为走第二步准备条件；完成革命的第一阶段，就要不失时机地转变到第二阶段，这就是革命转变论。毛泽东说：“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①说的就是要把革命发展阶段论和革命转变论结合起来。

四、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考察文化工作，深刻阐明文化革命的纲领

毛泽东创立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不仅包括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内容，而且包括文化革命的内容。在这个时期的著作、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分析文化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深刻地阐明了文化革命的纲领。这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对唯物史观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14页。

文化革命同经济上、政治上的革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①毛泽东认为，考察文化革命问题，必须以这一基本观点为出发点。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毛泽东首先阐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特点。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必须以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为领导，同样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领导人民大众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从整个新文化的内容来看，还是新民主主义的，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说：“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②这种新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诞生的，它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化的特点。

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要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为依据。但是，文化工作本身还有其特殊的规律，要搞好文化工作，还必须遵循这些规律。毛泽东认为，从这方面考虑，必须正确处理“源与流”、“批判与继承”、“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24页。

② 同上书，第666页。

“源与流”，讲的是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源泉和文化工作已有成果的关系。毛泽东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学艺术的源泉时提出这个问题的。他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进行文艺创作，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创造的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因此，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即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这是进行文艺创作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这里讲的虽然是文学艺术创作中“源与流”的关系，但对一切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都是适用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化的源泉，离开这个源泉，就不可能有新的创造。但是，如果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的文化遗产，也很难产生优秀的文化成果。古人和外国人的文化遗产虽然是“流”，但它们是使作为“源”的社会生活材料能够形成新成果的前提条件。所以，只有正确处理“源”与“流”的关系，才能产生优秀的文化成果。

在“源”与“流”的关系中，毛泽东阐明了继承和借鉴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但还没有说明应如何继承和借鉴。在阐述“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时，他深刻地阐明这一问题。他指出，在历史上，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必要条件。对于外国的进步文化，我们也要大量地吸收。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

有外国的古代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这种吸收不是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不能“颂古非今”和“全盘西化”，而是要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不论是中国的或外国的文化遗产，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往往是精华与糟粕、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同反动的腐朽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就是精华部分，也必然带有时代的特点和局限性，也不能照搬。毛泽东形象地指出，对一切文化遗产，如同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所以，批判和继承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继承离不开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继承；另一方面，批判也不是全盘否定，批判中有肯定，没有继承，也不会有辩证的批判。即使对糟粕部分的批判，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要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并从这种分析中引出必要的结论。批判和继承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普及和提高”的关系，讲的是新文化如何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定形态的文化一经产生之后，又会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为他们所掌握。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即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毛泽东认为，正确地处理文化工作中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使新文化更好地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途径。

普及和提高的对象是工农兵群众。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只有明确这一问题，普及和提高才有正确的方向和客观的标准。普及的东西比较浅显易懂，容易为当前广大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东西则比较细致艰深，也比较难于生产，往往难于在目前广大群众中迅速流传。但是，文化作品的低

与高之间、文化工作的普及与提高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界限，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普及和提高是受对象的文化发展程度所制约的。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是不断提高的，普及和提高的内容是不断发展的，今天是提高的东西，明天就可能变成普及性质的东西了。所以，群众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普及和提高是不可分割的。毛泽东说：“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①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可能还没有开始普及。所以，普及和提高是相对的、发展的，不是凝固不变的。

毛泽东阐明的“源与流”、“批判与继承”、“普及与提高”诸范畴的关系，概括了文化革命工作的全过程。前两对范畴解决怎样创立新文化的问题，后一对范畴则是解决新文化怎样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怎样向实践转化的问题。这样，由于科学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性质和作用、以及文化革命工作诸范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也就创立了关于文化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更加完整和系统化。

第四节 创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他们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历史必然性。列宁则进一步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专政和民主的关系，以及专政形式的多样性、专政的职能等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和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819页。

论证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长期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长期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根据地的建设从最初时期开始，就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红色政权的建设结合起来。“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就是在长期积累政权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在抗日战争时期，则先后提出“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他认为这个共和国的阶级内容和阶级成份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国内一切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分子，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而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政治领导。这里已包含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发展了这些思想，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概念，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①。但是，正式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并给予系统的理论论证的，是在革命接近全国胜利、中国革命面临着一个新的转变关头的时候。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并于7月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全面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他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②

首先，毛泽东阐明建立和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957页。

② 同上书，第1369页。

国家政权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加强。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但是，毛泽东又指出，这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一般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人民民主专政。因为，专政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毛泽东把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在“人民”的范畴之内，即作为专政的力量之一。然而，这个专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它的根本的职能不仅在于镇压敌人的反抗，保护人民胜利的果实，而且在于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又是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是把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统一起来。毛泽东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①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有各种民主权利，如有选举权、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等等。人民内部的问题，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解决，而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而对于反动派，则要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毛泽东指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它们的统一，就构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

人民民主专政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广泛的阶级联盟为基础。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在现阶段，“人民”这个范畴包括了工人阶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364页。

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又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专政的对象只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到“人民”这一范畴之内，也就扩大了人民的队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缩小了打击面，这对于人民政权的巩固和革命事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毛泽东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明确的规定。专政的作用首先是镇压反动派的反抗，保护人民、保护革命的胜利果实。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就不能削弱，专政作为阶级压迫阶级工具的职能就不会消失。但是，对敌人实行专政，并不是消灭他们的肉体，相反，对那些放下武器的敌人，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其次，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的职能，是对工业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不断地发展生产力。最后，毛泽东还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职能，还有重要的教育职能。这种教育，是人民内部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为内容，用民主的方法，自己教育自己和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前进。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概括了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这一理论成为建国的指导思想。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这一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土壤中萌芽、形成、成熟和发展起

来的，它反过来又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南。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这一评价是就整个毛泽东思想讲的，但同样适用于毛泽东哲学思想。

本章阅读书目：

毛泽东：《论持久战》。

《〈共产党人〉发刊词》。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论》。

《改造我们的学习》。

《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论联合政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论人民民主专政》。

书 号： 2339·6
定 价： 2.45 元